



官方微信二维码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黄埔大道西 601 号中惠楼

电话：020-85221755

邮箱：iesr@jnu.edu.cn

官网：http://iesr.jnu.edu.cn

微博：@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



智库微信二维码

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自媒体公众号“黄埔大道西观点”是智库的发声平台，为公众提供更加专业、客观、科学的观点。



发展与交流中心二维码

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发展与交流中心，致力于为政府企事业单位提供专业培训，帮助国内学子申请海外知名学府深造，采用全英语教授数理、经济相关知识，提供免费的专业英语培训。



社会调查中心二维码

社会调查中心隶属于经济与社会研究院，致力于开展多项大型、前沿的社会调查项目，为经济学研究以及政策制定提供坚实的数据基础，打造优质的学术公共产品，支撑研究院在相关领域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 暨南大学 经济与社会研究院

Institute for Economic and Social Research, IESR

季刊 | 2021年  
7-9月

- ▶ 最新发布！暨南大学 2020 年度蒂尔堡大学全球经济学研究机构排名并列全国第 9
- ▶ 我院入选首批新文科研究与改革实践项目
- ▶ 我院获批 3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 ▶ 2021 广东千村调查顺利完成
- ▶ 冯帅章教授被评为全国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和困境儿童保障工作先进个人
- ▶ 冯帅章教授受聘为广东乡村振兴智库首批专家委员会委员

# 学院简介

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 (Institute for Economic and Social Research, IESR) 成立于 2015 年 11 月, 是暨南大学为建设高水平大学、推行经济学教育科研国际化而设立的教学科研机构。研究院致力于打造国内一流的应用经济学学科, 开展大型社会调查项目, 进行国际水准的学术研究, 提供高质量本科生及研究生教育, 建设高水平智库。研究院聘请教育部长江学者、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冯帅章教授为院长。2017 年 11 月, 研究院荣登《中国智库综合评价 AMI 研究报告 (2017)》核心智库榜单。2018 年 2 月, 我院名列《2018 年中国智库报告——影响力排名与政策建议》社会类智库专业影响力排名榜前十。

师资建设方面, 研究院延揽多名海内外知名高校优秀博士毕业生, 聘请在国际上具有广泛学术影响力的知名学者担任特聘教授, 打造一流的国际化师资队伍, 构建与国际接轨的考评标准体系。学生培养方面, 借鉴北美一流经济系的培养模式设立本科、硕士及博士项目, 培养兼具国际视野且立足本国现实国情, 能运用现代经济学分析方法解决实际问题的优秀人才。

为了提升科研实力, 研究院成立五大科研机构: 微观计量经济学中心、国际贸易与企业发展研究中心、生态文明与环境经济学研究中心、房地产与区域经济学研究中心及劳动经济学研究中心。劳动经济学中心与美国芝加哥大学人类发展经济学研究中心共同创建“芝加哥-暨南人类发展研究联合计划”, 由冯帅章教授与 2000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芝加哥大学 James Heckman 教授共同担任负责人。2019 年, James Heckman 教授获得中国政府友谊奖。

此外, 研究院下设三大职能中心: 社会调查中心、政策研究中心和发展与交流中心。社会调查中心旨在开展大型社会调查项目, 为政策制定及学术研究提供高质量的微观数据。目前已开展的调查项目包括: 中国城乡人口流动调查、中国家庭就业调查、广东省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调查、绵竹儿童认知与非认知能力发展追踪项目、广东千村调查等。政策研究中心旨在数据收集及学术研究的基础上, 针对有关国计民生的热点问题相关政策研究, 提供高水平的智库服务。发展与交流中心致力于为政府企事业单位提供专业培训, 帮助国内学子申请海外知名学府深造, 采用全英语教授数理、经济相关知识, 提供免费的专业英语培训。目前已与美国威斯康星麦迪逊分校、美国德州 A&M 大学、美国亚利桑那大学、新加坡管理大学、纽约城市大学联合开展海外硕士合作项目。

## 目录 CONTENTS

<b>01</b>	<b>学院要闻</b>	
	我院党支部组织师生观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直播 .....	02
	我院党支部开展“党史教育”专题组织生活会 .....	04
	我院召开纪律教育和师德师风教育专题学习大会 .....	05
	最新发布! 暨南大学 2020 年度蒂尔堡大学全球经济学研究机构排名并列全国第 9 .....	06
	我院入选首批新文科研究与改革实践项目 .....	07
	我院智库研究成果入选中国智库综合评价特色案例 .....	08
	冯帅章教授被评为全国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和困境儿童保障工作先进个人 .....	09
	冯帅章教授受聘为广东乡村振兴智库首批专家委员会委员 .....	11
	秋季新学期, 我院教学工作顺利开展 .....	12
	我院举办教师节暨迎接新教师茶话会 .....	13
	我院举办 2021 级新生开学典礼 .....	15
	乡村振兴研究院与建行广东分行共建乡村振兴学院 .....	17
<b>02</b>	<b>科研动态</b>	
	科研立项 .....	19
	论文发表 .....	19
<b>03</b>	<b>学术活动</b>	
	学术会议 .....	21
	暨南论道 .....	24
<b>04</b>	<b>思想聚焦</b>	
	乡村振兴专题 .....	26
	家庭经济专题 .....	48
	好文回顾 .....	58
	媒体聚焦 .....	67
	暨济一堂 .....	72
<b>05</b>	<b>数据调查</b>	
	广东千村调查 .....	77
	“社会调查与应用”系列讲座 .....	83
	中心要闻 .....	85
<b>06</b>	<b>对外交流</b>	
	冯帅章教授受邀参加 2021 年广东省民政智库工作会议 .....	88
	冯帅章教授带队赴四川调研城乡低保情况 .....	89
<b>07</b>	<b>学生天地</b>	
	本科生培养 .....	91
	夏令营 .....	93
	珠江经济学俱乐部 .....	96
	学子专访 .....	97

# 学院要闻

## 我院党支部组织师生观看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直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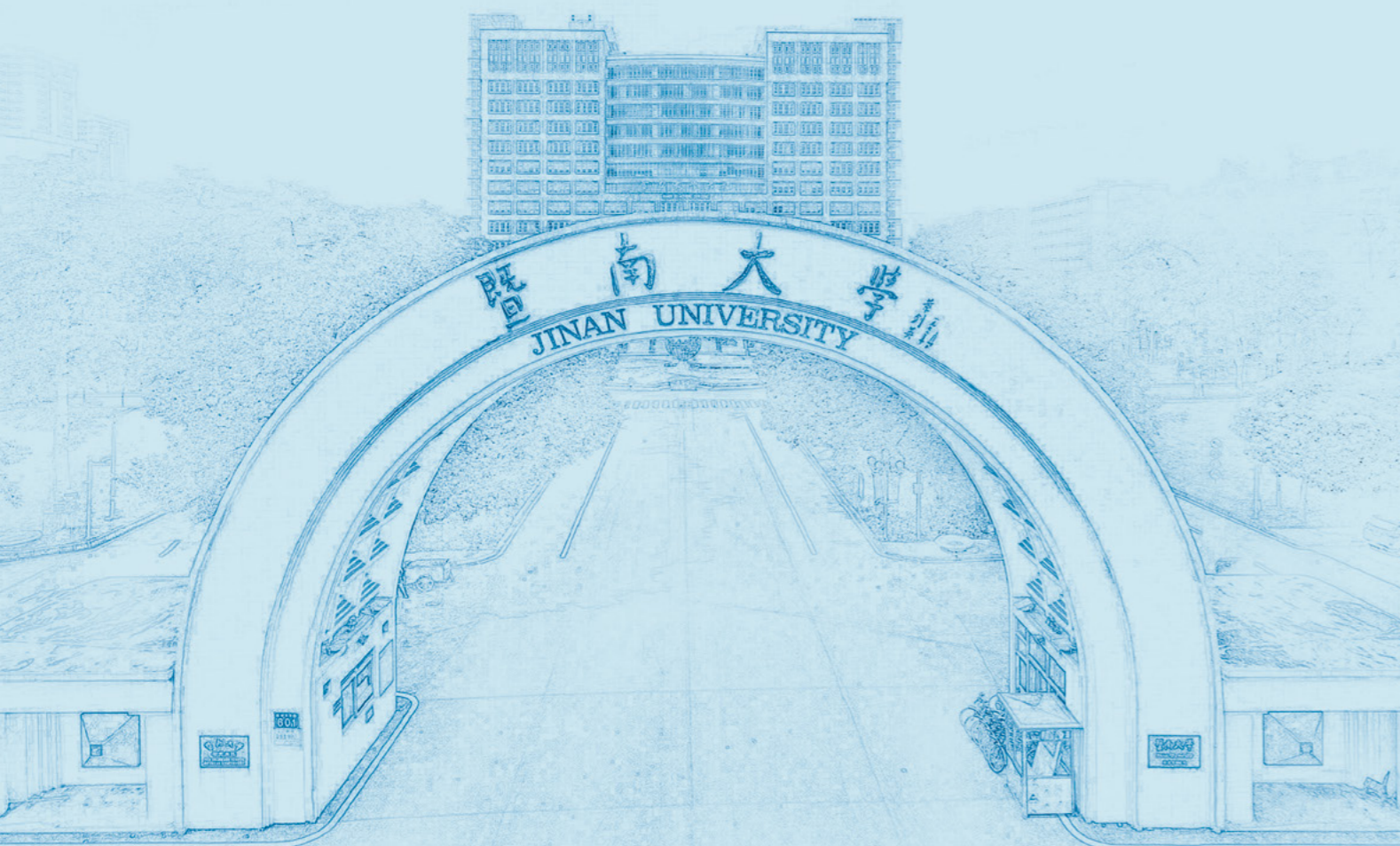


2021年7月1日上午8时,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代表党和人民庄严宣告,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持续奋斗,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这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光荣!这是中国人民的伟大光荣!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光荣!

我院党支部组织学院师生党员在曾宪梓科学馆406室准时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直播。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凝聚人心、催人奋进,让党支部成员心潮澎湃,热血沸腾,备受鼓舞。会后,我院师生党员纷纷热议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并畅谈了对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的感悟。以下为部分感言节选:

### 薄诗雨(党支部书记)

今天在党委组织下收看建党100周年庆祝大会,心情十分激动。当听到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庄严宣告,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的时候,我的心里洋溢着满满的民族自豪感。作为一名有13年党龄的人民教师,我会始终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为党的教育事业奋斗终身,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添砖加瓦。



## 我院党支部开展“党史教育”专题组织生活会

### 唐艺璇(2020级硕士生党员)

始于浙江嘉兴的一艘红船,中国共产党而今已走过百年岁月。虽值百年,但仍处风华正茂,百年来党带领中国人民不断取得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就,且始终葆有旺盛的生机与活力。所谓“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党之所以能在历史长河中愈发闪耀,正是因为能坚守初心和使命,矢志不渝地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为人民利益而奋斗。因此我们作为青年党员,更应铭记初心使命,延续红色血脉,勇担复兴中华之伟大使命;只争朝夕,不负韶华,把青春奋斗融入党和人民的事业之中。

### 王薇(2020级硕士生)

七月的第一个清晨,相聚在曾宪梓 406,大家一道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大会”,我还记得直播中出现的第一次全场掌声雷动,叫好连连的地方,是习近平总书记说到,“中国人民从来没有欺负、压迫、奴役过其他国家人民,过去没有,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同时,中国人民也绝不允许任何外来势力欺负、压迫、奴役我们,谁妄想这样干,必将在 14 亿多中国人民用血肉筑成的钢铁长城面前碰得头破血流!”这样的一段话是如此铿锵有力,撞击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上,生活在社会主义国家,让我们每一个平凡人都获得了心安之所!

### 吴振(2019级硕士生党员)

日出东方,霞光万里,今日有幸观看我党百年华诞,感慨万千。1921,无数英烈先驱筚路蓝缕,怀揣复兴中华民族之梦披荆斩棘,2021,我党坚守初心带领全国人民屹立于东方再度启程,百年征程波澜壮阔,初心信仰历久弥坚,祝福祖国永远繁荣富强!



为了推进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同时总结前一阶段的学习成效,我院党支部于 7 月 9 日下午召开了党史学习教育专题组织生活会。专题组织生活会由党支部书记薄诗雨主持,党支部全体党员参加会议。

三是坚持学用贯通,将党史学习教育与日常工作紧密结合,真正将学习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

会上,支部书记薄诗雨首先通报了半年来党支部工作情况及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情况,详细阐述了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重大意义和基本要求。随后,薄诗雨传达了暨南大学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的安排部署,并强调支部全体党员要深刻领会“七一”重要讲话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核心要义、实践要求,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讲话精神上来。他对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党支部下一步工作提出了三点要求:一是继续深入学习“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统一思想、提高认识、敢于担当、善于作为,为服务学校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二是不断增强党史学习教育的计划性、系统性,推动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党支部书记薄诗雨

随后,全体支部党员交流了学习心得,并对照党史学习教育的目标找差距列不足,结合实际开展了批评与自我批评。以下节选部分党员同志的发言。

党支部书记薄诗雨对比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一盘散沙的局面和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团结奋斗取得的伟大成就, 结合自己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研究谈了党史教育对科研工作的启发与指导。教师党员严子中分享了疫情封闭期间所看到的党员同志冲锋在前的感人事迹, 更加坚信中国共产党能够带领人民走向更美好和更繁荣的未来。学生党员魏静冉表示自去年我国取得脱贫攻坚胜利后, 当代青年学生心中的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越发强烈, 这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制度先进性。教工党员黄汉亮认为, 中国共产党 100 年来始终不断探索, 自我纠错, 终于走出了适合中国人民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高等教育的发展也同样需要勇于尝试和创新。党支部宣传委员武茜对今年以来涌现的优秀文艺作品《觉醒年代》等留下深刻印象, 她认为如何创新党支部党史教育形式, 用当代青年更喜爱的文艺表达形式讲好中国故事, 是我们不断努力的方向。党员同志们纷纷表示, 这段时间的党史学习教育, 使

我们萌生了更强的自豪感以及责任感, 从党史教育中所得到的启发, 是在任何一本历史课本中都无法学习到的。



党支部师生党员踊跃发言

通过此次专题组织生活会, 大家对党史学习教育以及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有了更深入的理解。接下来, 我院党支部将继续按照上级党委部署, 层层推进, 步步落实, 推动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取得实际成效。

## 我院召开纪律教育和师德师风教育专题学习大会



党支部书记薄诗雨(一排左二)主持会议

为严格落实学校《2021 年暨南大学纪律教育学习月活动实施方案》《关于开展暨南大学 2021 年师德师风建设主题教育月活动的通知》等文件要求, 我院于 9 月 10

日下午召开全院教职工大会, 对全院纪律教育学习和师德师风教育工作进行动员部署和专题学习。会议由学院党支部书记薄诗雨主持, 学院党政领导和全体教职员工参加了会议。

会上, 薄诗雨首先传达了学校《2021 年暨南大学纪律教育学习月活动实施方案》《关于开展暨南大学 2021 年师德师风建设主题教育月活动的通知》的文件精神及上级党委的有关工作部署, 详细阐述了开展纪律教育学习和师德师风教育的目的和重大意义。随后, 他就学院纪律教育学习和师德师风教育工作进行了部署, 从主要内容、主要形式和工作要求等方面作了详细安排, 并带领全体教职员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师德师风的重要论述摘编》《新时代高校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关于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师德师风建设的意见》。随后, 他以师德优秀典型先进事迹和师德警示教育中违反高校教师职业行为准则的典型案列等正反例子入手, 生动的进行了纪律教育学习和师德师风教育的讲解。

与会教师就纪律教育和师德师风教育进行了大讨论。冯帅章、张思思、史炜等领导干部与朱宏佳、谢斌等教师代表纷纷发言, 从各个角度谈了自己对纪律教育和师德师风教育的体会。最后, 薄诗雨对下一阶段党史学习教育的重点做了安排。大会在反腐倡廉专题视频中结束。

## 最新发布! 暨南大学 2020 年度蒂尔堡大学 全球经济学研究机构排名并列全国第 9

荷兰蒂尔堡大学“全球经济学研究机构排名”(Tilburg University Economics Ranking) 榜单于近日重磅发布。根据蒂尔堡 2020 年排名榜单, 暨南大学经济学科在 35 本默认国际权威经济学期刊发表数量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并列全国第 9 位, 广东省第 1 位。2017-2020 年 35 本默认期刊发表数量四年排名位列全国第 11 位, 广东省第 1 位。

近年来, 暨南大学经济学科在蒂尔堡大学“全球经济学研究机构”排名逐年攀升, 自 2015 年的 35 本默认期刊发表数量全国排名第 23 位提升至 2020 年的全国并列第 9 位, 呈现出非常强劲的上升势头。

蒂尔堡大学“全球经济学研究机构排名”首发于 2010 年, 被认为是目前较为全面、系统评价世界各大学经济学研究质量的排名体系, 其数据来源为 ISI Web of Knowledge, 涉及经济学、计量经济学和金融学等领域的 70 本主要国际著名经济学期刊, 默认排名选取的是其中的 35 本重要权威期刊。这一排名对于提高各高校经济学科研究质量和水平、促进高校间的良性竞争和发展, 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

排名	学校	发文数量
1	北京大学	41
2	清华大学	28
3	复旦大学	25
4	上海财经大学	23
5	中国人民大学	18
6	厦门大学	17
7	西南财经大学	16
8	浙江大学	12
9	暨南大学	11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11
11	武汉大学	10
	上海交通大学	9
12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9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8
14	华中科技大学	8
	南京大学	8

2020 Tilburg University Economics Ranking  
部分中国大陆高校排名情况(默认35本期刊)

## 我院入选首批新文科研究与改革实践项目

十一、高素质涉外人才培养创新与实践				
22	经济学国际化复合型人才培养创新与实践	冯帅章	暨南大学	暨南大学
23	“内港澳·台·侨”融合型涉外法治人才培养体系创新研究	朱义坤	暨南大学	暨南大学
24	理工科院校全球治理人才培养的探索与实践	钟书能	华南理工大学	华南理工大学
25	高素质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创新与实践	陈云良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广东省教育厅
26	依托国家一流专业建设群，培养适应新时代需求的欧语人才	杨可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广东省教育厅
27	高素质经贸国际组织人才培养模式创新与实践	何传添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广东省教育厅

日前，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发布《关于首批新文科研究与改革实践项目拟立项项目名单的公示》，新文科研究与改革实践项目面向全国普通本科高校开展，设新文科建设发展理念、专业优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重点领域分类推进、师资队伍建设和特色质量文化建设研究与实践6个选题领域、22个选题方向。项目建设周期一般为3年。

我院院长冯帅章教授担任负责人的《经济学国际化复合型人才培养创新与实践》获批立项，成为暨南大学5个获批项目之一。

《经济学国际化复合型人才培养创新与实践》项目基于我院本科专业经济学（国际化创新班）的实践，进一步集聚协同优质资源，创新人才培养模式。该项目旨在通过融合一流的博雅教育和专业教育，以学生为中心，以需求为导向，强调多维度能力培养，使学生能够系统

综合掌握经济学、外语、数学、统计学以及计算机科学等学科和领域的基础知识，具备良好的人文关怀和社会责任感、广博的国际视野、批判思考的能力、良好的沟通能力、以及务实的创新精神。能熟练运用经济学的基础分析框架分析问题，对我国的经济史与现状有深入了解，并在某个经济学专业领域学有所长，从而能够适应激烈的时代变革和新一轮科技革命，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中贡献更大力量。

## 我院智库研究成果入选中国智库综合评价特色案例



近日，由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主办的第四届中国智库建设与评价高峰论坛在京召开。论坛上，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发布了《中国智库AMI综合评价研究报告（2021）》（以下简称《报告》）。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IESR）智库研究成果从454家智库反馈的621份《特色申报书》中脱颖而出，成功入选特色案例。

《中国智库AMI综合评价研究报告》每四年更新一次，2017年，我院已成功入选当年度“核心智库榜单”。在本次评选中，评选课题组依据中办、国办于2015年1月印发的《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充分反映“十三五”时期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突出进展和重要成就，从咨政建言、理论创新、舆论引导、社会服务、公共外交、内部治理创新六大类，共评选出56个特色案例，特色案例均聚焦自身优势与特色，在机制

体制改革和智库功能发挥等方面进行了突破性探索并取得重要经验。IESR提交的案例《综合改革示范区为经费管理开辟新道路》入选“内部治理创新”特色案例。



## 冯帅章教授被评为全国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和困境儿童保障工作先进个人



近日，民政部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和困境儿童保障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发布关于表彰“全国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和困境儿童保障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的决定。根据评审相关方案，经过地方逐级推荐、评审、征求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和困境儿童保障工作部际联席会议成员单位意见、社会公示等程序，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和困境儿童保障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决定授予199个集体为“全国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和困境儿童保障工作先进集体”，400名同志为“全国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和困境儿童保障工作先进个人”。我院院长冯帅章教授被评为“全国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和困境儿童保障工作先进个人”。

冯帅章长期关注和研究我国的人口流动问题，持续参与对在人口流动大背景下产生的流动儿童、留守儿童

等特殊群体的关爱与保护工作。作为民政部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广东省民政厅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他从研究和实践等多方面尽力为全国农村留守儿童的关爱保护及困境儿童保障工作献计献策。

在实践方面，冯帅章一直积极投身到民政部关于全国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和困境儿童保障工作之中。2016年至今，他先后受民政部委托，作为负责人开展2016年度和2017年度对全国农村留守儿童现状的数据分析；2016-2019连续4年带队开展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与困境儿童保障工作的第三方评估，先后前往湖南、江西、云南、贵州、安徽、浙江等省份，共计实地评估16个县（区）32个乡镇64个行政村，客观记录和见证了近年来我国不同地区的留守儿童保护和困境儿童保障工作的发展、成绩以及经验。



2017年冯帅章在云南某地民政局  
听取工作汇报、开展座谈会

在研究方面，冯帅章与200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芝加哥大学 James Heckman 教授合作在四川绵竹发起一项关于儿童认知与非认知能力的长期追踪项目（以下简称“绵竹项目”），聚焦人力资本的早期投资及人口流动所带来的留守儿童问题，尤其是留守儿童的认知与非认知能力发展及其影响因素。该项目自2016年启动，2017年正式在当地20所小学同步开展，截止目前已持续跟踪4年，覆盖上万学生及其教师和家长。基于这一项目，冯帅章与 Heckman 教授共同合作的论文 Sensitivity of Self-Reported Noncognitive Skills to Survey Administration Conditions 被国际顶级期刊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PNAS) 接受发表（其他合作者：Yuanyuan Chen, Tim Kautz）；Heckman 教授在2018年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也在演讲中分享了与冯帅章合作的研究“中国的技能投资 (China's Investment in Skills)”。

这些数据及学术研究成果从理论层面探讨了留守儿童问题，同时又将留守儿童问题延伸到我国的早期人力资本投资这一更高层面之上，为政策的制定探索可行的发力点。上述研究发现还通过新闻媒体，例如FT中文网、财经网、财新网、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等媒体渠道公开发表，在学术研究的基础上，也获得了广泛的社会关注，引发公众对该问题的热议。



2016年冯帅章参与绵竹项目，指导受访人填写问卷

冯帅章不仅亲身投入到该问题的研究和实践中，还积极为流动人口子女的教育问题奔走呼吁，搭建有影响力的交流平台。冯帅章作为发起人，自2017年起每年举办“流动人口子女学术研讨会暨政策论坛”，邀请国务院、民政部、卫健委等国家部委与学者和一线工作者共议留守儿童与流动儿童问题，至今已举办五届。论坛上除了发布绵竹项目的年度报告之外，还邀请学校教师、社区工作者和长期从事留守儿童保护工作的热心人士集聚一堂，分享经验、讨论解决之道，论坛为社会各界人士搭建了沟通交流的平台，呼吁更多有识之士关注并参与到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和困境儿童的保障工作中，扩大这一话题的社会影响力。

## 冯帅章教授受聘为广东乡村振兴智库 首批专家委员会委员



2021年8月3日下午,广东省农业农村厅(省乡村振兴局)与南方报业传媒集团联合发起的广东乡村振兴智库正式成立。广东省委农办主任、省农业农村厅厅长、省乡村振兴局局长顾幸伟以及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党委书记、社长黄常开分别在成立仪式上致辞。

为全力做好深调研等工作,广东乡村振兴智库还成立专家委员会,聘请知名“三农”专家学者共同助力广东乡村全面振兴。在启动仪式现场,暨南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院长冯帅章、华南师范大学“三农”与城镇化研究所所长胡靖、广东农村研究院专职副院长王建军、卓创乡建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姚碧云等首批专家接受智库专家聘书。

据了解,依托专家委员会的智力资源,广东乡村振兴智库将在省农业农村厅的指导支持下,开展乡村振兴课题研究,聚焦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等重点领域,不定期发布研究报告,支撑服务广东“三农”工作。

## 秋季新学期,我院教学工作顺利开展



2021年8月30日,新学期开始,我院贯彻落实暨南大学关于疫情防控秋季开学相关工作的安排和部署,从严从速筑牢校园疫情防线,确保返校师生身体健康,共同守护校园安全。除中高风险地区学生未能到校,其他到校学生都已完成新学期报到注册,本学期课程仍然采取线下与线上教学结合方式。

### 筑牢校园疫情防控线

在学生返校前,教务组指导学生通过每日健康打卡申报健康情况,根据学生填报的个人健康信息、行程信息,教务组逐一严格审核每位申请返校学生条件。开学后,教务组对已返校学生进行疫情防护知识的教育普及,细致引导学生做好个人防护。

### 教学工作顺利开展

教务组召开统筹会议,做出工作部署,确保疫情防控与教学工作“两手抓”。开学第一周,我院教师以严谨踏实的教学态度投入课堂,认真备课,按时到岗。同学们聚精会神地听讲,课堂秩序井然有序,全体师生以饱满的精神面貌投入到新学期的工作和学习中。



郑立老师《中级微观经济学》课堂



刘丛老师《中国经济史》课堂

面规划。我院将严把教学质量关,继续贯彻我院具有国际化特色的人才培养模式,推进人才培养工作再上新台阶。



学院领导班子行政会议

### 全面部署各项工作

学院领导班子召开行政会议,了解教学、科研、行政方面的工作进展,对本学期各项工作进行详细讨论与全

## 我院举办教师节暨迎接新教师茶话会



2021年9月10日下午两点,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全体教职工齐聚暨南大学曾宪梓406会议室,举办教师节

暨迎接新教师茶话会活动,共同庆祝第37个教师节!学生的成长离不开老师们的关怀与帮助,学院的成长同样离不开老师们的奉献与付出,向各位勤奋、可爱的老师们表达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茶话会伊始,冯帅章院长首先对新教师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他们年轻有为,学术能力过硬,为学院注入了新的活力和能量。接着,冯帅章院长对所有教师致以节日的问候,感谢大家的辛勤付出与无私奉献。他表示学院将始终把教师队伍建设作为重要工作,支持教师发展,保障教师所需。他强调全体教师应注重师德师风建设,持续提升师资队伍水平,牢记立德树人、为国育才的职业使命,保持乐教善教、治学奋进的工作态度,为培养合格的社会主义接班人贡献力量。与会教师深感冯院长所提职业使命的重要性,会议席掌声不断。



冯帅章院长

接下来,为深入贯彻全国教育大会精神,落实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精神,进一步更新观念、解放思想、厘清思路、凝聚共识推进暨南大学“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以下简称“四新”)建设,全面提升人才培养能力,在副院长史炜主持下,全体教师参与“四新”建设大讨论,讨论了“新高考”对“四新”建设的机遇与挑战,如何促进学科交叉,强化专业内涵建设,建立开放、协同、多学科人才培养平台,加快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等问题。



新教职工自我介绍

精心布置的会场上,学院行政团队还准备了许多可口的茶点供大家品尝。琳琅满目的蛋糕点心,令人垂涎欲滴。与会教职工们欢聚一堂,在品尝点心的过程中畅聊工作与生活。

伴着茶点的芳香与欢声笑语,学院教职工们在温馨有爱的环境中逐渐褪去了起初的拘谨感,拉近了彼此的距离。本次茶话会让全体教职工加深了对彼此的认识与了解,也为新学期的各项工作顺利开展奠定了良好的开端。相信全体教职工必将以更加饱满的热情和积极的工作态度,投入到各自的工作岗位中,发挥才干,奉献青春,推进学院各项工作步入新台阶。



教师热烈讨论

为了增进同事之间的了解,会议安排了新教职工进行自我介绍作为“破冰”环节。新入职的教职工热情洋溢地展现自我,或分享工作背景,或分享兴趣爱好,或讲述生活趣事等。精彩纷呈的自我介绍获得阵阵掌声与欢笑声。

## 我院举办 2021 级新生开学典礼



2021年9月17日下午3点,经济与社会研究院(IESR)开学典礼在曾宪梓科学馆406室顺利举行。本次开学典礼由 IESR 副院长史炜主持,IESR 冯帅章院长,助理教授陈思宇,教务秘书黎莉、任春蕊及 2021 级本硕博新生、2020 级转专业学生出席本次开学典礼。开学典礼共分“国歌合唱”“院长迎新致辞”“教师代表发言”“学生代表发言”“师生留念合影”五个环节。



副院长史炜主持

合唱过后,冯帅章院长以“不负青春,踏实奋进,潜心问学,夯实基础”为题致辞。“他首先对 2021 级新生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我们希望通过开学典礼这样一个庄重的仪式,增强大家对 IESR 的归属感,引导大家走好未来这几年的求索之路。在接下来的四年乃至更长时间里,你们将在此完成人生的重要蜕变。”接下来,冯帅章院长从国际化师资、国际化教学体系、国际化学术活动等方面重点介绍了 IESR 国际化的学术环境。IESR 会为大家提供丰富的实践活动,构建广泛的学术交流机会,营造浓厚的学习氛围,以能力之所长为每一位学子的未来发展保驾护航。



冯帅章院长致辞

在讲话中,冯帅章院长对 2021 级新生提出以下几点希望。一是希望同学们要有家国情怀,用专业能力、专业知识亲身感受中国经济的发展脉搏,为国家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二是希望同学们在学习上永葆奋进精神,保持专业敬畏心。冯院长提到在瞬息万变的今天,更需要脚踏实地的进行专业积累,时刻保持冷静的思维方式与积极的进取精神将会对未来的学习与工作有极大的帮助。三是希望同学们能够享受生活,不负韶华。在 IESR 志同道合的朋友,收获一段充实美好的青春回忆。



陈思宇老师发言

2018 级本科生卢雅雯同学作为学生代表为大家分享了她在 IESR 里的学习生活体会与感悟。她用“充实”和“努力”两个词概括在 IESR 的生活。全英文的教学能让她尽早并尽快地养成英文思维方式,为未来的升学打下了坚实的语言基础。一场又一场的名师学术讲座帮助她一点一点地建立学术思维。在 IESR,“努力”不再是名词,而是动词。除了充实的学习生活以外,IESR 也充分关注着同学们的成长与进步。独树一帜的本科生导师制度也让大家能够及时和导师交流自己的想法与问题。漂亮又暖心的辅导员老师也时刻关心着大家的学习生活和心理健康。朋辈分享会、篮球赛、乒乓球赛等活动增进同学情谊的同时,也让大家的课余生活变得丰富多彩。



同学们认真聆听

2021 级本科新生班主任陈思宇作为教师代表发言。陈思宇老师表示作为老师,她从心底里认为每一位学子都有巨大的潜能,都会成为适合自己个性的人才。但这种结果需要大家拥有乐观的心态,持之以恒的努力,和追求卓越的心才能实现。最后陈思宇老师讲述了“学好”与“好学”的不同,希望大家在迎接大学生活踌躇满志时,面对新的竞争压力倍感郁闷时,停下来,想一想“学好”与“好学”的区别,既不要被“学的好”而误导,也不要被“学不好”而打击,要记住“好学”远比“学好”更重要。



卢雅雯同学发言

2021 级硕士新生郭佳惠同学作为新生代表发言。她动情地表示现在仍然记得 IESR 夏令营充实的讲座安排和友善的老师们,四天的高质量讲座让她对 IESR 的学术氛围充满了憧憬,她认为能如此认真、诚恳地给未入学的众多学生们提供知识的学院一定是一个有朝气、有担当的大家庭。开学时热心帮助的志愿者们,友善的同学和辅

导师,认真备课、因材施教的老师让她对适应新环境的焦虑和担心烟消云散,很快融入了这个大集体。她认为,在这样的环境下,大家一定能搭载 IESR 的提供充足燃料的火箭,冲向美好的未来。



郭佳惠同学发言

至此,2021年 IESR 新生开学典礼顺利结束,新生们也开启了人生新篇章。预祝未来的他们脚踏实地、不忘初心,在 IESR 载梦启航,驶向远方。



师生合影

## 乡村振兴研究院与建行广东分行 共建乡村振兴学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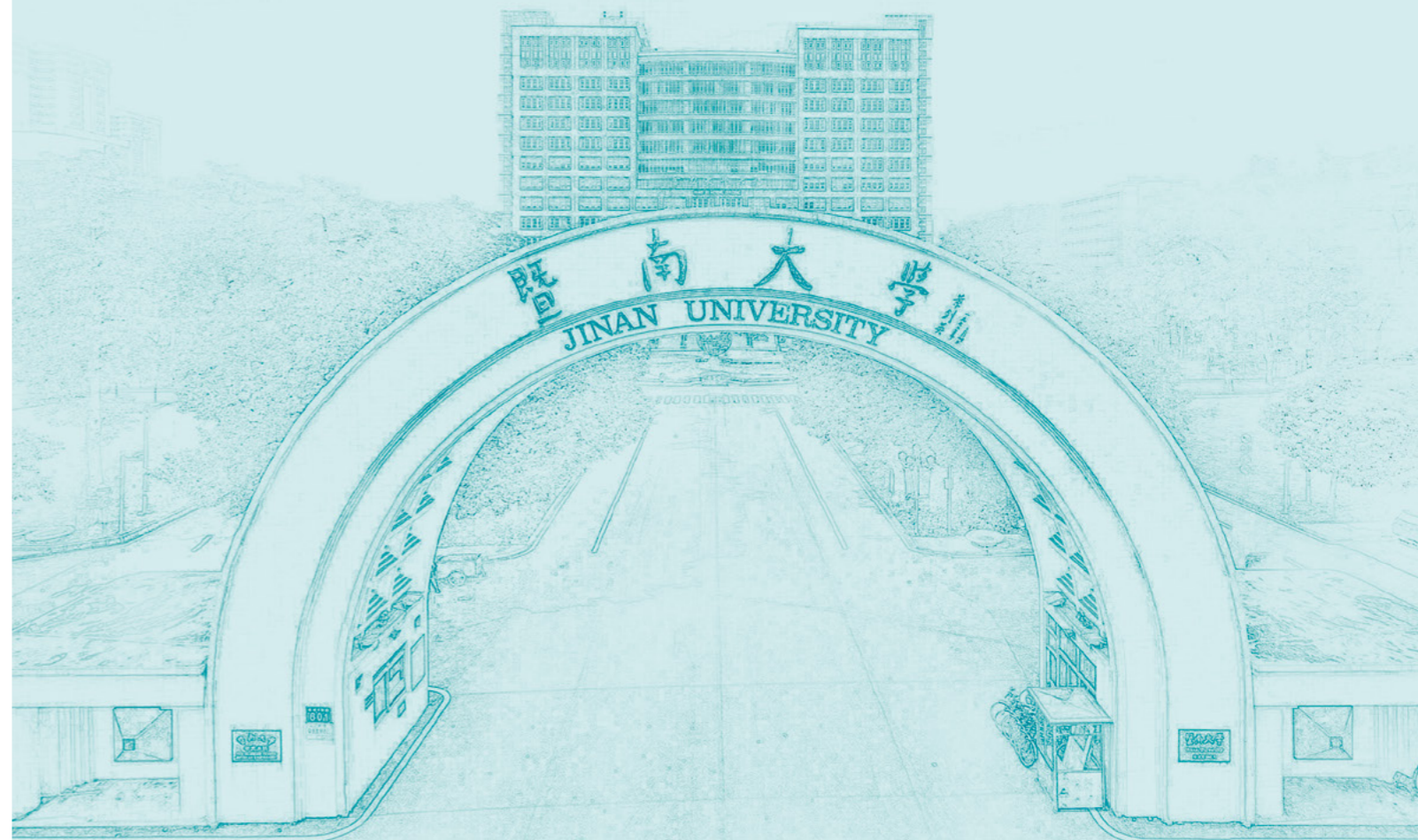
近日,暨南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与中国建设银行广东省分行签订乡村振兴战略框架合作协议。乡村振兴研究院副院长卢晶亮副教授参加了协议签约仪式。双方将共建“暨南-建行乡村振兴学院”,将立足广东,为建行的乡村振兴相关工作提供支撑。具体内容还包括共同开展乡村振兴数据调查和相关学术研究,定期举办系列讲座、专家研讨会等活动,共同开展面向农村基层人员的培训等深度合作。

暨南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将立足高质量的农村微观数据,开展系列政策咨询服务,携手建行,共同助力乡村振兴。



签约仪式现场

# 科研动态



## 科研立项

### 我院获批 3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近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公布了 2021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集中受理期申报项目的评审结果。我院共获得 3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立项, 获批直接经费总额 121 万元。我院今年面上项目资助率高达 40%, 远高于 2020 年管理科学部面上项目的资助率 15.39%。

经济与社会研究院 2021 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资助清单

序号	项目批准号	负责人	项目名称	项目类别	获批金额 (单位: 万)
1	72103079	严子中	基于狄利克雷过程的平均处理效应估计和异质性分析方法: 理论及应用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24
2	72173056	蔡澍	社会网络选择视角下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同和劳动力市场表现研究	面上项目	49
3	72174074	张思思	房地产调控的微观传导机制与效应研究: 基于厂商决策和居民福祉的分析	面上项目	48

## 论文发表



### *Journal of Economics & Management Strateg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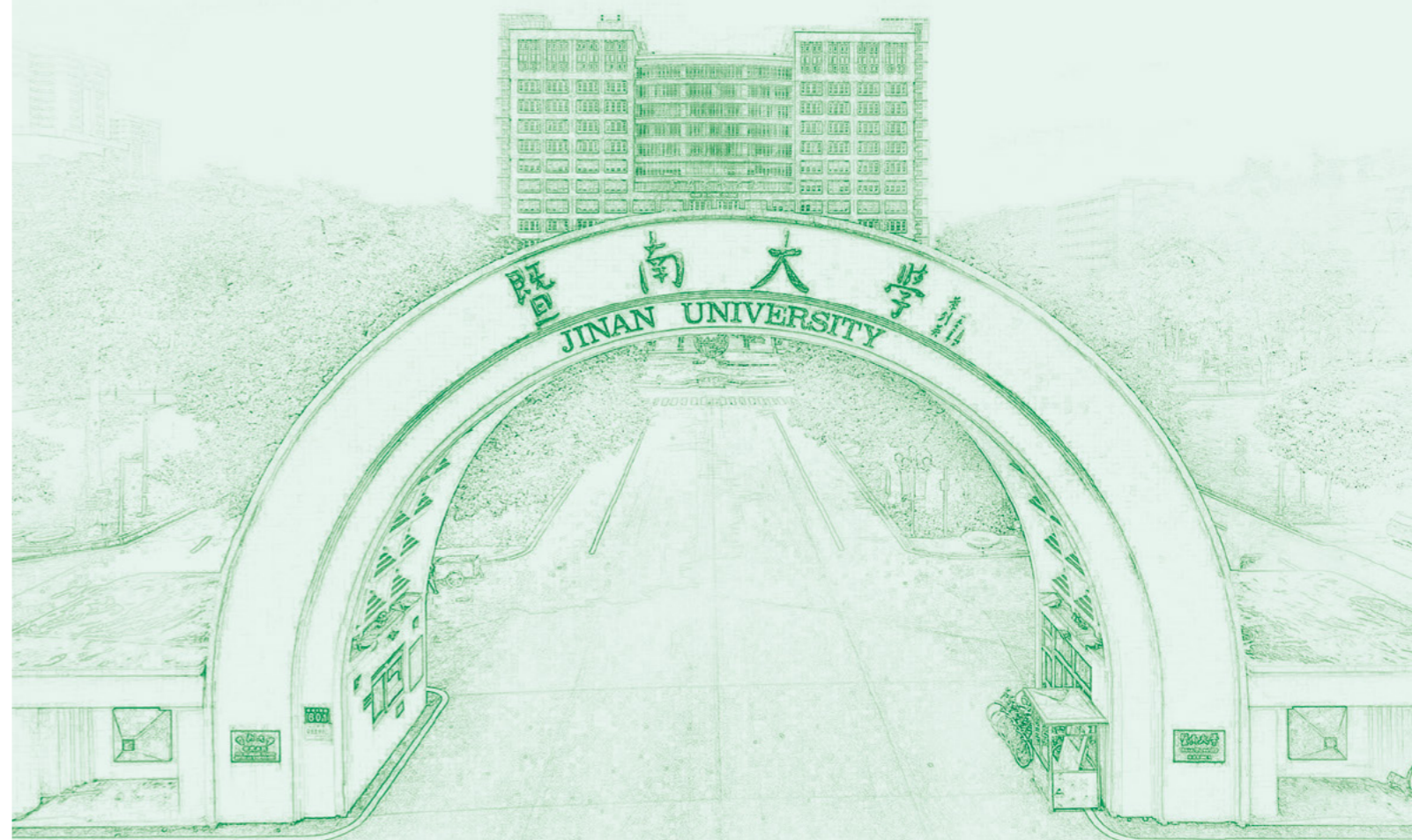
我院助理教授刘珂的合作论文“Exclusive dealing when upstream displacement is possible” (合作者: Xiaoxuan Meng) 被国际著名经济学期刊 *Journal of Economics & Management Strategy* 接受发表。



###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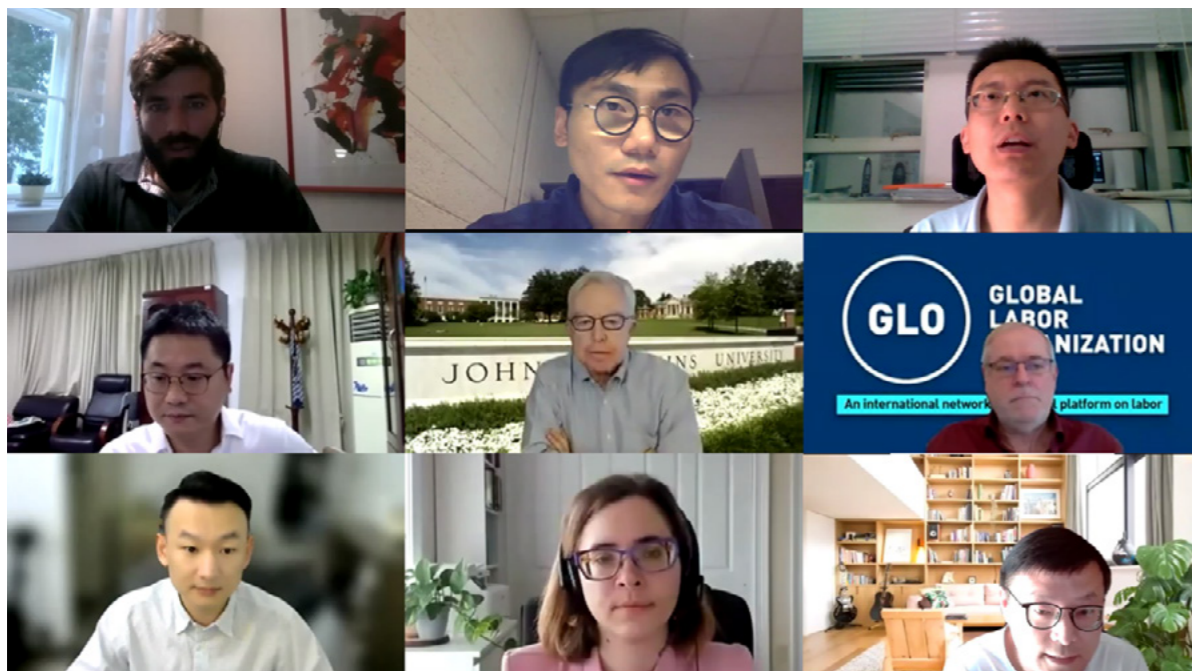
我院助理教授朱宏佳的合作论文“Impact of temperature on morbidity: New evidence from China” (合作者: Sumit Agarwal, Yu Qin, Luwen Shi, Guoxu Wei) 被环境经济学顶级期刊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接受发表。

# 学术活动



## 学术会议

## IESR-GLO 第四届联合会议顺利举办



近日，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IESR）与全球劳动组织（The Global Labor Organization, GLO）通过线上平台共同组织了第四届 IESR-GLO 联合会议。近 20 位来自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东京大学、国立首尔大学、哥德堡大学、乔治亚大学、弗吉尼亚理工学院、暨南大学等海内外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受邀相聚云端，从经济学的角度，围绕各个国家不同的社会保障制度进行了深入的学术交流。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Robert Moffitt 教授与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 Timothy Smeeding 教授受邀担任本次会议的主讲嘉宾。Robert Moffitt 教授的演讲主题为“Take-up in social assistance programs: theory and evidence”，他从理论和实证方面分析了测量、成本、社会污名、信息和制度约束等对社会救助覆盖面的影响。



Robert Moffitt教授

消除一切形式的贫困是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17 个目标中的第 1 个，为此世界各国政府和组织都重点关注加强社会救助和转移支付等社会保障制度，尤其是扩大覆盖面。社会救助旨在保证每位公民的基本生存和发展权利，然而社会救助并不总能为目标人群提

供支持，如果钱越多越好，为什么有人并不乐意拾起十字街头的一元钱？为什么不同社会救助项目的覆盖面存在巨大差异？Moffitt 教授从测量误差、参与成本、社会污名、信息不对称不完全和项目制度约束等角度来提供解释。

首先，社会救助覆盖面的测算存在一定的测量误差，不同的项目适用于不同的数据和衡量标准，对象界定的复杂程度也会影响其准确核定。而且高社会救助水平会激励人减少劳动供给、减少甚至瞒报收入，这种“养懒汉”和“隐性就业”现象会高估社会救助覆盖面。但这些误测相比起福利缺失仍是次要的。

其次，参与社会救助项目需要付出一定的时间、精力和金钱成本，较高的参与成本会降低人们申请社会救助的激励（Currie and Grogger 2002）。但是这些成本也作为一种信号甄别机制，一定程度上能减少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更精准识别救助最需要救助的人。

再次，出于自尊和社会的偏见歧视的社会救助污名化，也会减少人们参与社会救助。Moffitt 教授将参与社会救助的羞辱感视为成本引入效用最大化模型，发现其存在会导致多重均衡。Fraker and Moffitt (1988) 通过研究抚养未成年儿童家庭援助（Aid to Families with Dependent Children, AFDC）和食品券（Food Stamps），发现两个项目的羞辱感正相关，参加一个项目的人有更高概率参加另一个项目。

信息不对称不完全导致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一直是社会救助的难点重点。DaPonte (1999) 通过随机对照试验验证了提供更多信息能够减少人们参与社会救助的不确定性和风险，从而提高参与概率，并且收入更低、能从救助项目获益更多的人有更多激励来获取信息。政策制定者还可以用配额、是否附加条件等制度约束来“选择”接受社会救助的人。

社会救助的目标是让最需要社会救助，即社会救助边际效用最高的人接受社会救助，然而参与成本、羞辱感和不确定性等会导致稀缺的救助资源并不都能配置到最需要的人手中，因此实现精准有效的社会救助需要充分考虑这些因素。

Moffitt 教授接着讨论了我国的低保制度，这项建立于九十年代的无附加条件的现金转移支付制度，已纳入各级财政预算，由当地人民政府确定、执行和调整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对象的资格认定是低保的突出问题，“人情保、关系保、错保、漏保”屡禁不止，并存在较大的城乡地域差异。这部分是由于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尤其在农村地区，很难准确衡量并核实作为界定低保主要依据的家庭收入。Moffitt 教授认为实现低保“应保尽保、应救尽救”的主要障碍并不在于侮辱感、信息不对称不完全和参保成本，而主要是政府的制度约束。中央和各级政府需要努力奋斗，推动建立健全低保专项治理长效机制，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Timothy Smeeding 教授的演讲主题为“Poverty and Income Support Around the World: China, India and Asia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本次讲座主要分为六个部分。首先，教授引入了讲座中将涉及的基本概念、统计指标和测度方法。他指出，家庭收入计划（Income Package）主要包含市场收入（MI），即通过个人努力从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储蓄或职业养老金等获得的收入；来自其他非同居家庭成员间的转移；以及公共部门的再分配。市场收入（MI）以及考虑再分配后的可支配收入（DI）是接下来讨论的重点。



Timothy Smeeding教授

第二部分对当今世界贫困现状进行了总结。得益于经济增长，世界减贫工作已经取得一定进展。例如第一个千年发展目标，即 2015 年贫困率下降至 1990 年的一半，于 2010 年提前实现。根据最新数据显示，2017 年发展中国家中 10% 以下人口的日收入低于 1.90 美元，远

低于1990年(37%)和1981年(44%)。教授指出,随着极端贫困人口比例的持续下降,接下来的研究应提高贫困线标准,如世界银行已经在\$2每日的基础上增加了\$3.2每日和\$5.5每日的贫困线标准。

第三部分对国家间的增长和不平等问题进行了比较分析。目前中国及部分中低收入的西方国家面临“增长红利”持续减少的问题,为此各国采取了不同的应对政策。以中国、美国和法国为例,中国的经济增长最快,但同时也面临着最严重的不平等问题:高收入群体吸纳了社会绝大部分的收入和财富,且这一比例呈持续增长态势,社会贫富分化加剧。但教授也强调,在关注相对贫困时也不能忽略实际生活水平提高带来的影响。当低收入群体的实际收入以每年4-5%的幅度增长时,人们对不平等问题采取更加宽容的态度。

第四部分利用LIS(The Luxembourg Income Study)微观数据库,对当前世界贫困现状和社会救助项目的效果进行了分析。数据显示,当前总体贫困程度最高的国家为巴西、中国、印度、南非以及老挝;很多国家存在严重的儿童贫困问题;而老年贫困问题看似严峻,但可能存在一定误导。其次从社会救助项目的政策效果来看,亚洲国家的再分配程度较低,且对教育、健康等方面的长期人力资本投资不足;一些社会救助项目,如中国的“低保”,存在瞄准效率较低的问题。虽然相对贫困问题在发展中国家和一些金砖国家仍十分严峻,但我们也应看到经济增长带来的绝对贫困的下降。

第五部分对未来的研究方向进行了探讨。教授指出,未来研究不应局限于收入、经济增长以及减贫政策带来的短期效应,而应更多关注社会幸福感和代际流动,即代际间社会地位和生活状况的变化。此外,环境恶化问题使贫困人口面临更严峻的威胁,因此有待更深入的研究。

最后一部分,教授针对目前世界贫困与不平等问题提出几点政策建议。他指出应加大对人力资本,尤其是儿童人力资本的投入;增加对资本收入的征税;推行强

制性的养老金固定缴款计划;促进共同繁荣和包容性增长;同时,给予劳动者更多发声的机会。

除了主题演讲,本次会议还包含政策讨论及学术报告环节,为期三天的学术盛宴因高质量的论文分享及深入的讨论广受好评。自IESR加入GLO成为其支持机构以来,双方不断深化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在劳动力市场、人口及人力资源等研究问题上,双方已顺利组织开展了四届联合会议,为该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以及对该领域感兴趣的普罗大众提供了一个国际化交流平台。未来,IESR将继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为GLO提供更多支持并组织GLO在中国举办的学术活动,广邀国内外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共商全球经济发展对策。

## 暨南论道

### 南京大学张炳教授谈中国环境治理



2021年9月16日下午,经济与社会研究院“暨南论道”公开系列讲座第32期于中惠楼323会议室顺利举办。南京大学张炳教授受邀担任本期主讲嘉宾。张炳教授主要从事环境管理与政策分析、环境经济学等领域的教学和研究。在讲座中,张炳教授就中国环境治理这一主题从信息披露和公众参与的角度进行了介绍。

张炳老师以中国环境治理的两个重要政府文件为引,给听众介绍了有关中国环境治理的一系列关键政策问题,使同学们对这一领域的许多政策和具体细节有了一个较为清晰的认知。张炳教授首先介绍了我国政府关注和应对环境问题的两大途径:一是常规的政策议程途径,也就是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通过提案向中央政府提出环境方面的政策建议,中央政府给予反馈;另一个的重要途径是“事件驱动”,中央政府通过风险扫描(risk scanning)来检测存在重大社会风险的事件,比如环境方面的事故或者经过舆论发酵的“热门事件”,从事件出发解决问题。张炳老师以环境污染中广为人知的PM2.5作为例子,向听众讲解了事件驱动途径的具体过程。事件驱动途径实质上展示了一种自下而上的驱动力。

中国环境治理体系可以看作一个“三明治”结构,中国的目标责任制使得中央政策需要层层传导到地方政府执行,地方政府的任务是监督污染企业,与此同时公众自下而上的对地方政府进行监督。中央政策在地方政府的执行总是有着重重困难,应对中央传达的环境治理任务,地方政府往往有一个策略性的应对,例如跨境污

染、数据造假等途径。中央采取了垂直管理、中央环保督察组、抓大放小等策略激励地方政府有所作为,但总是存在一些效率受损或长期效果不足的问题。因此公众自下而上的对地方政府进行监督从而激励地方政府履职这一途径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领域。



讲座现场座无虚席

张炳教授分享了一个非常具体的、正在推进中的相关研究。这一课题在全国范围内推进了一个随机对照试验(RCT)去探究了公众参与(citizen participation)对地方政府环境监管执行(enforcement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效果的影响。张炳教授具体讲了数据处理过程,使同学们了解到许多关于环境数据处理的技术常识。原始数据处理过程和实验推进步骤很复杂,课题组与许多关注环境问题的非政府组织(NGOs)进行了合作。结论显示,在微博等公开途径进行的投诉对激励政府监管的效果更加显著,使得受处罚企业污染再次超标的概率降低了约40%。此外,公开途径的公众参与也具有显著为正的溢出效应,降低了同一地区的其他企业污染排放违规的概率。验证了公众参与这条自下而上的途径对于激励地方政府在环境治理问题中有所作为的有效性。

本次讲座张炳老师既给师生们介绍了有关中国环境治理这一系列的、成体系的研究,又与同学们分享了一个具体的相关经济学研究,讲座的尾声同学们积极提问并得到老师的反馈,解决了心中好奇与疑惑,收获颇丰!

# 思想聚焦

## 乡村振兴专题

### 冯帅章在《学习时报》撰文：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亟待破解三个难题

作者：冯帅章（暨南大学经济学院、经济与社会研究院、乡村振兴研究院院长，教授）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而乡村振兴战略正是破解我国“三农”问题的金钥匙。针对当前在推进乡村振兴过程中遇到的一些现实问题，通过乡村振兴战略的具体实施，精准识别并满足不同年龄阶段农村人口最关键的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其中，教育、就业和养老，是我们亟待破解的难题。

#### 良好的教育是提升农村人口 整体素质的重要因素之一

受教育程度是决定人口素质的重要因素，且受教育水平与居民收入水平密切相关。据2020年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全国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4.3万元和1.7万元。显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依然较大。此外，教育水平的差距还会导致不平等的代际传递，目前农村居民的代际收入流动性显著低于城市居民。提高农村人口的教育水平是从根本上缓解城乡间的不平等，也是促进城乡均等化发展的治本之策。

随着农村教育投入的逐年增加，虽然在“量”的层面上已经取得了非常明显的成效，许多农村地区的办学条件也得到了明显的提升，但是在“质”的方面上依然没有得到根本性转变。一是由于农村学校的特殊地理分布。国家关于农村学校布局调整，强调的是首先要关注学生受教育权利的实现及受教育机会的获得。然而，政策传递到一些地方，却产生了不小的变形，许多地方政府把目标定位在“通过扩大校均规模实现资源最优化”。如此一来，相比家门口的“小而美”学校，过度集中带来学生上学时间和经济方面的成本增加，可能得不偿失。二是师资之类的“软件”建设急需跟上。不少乡村学校在教师招聘方面存在“招不到、留不住”的困局，缺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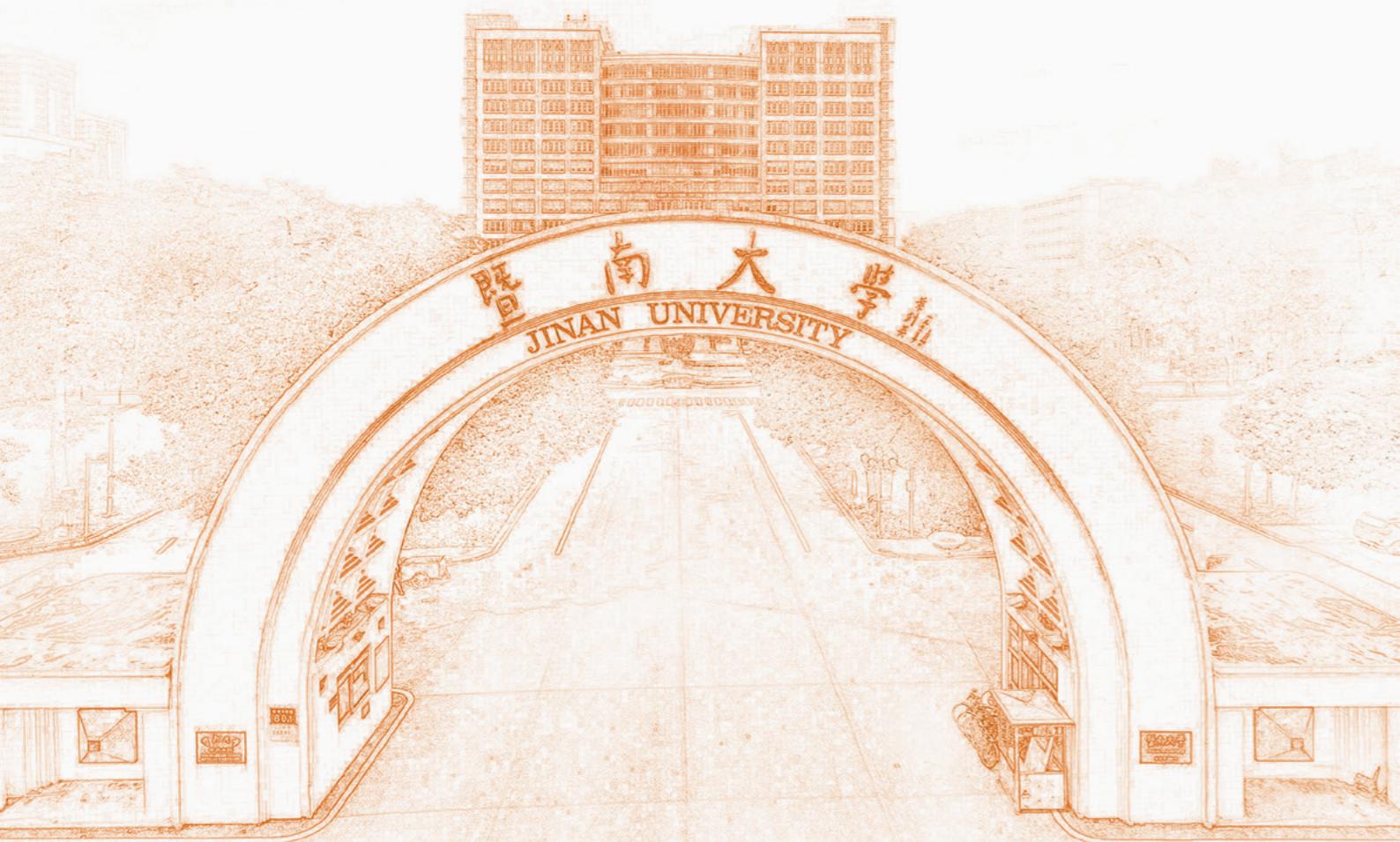
优秀的师资。在这方面，政策应着力通过提高待遇、支教交流、轮岗培训、评优评奖以及远程教育等机制，确保农村学校的师资质量和教育水平。

留守儿童教育问题不仅仅是教育方面的问题，而且是我国社会发展阶段中的一个特殊产物，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现象。一方面，父母外出务工可能导致留守儿童在心理健康等非认知能力上发生障碍，并带来长期的不利影响。另一方面，流动少年儿童在流入地仍然面临不能与户籍少年儿童同等机会接受义务教育的困境。鉴于此，流入地政府可以通过将流动人口教育需求纳入公共服务规划、兴建更多公办学校、政府出资购买民办学校学位的方式加大普惠教育供给，破除户籍制度造成的壁垒，营造一个关爱农村留守儿童的社会环境，加强并完善对农村留守儿童的教育和监护体系。

#### 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 是个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对于青年人来说，无论是生活在城市还是乡村，关键的需求是高质量的就业机会。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与2010年相比，城镇人口增加23642万人，乡村人口减少16436万人，城镇人口比重上升14.21个百分点。农村人口进城在过去40年内成为中国经济增长，人民收入增加的重要推手。

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是建设现代农业、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也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更是增加农民收入的主要途径之一。目前，非户籍人口在城市就业市场中还处于相对不利的地位，就业质量较低，在工资水平、保障水平方面都有待提高。与此同时，流入地政府还应积极推进非户籍人口的“市民化”待遇，使得这些从农村转移过来的非户籍人口能够在各方面



融入城市，最终实现完全的城镇化。同时，县域经济是城市经济与农村经济的结合部，是农村居民获得非农就业机会的主要地域。随着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加快特别是产业振兴的推进，也将为农村劳动力年龄人口提供越来越多的高质量就业机会。县域经济的发展，特别是第二、三产业的发展，可以为农村居民就地提供大量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的机会。

综上所述，农村劳动转移就业是一个社会发展转型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问题。可以说，随着农村人口“老龄化”速度的不断加快，农村人口结构中青壮年数量的不断减少，对农村的人口结构和就业选择产生极大的影响。因此，我国应该对农村人口结构变化的规律和特征进行有效的分析，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过程中，加大对农业生产的扶持力度，从而推动农村农业的稳定发展，它关系到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农村深化改革以及产业化发展转变的大局。所以，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问题，我们要从乡村振兴战略的高度给予重视，不断总结经验 and 做法，使农村劳动力能快速有效地实现更高质量的转移就业。

### 农村养老服务须纳入到 乡村振兴战略的全局上来统筹

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老龄化水平城乡差异明显：从全国看，乡村60岁、65岁及以上老人的比重分别为23.81%、17.72%，比城镇分别高出7.99、6.61个百分点。和六普数据比较，农村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14.98%）上升约8个百分点，比六普城乡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差距（3.19%）高出4.8个百分点。可以看出，城乡老龄化差距正在不断拉大，乡村老龄化程度更高、更严重。因此，农村养老问题，需要纳入到乡村振兴战略的全局来统筹。

农村老龄人口大致可分为两个不同类别的群体。第一类是20世纪80年代开始入城务工的乡城流动人口，随着年龄增长与城市就业困难开始“落叶归根”。第二类是一直在农村务农的农村老龄居民。这两个群体都面临非常严峻的医疗健康方面的挑战。对于前者而言，他们在城市务工多年，部分人在安监、职业防护不达标的环境下从事劳动，面临诸如尘肺病、工伤等职业病的困扰，又未能充分享受到城市的社会福利制度保障。对于

后者而言，他们常年从事繁重的农业生产劳动所致的慢性疾病，以及农村相对较差的公共卫生水平，都对他们的健康产生了非常不利的影响。虽然当前农村已经建立起广覆盖、保基本的医疗保障体制，但保障水平与医疗服务的质量还比较低。而农村劳动力的大量外流导致农村的“空巢老人”“留守老人”逐年增加，对传统的养老格局形成巨大挑战。随着新型城镇化战略的推进以及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趋势的继续，留守农村的老龄人口容易陷入“老无所养”的窘境。

有鉴于此，在政府的支持下，结合农村“熟人社会”的特质，社区养老模式或许是农村养老可探索的有益思路。较城市社区而言，农村的社区互助养老除了具备天然优势，可以发挥邻里互助、熟人互助的作用外，还可以通过组建老人互助小组、老年协会、时间银行等形式，建设农村幸福院、养老大院等互助养老服务设施，打造农村社区的互助养老体系。这样一来，农村的老年人可以在引导下相互照顾，开展、参与各类常规体检、组织活动、节日慰问、治安联防、紧急救助甚至生离死别的照料活动。

此外，在盘活农村集体资产、建设美丽乡村与“三清三拆”等政策的基础上，还可以充分利用村庄的集体资产以及有利的社区环境，例如村庄的旧学校、旧厂房等集体资产进行养老院的改建，并依托村集体经济收入对养老院开支进行补贴，包括聘请专业化的看护人员和医护人员，对老人健康做到及时监测精准对接。同时，与养老相关的社会服务下乡，也能依托这些养老平台开展服务，容易形成规模经济与平台效应。只有从“硬”的资金保障和“软”的服务到位两方面同时着手，才能从根本上全面解决农村老龄人口的养老问题。

总之，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过程中，只有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让不同年龄农村人口最重要、最迫切的需求和问题都能得到妥善解决，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才能更有成效，更见实效。

注：本文首发在《学习时报》，《学习时报》于1999年9月创刊，中共中央党校主办，面向全国，服务全党，以各级党政干部和广大知识分子为主要对象，是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全党唯一专门讲学习的报纸。

## 李书娟 钱文文：消费扶贫与乡村振兴



作者：李书娟（暨南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研究员，副教授） 钱文文（暨南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研究助理）

### 写在前面

2020年，我国完成了全面消除绝对贫困的伟大任务，在人类扶贫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绝对贫困的消除，是党和人民长期奋斗的结果，在此过程中也积累了许多具有中国特色的实践经验。其中消费扶贫作为精准扶贫的具体和重要体现，与精准扶贫的目标之间存在着互相映衬和内嵌的关系，受到了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并不断付诸应用。

### 消费扶贫模式

消费扶贫的内涵是，社会各界通过消费来自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产品与服务帮助贫困人口增收脱贫。国外与此类似的做法是发放消费券，主要是面向贫困人口，是直接提升居民购买力的“输血”式的补助。我国实施的消费扶贫通过扶贫主体购买产品，不仅最终能转化为现金提升贫困户收入，还能带动地区产业发展，具有一定的“造血”作用。另外，我国进行消费扶贫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富裕，侧重公平性；而国外的消费券制度，除了进行社会救济，也会被作为经济不景气时刺激消费的手段。

相比于由政府直接发放的消费券，我国消费扶贫的执行主体更多元，依此可分为如下三种模式：（1）以政府部门、国有企业、事业单位为主体的政府主导式消费扶贫。（2）以民营企业、外资企业为主体的企业主导式消费扶贫。（3）以社会组织为主体的社会组织主导式消费扶贫。

根据运作模式，我国的消费扶贫又可分为直接采购和拓宽销路两种模式。直接采购指扶贫主体直接采购贫困地区产品。在政府主导式消费扶贫下，直接采购主要包括单位直接采购与职工消费补贴两种形式。单位直接采购指政府部门、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大批量购入扶贫农产品，作为单位食堂餐厅的食材或用于发放职工福利。职工消费补贴则主要指通过设立消费扶贫产品自动售货机、开发扶贫产品消费平台、价格补贴、赠送代金券或购物卡等方式降低职工购买扶贫产品的成本，从而鼓励职工优先消费扶贫产品。在企业主导式消费扶贫下，直接采购主要包括需求内订单与需求外订单两种形式。需求内订单是指企业为满足实际的生产经营需求而形成的扶贫产品订单，需求外订单是指企业单纯为承担社会责任而形成的与其实际经营需求无关的订单。在社会组织主导式消费扶贫下，直接采购又可细分为内部消化模式与外部消化模式。内部消化模式是指在社会组织系统内部消费所购买的扶贫产品或服务。外部消化模式是指由社会组织会员企业的购买并消化扶贫产品或服务。

拓宽销路指扶贫主体通过提升扶贫产品竞争力、完善扶贫产品产销流程中的各类基础设施、加强扶贫产品宣传以提高知名度等方式拓宽扶贫产品的销路。在政府主导式消费扶贫下，拓宽销路主要存在三种形式：（1）通过加大科技投入、引进推广新品种等方式提升扶贫产品质量。（2）通过完善扶贫产品产销流程中涉及到的各类基础设施降低交易成本，例如建立质检中心、建设物流体系与仓储冷链设施。（3）通过申请国家驰名商标等方式建设扶贫产品品牌，提高产品知名度与品牌价值。在企业主导式消费扶贫下，拓宽销路主要存在两种形式：（1）平台建设，指建立专门的消费扶贫综合服务平台，为扶

贫产品的产销各环节提供便利,从而拓宽销路。(2) 直接参与,指通过参与扶贫产品的研发、生产、流通、销售流程,提升消费扶贫产品的竞争力,从而实现销路的拓展。在社会组织主导式消费扶贫下,拓宽销路主要存在三种方式:(1) 帮助提升扶贫产品或服务的质量。(2) 加强宣传工作,提升扶贫产品或扶贫的知晓度。(3) 通过搭建销售平台促进消费扶贫产品或服务的销售。

### 脱贫攻坚时期的消费扶贫

2019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入开展消费扶贫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指导意见》,指出消费扶贫作为一种全新的帮扶举措被正式纳入国家脱贫攻坚政策体系。2020年3月国家发改委又发布了《消费扶贫助力决战决胜脱贫攻坚2020年行动方案》,进一步为各地各级开展消费扶贫指明了方向。在系列政策措施的推动下,消费扶贫在全国范围内快速落实推进,贡献了巨大的扶贫力量。

表1 消费扶贫国家文件

时间	文件名	内容
2019-01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入开展消费扶贫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指导意见	动员社会各界扩大贫困地区产品和服务消费,拓宽贫困地区农产品流通销售渠道,全面提升贫困地区农产品供给水平和质量,促进贫困地区农村农业和乡村脱贫致富奔小康
2019-11	动员全社会力量共同参与消费扶贫的意见	明确各级党政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群团组织、金融机构、大专院校、医疗卫生机构和消费扶贫纳入定点扶贫和结对帮扶工作内容;本部等发达省市要进一步发挥好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等政策机制作用
2020-02	关于开展消费扶贫行动的通知	提出了开展消费扶贫行动的工作目标、基本原则、主要方式、工作要求,并对规范产品认定、严格加强监管等方面做出了明确规定,提出了具体举措
2020-03	消费扶贫助力决战决胜脱贫攻坚2020年行动方案	进一步扩大对贫困地区产品和服务的消费规模,进一步打通贫困地区产品流通和销售“瓶颈”,进一步提升贫困地区产品和服务供给的规模,进一步加强对消费扶贫工作的统筹协调和宣传考核
2020-04	国务院扶贫办关于鼓励实施消费扶贫行动有关事项的通知	明确消费扶贫工作目标,对扶贫产品认定流程进行详细规定,对国家层面与地方层面的支持政策提出要求,明确消费扶贫工作的信息发布平台与服务监测平台

消费扶贫自2019年开始至今,已取得了巨大成效。扶贫办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11月底,中西部22个省份共认定164543个扶贫产品,涉及1857个县和46426个供应商,已销售3069.4亿元。[1]2019年-2020年10月,各方面累计直接采购或帮助销售贫困地区特色农产品近5000亿元。其中,2019年为600多亿元,2020年前10个月超过3300亿元,是2019年全年规模的两倍。

广东省作为我国的经济大省,在脱贫攻坚方面立足全局,为我国整体和区域的扶贫事业中起到了重要的引导和示范作用。近三年来,广东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消费扶贫的重要指示精神,运用消费扶贫的方式进行精准化的扶贫,在区域脱贫攻坚战役中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为贫困地区推动产业扶贫、贫困户增收脱贫提供了创新道路,发挥出了巨大效用。截至2020年11月,广东采购、销售中西部地区扶贫、带贫产品591亿元;实施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工程,在全国19个省份认定生产基地962个、加工企业93家;推动发行“消费扶贫爱心卡”63万余张,完成直播带货培训1万余人次。广东东西部扶贫协作产品交易市场于2019年9月正式开业,截至2020年12月,共吸引17个省份企业入驻,建设省级、市级和企业消费扶贫专馆57个,展销3200多家企业过万款产品。

在推动消费扶贫方面广东更是创下多项全国率先。率先建立东西部扶贫协作产品交易市场、率先成立省级消费扶贫工作专班、率先开展“消费扶贫月”活动、率先将消费扶贫纳入省级扶贫日的活动内容。广东省开展消费扶贫取得的成绩不仅体现在时效方面,也深入到最终的成果。例如广东实施的“粤字号”农业品牌创建行动,大大提升了扶贫产品知名度和美誉度,增强了扶贫产品市场竞争力。目前,广东已有“清远农家”“善美韶农”“万绿河源”等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有力地带动了扶贫产品品质提升。在消费扶贫的带动下,广东省的扶贫效果显著,不仅消除了绝对贫困,也为农民农户提供了长效的提升收入和防止返贫的措施,巩固了广东乃至全国的脱贫成就。

表2 广东省消费扶贫文件

时间	文件名	内容
2020-05	关于开展消费扶贫行动的通知	鼓励各级工会组织扶贫交易市场开展活动,职工集体福利额度50%用于购买扶贫产品,专项基金按消费扶贫消费慈善工会会员
2020-06	广东省财政厅广东省扶贫办广东省供销合作社关于通过“广东政府购买扶贫”支持消费扶贫的通知	建立“广东政府购买扶贫”,展示和助销省内贫困地区和东西部协作地区通过“广东政府购买扶贫”支持消费扶贫的通知
2020-11	广东省财政厅广东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鼓励动员省属企业开展消费扶贫行动的通知	鼓励动员省属企业食堂、工会组织充分运用政府采购政策通过贫困地区农副产品网络销售平台采购食品以及工会福利、慰问品等贫困地区农副产品

### 消费扶贫将助推乡村振兴

在消除绝对贫困以后,我国农村的治理方向转变为城乡融合发展和乡村振兴,乡村优先发展成为必然。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消费扶贫作为中国精准扶贫战略的重要构成部分,也必将在下一阶段实现乡村振兴、推进城乡融合等方面发挥出重要的作用。

乡村振兴是我国“十四五”和2035年远景规划的重要战略目标,是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措施。乡村振兴离不开农业的繁荣和农民的富裕,而农业生产构成了农民收入的最重要的部分。而消费帮扶从农产品的销售源头出发,一头牵着帮扶地区当地特色产品,一头连接消费中心城市的高需求市场,构成了完整的帮扶农民创收增收的机制。消费扶贫有“造血”的功能,同时也具有长期的功效。它不同于政府的直接补助,能够结合不同区域不同乡村的实际情况,将农业特色产品的销售渠道打开,为农民提供更高效直连的市场,从而带动农民以及整片区域的生产与发展,实现农村与城市的更为密切的沟通,推动城乡在农产品生产和消费上的融合。乡村振兴战略比消除绝对贫困更加具有丰富的内涵,涉及到了农民生活农村发展的各个维度。因而在新时期,消费帮扶的任务与作用也更加多元化,不仅需要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更是要建立长效机制,推动农民从生产源头出发,积极参与农业生产和农业销售,为实现全面的乡村振兴积蓄力量。

2021年4月,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乡村振兴局等十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动脱贫地区特色产业可持续发展的指导意见》,其中提出要大力实施消费帮扶,继续开展脱贫地区帮扶产品认定,做大做实农产品销售专区专柜专馆和定向直供直销渠道,优化实施政府采购脱贫地区农副产品政策,为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提供有力支撑。

同年6月,广东省总工会与广东省乡村振兴局联合印发《关于深化拓展消费帮扶工作的通知》,鼓励广大干部职工在各类官方渠道购买消费帮扶农副产品,深化拓展消费帮扶工作,助推广东省及东西部协作地区农户实现持续增收。今年以来,广东省东西部扶贫协作产品交易市场和中国农业银行广东省分行,组织交易市场内的珠海、江门、潮州、广东省供销社、贵州、林芝等24个省内外消费扶贫专馆,在广东省农业农村厅开展了“购东西好货促消费帮扶”助农产品进机关展销活动,现场展示展销了超300种优质农产品。

### “乡村振兴”时期消费扶贫实施的问题与建议

在我国脱贫攻坚以及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过程中,消费帮扶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是新时期新动态,不论是过渡时期的磨合,还是以前存留的问题,现阶段消费扶贫依旧凸显出了一些不足,对于这些不足产生的原因进行分析总结,能够帮助消费帮扶在新阶段新时期发挥出更直接高效的作用。当前我国的消费帮扶主要存在如下方面的问题。

(1) 脱贫地区产业对消费扶贫的政策依赖。当农民生产和提供好农业产品后,对口帮扶单位包销解决了至关重要的销售问题,同时在政策的支持下,对口帮扶单位的收购价格往往要高于市场价格,由此农民在享受了便利的同时,也获得了更高的收益。但同时这也会使农民滋生过渡依赖政策的心理,当农产品有了畅通的销售渠道兜底,农户既不担心“质量低被退货”,又不担心“价格高无人买”,以至于某些市场竞争力不强的农产品也可以通过消费扶贫政策找到销路被推销出去。在此情况下,农民认识不到产品的问题,而为了追求更高的收益,只会一味的提高农产品的产量而忽视质量。究其原因,还是在长期的政策帮扶下,农民以及脱贫地区对于政策产生了过度依赖,而导致自身懈怠,内生发展能力不足。

(2) 品牌特色劣势凸显。在脱贫攻坚的消费扶贫高峰时期,各地因时因地制定了相关的消费帮扶政策,对于帮扶地区,帮扶单位可以各管一摊,产品即使是没有特色的大路货,也总有一块“自留地”来兜底,如产业扶贫大多以农副业为主,产品存在同质化现象。但新阶段随着帮扶的覆盖范围愈加广泛,农民的生产意愿不断增强,帮扶产品也在不断增多,同时帮扶政策的改变,销售“自留地”的逐步取消,使得扶贫产品终将面临激烈的内部竞争,如果没有品牌优势,在政府转向市场的过程中也终将被淘汰。

(3) 产业配套体系不够完善。消费帮扶政策体系为农村出售农产品搭建了快捷方便的平台,农民在生产完农副产品后,可直接进入到售卖阶段,政策上的补助和帮扶单位的积极工作为农民降低了成本费用,起到了开源节流的作用。但是消费扶贫在早期往往难以构建起完整的产业配套体系,比如包销让贫困村一个电话就能解决产品积压难题,而无需考虑建设冷库、搭建物流、精细加工等,但这样只能是短期的便利,长期的可变成本是巨大的。因而在乡村振兴的新阶段,消费帮扶面对着更多更重待实现的新目标,这些前期被忽略的配套体系问题就尤为凸显,亟需解决。

问题或多或少出现在实施消费帮扶的各个地区,就广东省而言,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这些问题依旧存在。因而为了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也为了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和全面乡村振兴,广东省政府需要认识到现存的问题,并通过制定及时有效的措施一步步解决这些问题,我们也提出一些可行的建议,助推消费扶贫从“短期帮扶”转向“长期助跑”。

(1) 扶贫的产品和销售要更强调市场化。对于产品来说,政府的消费帮扶政策为农产品的出售搭建了一个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市场竞争的平台,但是政策依赖的心理使得产品的质量下降,进而影响整个类型产品市场的公平竞争与发展。因此政府要发挥好引导和政策支持职能,让扶贫产品尽量避免“大路货”,不断在产品质量、品牌名声、自身发展能力上取得进步,以保证该产品在市场竞争中站稳脚步,同时也在竞争中不断提升品牌力量。在这一过程中,政府政策支持的导向要逐渐过渡到市场化,扶贫产品要更多适应市场需要、契合大众需求。另外对于销售渠道,也需要创新和规模化发展。例如广东建立了东西部扶贫协作产品交易市场,重庆开设了西部消费扶贫中心,还有许多地区通过电商直播等方式建立起消费扶贫的网上商城,为消费帮扶的农产品提供了更多元化和便捷化的销售渠道。这些推销方式的创新冲击了传统的销售途径,更具有高效和灵敏性,助力了农产品的销售和农民的增收,为消费扶贫提供更优更好的“上行通道”。

(2) 建立可持续的消费帮扶新模式。首先需要完善产业配套体系,产品分装,储藏保险,快递物流等等各环节的工作都需要进一步完善,注意培养供应链服务商,改进从田间地头到居民餐桌的全供应链体系,同时对于兴起的电商销售,政府可以加大脱贫地区网络和物流的降费提速力度。另外,部分企业和平台发起的消费帮扶活动是一次性的,政策风声过了就没了,产品推销出现停滞。因此政府相关部门就需要加强组织领导,细化实化相关政策举措,营造全社会参与消费扶贫的良好氛围。同时要完善利益机制,提高贫困人口在农产品销售和休闲农业、乡村旅游中的参与度,并加大政策激励,对参与消费扶贫有突出贡献的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采取适当方式给予奖励激励。

##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 ——“三支一扶”政策演变历程



作者:李书娟(暨南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研究员,副教授)

顾然(暨南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研究助理)

#### 写在前面

2021年6月,为了进一步鼓励引导毕业生面向乡村基层就业,推动高学历人才在乡村大施所能、大展才华、大显身手,中共中央组织部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十部门共同印发了关于实施第四轮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的通知,实施第四轮(2021-2025年)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支教、支农、支医和帮扶乡村振兴)计划。目标计划每年选派3.2万名左右,累计选派16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干事创业,加快培养一支扎根基层、奉献基层的青年人才队伍,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持。

2021年第四轮“三支一扶”政策有了新的内涵,主要服务于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2021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

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要求把乡村建设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位置,全面推进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乡村振兴是包括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等方面的全面振兴,其中,人才振兴是关键。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专门印发了《关于加快推进乡村人才振兴的意见》,特别强调要坚持把乡村人力资本开发放在首要位置,大力培养本土人才,引导城市人才下乡,推动专业人才服务乡村,吸引各类人才在乡村振兴中建功立业,健全乡村人才工作体制机制,强化人才振兴保障措施,培养造就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有力人才支撑。

“三支一扶”政策的产生及发展历程如何?其内涵是什么?广东“三支一扶”政策的实施情况如何?本文对此进行了梳理。

#### “三支一扶”政策演变及内涵

##### (一) 来源于基层就业政策

从高校毕业生角度看,“三支一扶”是一种基层就业政策。分配或鼓励具有一定知识技能的青年人到经济落后、地势偏远的地区就业的政策由来已久。从20世纪40年代的“知识分子必须走与工农相结合的成长道路”,到1965年中共中央《关于分配一批高等学校毕业生到基层工作的指示》;从1976年工农兵大学生分配报告提出“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到党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到1983年中组部决定每年选调一批应届优秀大学毕业生到基层进行重点培养锻炼;从20世纪90年代初原国家教委提出“毕业生在选择工作志愿时……要到基层去,走与实践相结合、与工农相结合的成长之路”,到1995年《关于抓紧培养选拔优秀青年干部的通知》要求每年从应届高校毕业生中挑选品学兼优的“分配到农村乡镇或企业工作”。

## （二）演变历程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三支一扶”政策的出台实施除了锻炼青年人才，更多地是基于国家发展战略的需要，目的在于通过鼓励高校毕业生基层就业扶持落后贫困地区。

2005年6月29日，为积极推进人才强国战略以及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国家印发了《关于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面向基层就业的意见》，要求各地各部门积极引导、鼓励高校的毕业生面向广大的县区、乡镇、农村等急需人才的偏远地区就业，建立高校毕业生进入基层进行就业的长效机制。至此，服务基层项目成为国家的一项重要重要战略方针，“村官”、西部志愿计划等进入大范围试行阶段。

2006年2月，为进一步引导、鼓励高校的毕业生进入基层就业，中央组织部、人事部等八部门联合颁布《关于组织开展高校毕业生到农村基层从事支教、支农、支医和扶贫工作的通知》，“三支一扶”计划应运而生。

2006年4月，人事部办公厅印发了《2006年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实施方案》，提出到农村去，到基层去，到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

截至到2020年底，已有43.1万名高校毕业生到被选派到基层服务，为助力脱贫攻坚、推动经济社会事业发展、优化基层人才队伍结构发挥了积极作用。

## （三）政策内涵

“三支一扶”计划，是选拔未就业高校毕业生进入基层从事支教、支农、支医和扶贫工作的一项国家重要的服务基层项目。其中，“三支”是指支教、支农和支医，“一扶”是指扶贫。服务期为两年，服务期间会按照相应的标准给予服务人员一定的生活补贴。

“支教”，是指支援基层中小学的教育和教学管理，即选拔高校毕业生进入基层学校从事具体的教育工作。

“支农”，是指支援农建设与农业发展，即选拔高校毕业生进入基层农、林、牧等相关部门，从事农业相关事务。

“支医”，是指支援基层医疗卫生发展，即选拔高校毕业生进入基层医疗系统，如县区医院、乡镇卫生院，从事诊断、护理等具体医疗卫生工作。

“扶贫”，即选拔高校毕业生进入基层组织，指导农业生产、经济建设等脱贫工作。

## 广东省“三支一扶”政策实施情况

### （一）广东“三支一扶”政策实施

从2006年中央印发“三支一扶”相关文件之后，各省市自治区纷纷出台关于实施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的通知，积极推动各地高校毕业生面向基层就业。广东省积极响应中央政策，为贯彻中央对“三支一扶”的政策要求，并加强对这项工作的统一领导，广东省成立了由组织、人社、教育、财政等组成的“三支一扶”工作领导小组，并形成了省市县三级组织架构负责日常管理，形成了四级联动、九部门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同时，为了更好地结合广东省的实际情况，在公布了广东省三支一扶的计划之后，广东省又出台了多项相关政策，从三支一扶大学生的管理到提供给他们补贴待遇以及服务期满后的优惠政策落实等，做出了具体的制度规定。

从2006年第一年招募大学生参与三支一扶进入基层工作开始，十五年来，广东省共有超过2万名大学生到粤东、粤西和粤北经济欠发达地区开展服务，足迹遍及16个地级以上市、83个县（市、区）的2188个镇街基层单位。随着省委省政府对三支一扶计划支持力度的加强，每年的计划招募人数从2006年的300人逐年增长到2021年的3000人，人数增长了十倍。同时，年龄限制也逐步从专科、本科毕业生年龄不超过25周岁，硕士研究生不超过27周岁放宽到了年龄不超过30周岁，每个月的补贴也从800元提高到了3600元。

为了进一步完善大学生参加“三支一扶”期间及服务期满后的优惠政策，广东省委省政府印发了《关于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到农村基层从事支教、支农、支医和扶贫工作的实施意见》以及《关于进一步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工作的实施意见》，这些政策规定，服务期满且考核合格的毕业生，可享受5个方面的政策优惠：

一是公务员定向考录。全省每年拿出公务员考录计划的10%-15%，面向“三支一扶”等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定向考录。二是事业单位公开招聘。自服务期满之日起3年内参加广东事业单位公开招聘的，笔试成绩可以适当加分。其中县、乡单位招聘加10分，地级以上市、省直及中央驻粤单位加5分。三是直接聘用。原服务单位属事业单位且有空编的，经批准可直接办理聘用手续。四是升学加分。自服务期满之日起3年内参加省内高校专升本、研究生考试的，初试总分加10分。五是保留应届生身份。参加前无工作经历的人员服务期满且考核合格后2年内，在参加机关事业单位考录（招聘）、各类企业吸纳就业、自主创业、落户、升学等方面可同等享受应届高校毕业生的相关政策，同时“三支一扶”的服务期限计算为工龄。

此外，关于“三支一扶”人员的补贴标准，广东省专门印发了《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广东省财政厅关于扩大“三支一扶”计划招募规模及提高“三支一扶”人员补贴标准的通知》，该通知明确，要提高“三支一扶”人员工作生活补贴标准和“三支一扶”人员社保补贴标准，生活补贴标准提高到每人每月不低于3600元并统一按此生活补贴标准确定社会保险缴费基数。同时，提供每人每年1000元交通补贴、在岗服务满六个月的2000元一次性安家补助以及服务期间每人3000元能力提升专项计划补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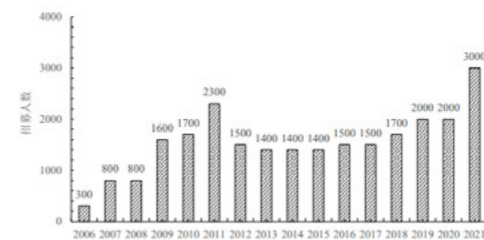


图1 广东省历年计划招募三支一扶人数（单位：人）  
数据来源：根据广东省历年三支一扶实施工作方案整理  
[http://hrss.gd.gov.cn/zdlyxx/zpwx/szyf/content/post\\_3300529.html](http://hrss.gd.gov.cn/zdlyxx/zpwx/szyf/content/post_3300529.html)

图1 广东省历年计划招募三支一扶人数（单位：人）  
数据来源：根据广东省历年三支一扶实施工作方案整理  
[http://hrss.gd.gov.cn/zdlyxx/zpwx/szyf/content/post\\_3300529.html](http://hrss.gd.gov.cn/zdlyxx/zpwx/szyf/content/post_3300529.html)

2021年5月8日，广东省发布了《广东省2021年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实施工作方案》，计划招募3000名高校毕业生到广东省基层一线从事“三支一扶”工作。相较于往年的三支一扶，今年有以下新的变化。首先，中山首次拿出50个基层岗位招募“三支一扶”高校毕业生，在以往粤东西北的基础上，纳入珠三角经济相对薄弱的地区，避免“灯下黑”的情况产生。其次，截至5月13日9时，共有56842名大学生报名参加今年的三支一扶，其中，已报名人员中博士2人，硕士433，本科35739人，本科以上学历占63.6%，报考人员数量及素质明显提高。此外，今年专门设置岗位定向招募香港、澳门、西藏籍普通高校毕业生，能够有效地促进民族融合和大湾区共建。

在本次招募中，岗位分配为：支农岗位1124个，乡村振兴岗位725个，支教岗位579个，支医岗位411个，水利岗位191个。其中由于新冠疫情防控基层压力较大的缘故，支医岗位大幅增长，相较2020年增长了超过50%。

## （二）政策成效

### 1、促进就业创“增量”

三支一扶提供了大量高校毕业生就业岗位，拓宽了高校毕业生的就业渠道，缓解了就业压力。随着三支一扶政策的不断深入以及三支一扶待遇的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高校毕业生选择进入基层工作。近五年来，广东“三支一扶”招募人岗匹配率达100%，缓解了这些大学生由于结构性失业带来的就业压力。对于服务期满的三支一扶人员，广东省也有详细的政策，促进他们有效就业。在面对疫情和复杂外部环境的严峻挑战时期，三支一扶为促进多渠道就业，守住经济底盘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 2、提升农村人才质量

通过“三支一扶”计划选拔的优秀高校毕业生，学历层次高，专业知识丰富，年龄普遍较小。通过三支一扶下沉到乡村工作的青年人，广泛分布在乡镇机关、村级组

织和教育、农技、医疗、畜牧等各类基层服务岗位上,能够优化基层部门的年龄和学历结构,提高基层组织队伍的整体素质,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村人才匮乏的问题。在疫情期间,参与基层工作的三支一扶人员特别是支医岗位人员为基层疫情防控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降低了广东基层弱势地区疫情蔓延的风险。此外,广东创新“三支一扶”计划招募选拔方式,优化量化测评系统,将“本地生源”作为分值较高的评分项,拓宽本土人才回流渠道。通过吸引在外就业的本地青壮年劳动力归巢创业,可以补齐村庄发展的人才短板,也能给基层组织带来新理念,新方法和新技术。只有广大青年身体力行地服务乡村振兴等国家战略,才能让乡村振兴的一池春水真正活起来。

### 3、成为高校毕业生成长平台

到基层接受各种挑战和磨练,有利于大学生熟悉当代社会、了解中国基本国情,增强扎根基层、服务人民、报效祖国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农村基层是一个广阔的舞台,是高校毕业生接触社会、熟悉社会、认识自我的有效途径。同时,参与到乡村振兴的工作中,能够为贫困基层更新换貌做出自己的贡献,也可以让高校毕业生参与到国家建设中,提高自身的获得感。通过在基层的艰苦奋斗,能够充分磨砺青年,丰富他们的阅历,有利于将所学的专业知识与实践相结合,将书本知识转化为实践能力,更有效地投入到建设基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中。

#### (三) 可能存在的问题

截止到报名时间结束,2021年广东省的三支一扶共有67108名大学生报名,开创了历年报名人数的新高,在广大高校毕业生积极踊跃报名参加基层工作的同时,也存在许多需要注意和解决的问题。

#### 1、报名岗位不平衡

今年的三支一扶计划,总的来说报录比约为22:1,但存在许多岗位有着大量人员报名,一些岗位却无人问津的不平衡现象。不平衡的现象主要存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地域的集中,一个是岗位的集中。其中,报名人数超过100人的岗位有65个。这些岗位,从地域上来看集中在设区市的市郊区,这些地区离城市相对较近,地

区发展水平相对较高。其中,广州的岗位的报录比最高,达到接近50:1,报录比同样很高的地区还有中山,梅州和揭阳,都超过30:1。云浮,江门等地的报录比则只有15:1。从岗位性质来看,多为支农和乡村振兴岗位。在全部三千个岗位中,仍有193个岗位没有人报名,这些岗位集中在云浮、河源、阳江等经济相对薄弱的地区,且岗位性质绝大多数都为支医,共有152个支医岗位没有人报名,占全部支医岗位的37%,2020年的报名情况也有类似的现象,2020年全省241个支医岗位中,有140个无人报名,占全部支医岗位的58%。由此可见,报名人数与岗位匹配之间依旧存在结构性矛盾,其中以支医岗位最为严重。

### 2、岗位待遇待提高

对于支教和支医岗位而言,相较于支农与扶持乡村振兴,这两个岗位需要教师资格证和医药类高校学位,因此存在招募限制相对较高的情况。与此同时,在较为发达地区的医生和教师行业薪酬则在不断提高,深圳高中教师的年收入早已超过30万元。生源较为优质的高校师范类和医药类毕业生更多地会选择薪酬较高的发达地区参与工作。但与此同时,三支一扶中支教和支医岗位的待遇并不高,普遍每年生活补贴仅为4到5万元。相对而言,尽管各级政府已推出较多相关政策提高三支一扶人员的生活补贴,但与较发达城市的相同岗位相比,支教和支医岗位的待遇并不够吸引高校毕业生,这也是以往招募过程中,支医和支教岗位报名人数相对较少的主要原因之一。

### 3、服务期短难深入

广东省三支一扶的服务期普遍为两年,对于许多进入到三支一扶岗位的毕业生而言,两年的时间并不算长。很多三支一扶人员刚刚熟悉工作,就已经接近服务期满时间,这使得他们的职业保障感可能得不到满足,也不能深入当地的基层工作,难以长期扎根基层,形成对基层服务质量的有效提升。同时,不少三支一扶人员出于暂时就业的想法参与到三支一扶中,将两年服务期当作过渡,在服务期内便开始求职,一有合适机会便脱离岗位,扎根基层的积极性也会降低。

### 4、服务期满去何处

尽管广东省推出了大量优惠政策给予三支一扶人员服务期满后就业保障,但依旧存在很多服务期满即失业的情况。目前只有山东省、吉林省、安徽省、河南省、甘肃省、江西省六个省份出台了服务基层项目人员服务期满、考核出色将直接转事业编的政策,广东省暂时未出台该政策。尽管有一定比例定向招考的岗位,可以提供给三支一扶人员避免与应届毕业生竞争,但随着三支一扶人数的增加以及定向招考岗位数量相对较少,考试的竞争压力也日益增大,这也使得许多三支一扶人员在进入岗位后就开始备考,难以投入足够的精力在基层工作中。难以留在基层岗位,一方面存在高校毕业生个人的意愿问题,另一方面政策的保障和招考难度都使得继续留在基层存在不少的阻碍,这会使得基层工作人员的素质无法得到根本上的提升,同时也浪费了三三支一扶人员服务期内积累的基层工作经验。

## 新时代“三支一扶”政策的深远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曾勉励年轻人,要热爱基层、扎根基层,增长见识、增长才干,促进农村发展,让农民受益,让青

春无悔。“三支一扶”计划实施以来,一批又一批高校毕业生满怀激情投入到基层建设中。他们奔赴农村、报效祖国,在基层社会实践中丰富了阅历、磨练了意志、增长了才干。他们深入基层,长期与参与群众工作,在服务群众中受到了教育,加深了对基层群众的感情,为解决群众的难题、完善基层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在三支一扶实施以来的这些年里,涌现出许多先进典型和感人事迹。这些饱含热情的高校毕业生们有的投身农村教育,潜心探索改进教学方法,为山区的孩子打开探索世界的大门;有的投身农业科技,刻苦攻关,推动了农业现代化的进程;有的投身医疗卫生服务,专心钻研,给乡村医疗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有的投身扶贫事业,坚持科学扶贫和智力扶贫,促进了经济发展,提高了农民收入。他们的身上集中体现了当代大学生的责任感和奉献精神,以及服务群众不断创新的优秀品质和精神风貌,充分展现了勇于担当的责任意识、全心全意的服务态度、锐意进取的创新激情。

继承和弘扬“三支一扶”精神,立足本职、提高本领、勇于创新、甘于奉献,为促进乡村振兴、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做出贡献。

## 《暨南乡村谈》第一期：易地扶贫搬迁



编者按:

暨南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视频号“暨南-乡村振兴”将推出系列智库访谈节目《暨南乡村谈》,节目聚焦乡村

振兴话题,进行深入浅出地解读和阐述,致力于让更多人了解乡村振兴,讲好中国乡村振兴故事。

本期,我们邀请到蔡澍、李承政和张阳阳三位嘉宾,为我们聊聊易地扶贫搬迁。视频号第一期节目,我们聚焦易地扶贫搬迁话题。近来热播的脱贫攻坚题材电视剧《山海情》,全方位还原了中国二十世纪90年代的扶贫工作。

该剧讲述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宁夏西海固人民在党和国家扶贫政策的引导下,在福建的对口帮扶下,不断探索脱贫致富路径,通过奋斗获得美好生活的故事。

通过一个个实在而又感人的故事,易地整体搬迁的艰难曲折性被真实再现出来。

易地扶贫搬迁的背景是什么?其政策含义是什么?我们采访到暨南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院长助理、专职研究员李承政,兼职研究员、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副教授蔡澍,兼职研究员、经济学院助理教授张阳阳,让我们跟随他们的声音,一起来探索该政策背后的经济、社会、文化肌理。

## 01 易地扶贫搬迁的背景

在电视剧《山海情》中,马德福有一句台词是“人有两头根,一头在先人,一头在后,后人到哪里,哪儿就能再扎根”,请您谈谈易地扶贫搬迁的背景?

蔡澍:为什么会采用这样一个扶贫的战略,有的地方的自然环境特别恶劣,比如荒漠化,不太适合人类居住,不太适合农业发展的这些地方,还有居住比较分散,就需要采取这样一个政策。比如我之前去过广西,地理条件比较恶劣,我们知道广西地质结构的特点,那为什么会有桂林山水甲天下?它有溶洞的特征,土大概都是碳酸钙,不太适合农业生产,所以对于这种自然环境相对比较恶劣的、不太适合农业发展的地方,就需要把他们集中搬迁出来,到一个比较适合居住、适合发展农业生产的地方,所以才会出现这样一种易地扶贫搬迁。

李承政:为什么需要易地扶贫搬迁?其实就是中国地域辽阔,有一些地方它的自然条件相对来说是比较恶劣的、比较偏远的,所以就会出现“一方水土养不活一方人,一方水土养不好一方人”的情形,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把人搬出去,而不是就地扶贫。

## 02 易地搬迁案例分析

广东省内有没有这种迁移的案例?可不可以举个例子或者是讲一个故事吗?

李承政:我就举两个我最近看到的例子,一个是来自于福建的宁德,这是总书记曾经工作过的地方,这个地方是有一群这样的居民,他们在古代的时候称之为

族(疍家人),也就是船家居民,他们基本上一辈子都是飘摇在海上的。

因为他们在陆地上没有土地,也没有房产,所以他们就居住在船上,这样一些居民的生活条件是非常差的,因为船的高度以及面积都非常非常的小,而且条件非常的恶劣。他们的小孩的教育也会受影响,因为经常会受到台风等各种恶劣天气的影响,从而影响他们小孩的上学。

那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的时候就推动了这样一个船民上岸、易地扶贫攻坚的工程,就是在岸上通过政府财政支持的方式给他们建了许多的房子,船民就有机会住在岸上。通过这样一种方式,他们能够在城市里面找工作,然后他们的小孩能够直接在镇上上学。

我可以列一个数据,1997年这个时间段,连家船民一个下岐村,他们整个村没有一个大学生,现在已经产生了两百多个大学生。那个时候他们人均收入大概是一千多块钱,现在已经涨到了两万五,就是通过易地搬迁的方式,实现了村的经济的发展以及儿童更好的发展。

还有另外一个例子是跟我们广东更相关的,那就是广东的乳源瑶族自治县,它是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县,乳源也称之为过山瑶的故乡,为什么称之为过山瑶?因为他们长期居住在深山之中,他们没有完全属于自己的田地,那么他们可能会被当地的居民从这一个山头赶到另一个山头,而实际上他们也是过着半游牧式的一种生活。那么易地扶贫搬迁的工程,就是让他们从大山里面搬出来,因为把路、电、网供到深山老林去,成本是非常高的,而且村民其实也不大容易接触到外面的就业机会、就学机会,所以,当时主管领导其实是去做了大量的工作,劝说我们的瑶族同胞把家搬下来,建好了这样一个瑶民新村。现在去乳源,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叫做雕子塘的村,这是一个好几个村的瑶族居民的聚集区,他们现在通过种植茶叶,打造茶叶品牌来创收,也可以通过打工的方式,就是就地非农就业以及来珠三角打工的方式来创收。所以现在看来瑶族的这样一个新村,他们的经济水平比以往是提高了很多的,而且他们所在的新村的地理位置是很靠近乳源著名的景点云门寺的,所以

他们还可以借助这样一个旅游资源来创收。所以这两个例子就证明了易地扶贫搬迁是有效的,是完成脱贫攻坚任务的一种方式。

## 03 易地扶贫的成效

请您谈谈易地扶贫搬迁这一政策带来的影响

蔡澍:易地扶贫搬迁的成效还是相当卓越的,我想主要从三个方面来看,一个是从居住环境来看,它大大改善了家户的居住环境,从原先的居住比较分散、交通不便利到集中居住,居住环境得到大幅的改善。第二个从就业机会来说,也大大促进了贫困家庭的就业,原先因为居住比较偏远,而且居住比较分散,离市场比较远,交通不是很便利。那通过搬迁之后,他们相对来说居住在离县城比较近的一些集中居住的地方,交通也相对得到大的改善。同时很多易地扶贫搬迁点,也就近设置了一些工厂,比如我之前去调研的一个易地扶贫搬迁点,它旁边就是一个电子厂,是深圳的一个公司在那里设置的一个电子厂,这个搬迁点的居民,特别是留守的老人或者留守的妇女,平时要是没有事就可以到厂里面去打工挣钱。以前因为居住比较分散,这样的条件是很难有的。第三个我想从下一代来说,从教育来说也是得到大大的改善。因为我们知道山村孩子读书的一个重要困难就是离家比较远,所以他们来回路上肯定要花很多时间,就大大影响他们上课的效率。集中搬迁到一起之后,附近就有学校,小学、幼儿园等等都很便利。我想不管是从师资,还是从孩子的经历来说,都有助于他们提高教学的质量。我想从这三个方面来说,易地扶贫搬迁的成效是非常卓越的。那现在我们下一步发展就是乡村振兴,所以易地扶贫搬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也为乡村振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不管是从就业能力、居住环境,都打下了非常好的基础。

张阳阳:关于易地扶贫搬迁的成效,我们可以先看看易地搬迁这个政策。易地搬迁政策是我们精准扶贫以来实施的一项最重要的政策,它是把我们的居民,尤其是贫困户,从生态环境、自然条件恶劣的地方,一些不适宜生存的地方,搬到适合生活和生产的一些地方来。主要是按照自愿的原则,在政府的组织下统一搬迁到这些地方

来,从而解决“一方水土养不好一方人”的问题。

实际上易地搬迁政策,并不是最新产生的一个政策,我们之前就已经积累了很多相关的移民政策的经验,包括像三峡工程移民、生态移民。那像这个生态移民,就是电视剧《山海情》里面看到的是相一致的,那么与这两项政策相比,易地搬迁政策主要是有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精准识别,它所瞄准的对象不是所有人,而是贫困户。第二个特点是科学安置,也就是说易地搬迁他是以集中安置为主,以分散安置为辅。什么叫集中安置?就是把这些贫困户统一搬迁到一个地方来,这个就非常讲究了。在我们调研的过程当中,很多地方主要采用的叫四靠原则。那四靠是哪四靠?靠近城镇,靠近中心村,靠近产业园区,靠近旅游景区,这样就可以方便他们就业,方便他们享受相关的公共服务。第三个特点是综合配套。易地搬迁政策不是独立实施的,它会和很多其他的政策一起实施,我们的政府不是说把你搬过来,就不管你了,还会给你提供相关的道路、水电,还有在旁边设幼儿园、学校。还有像社区服务等等这一系列公共服务,这个政策还会和精准扶贫和脱贫攻坚里的其他政策比如就业扶贫,产业扶贫,像光伏扶贫,还有扶贫车间、公益岗位等等一系列政策都组合在一起,这样能够帮助他们增加更多的收入的渠道。所以说从这三个方面来看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易地搬迁政策的效果,我们利用前期的调研数据回来做了分析,确实是发现易地搬迁政策显著的增加了贫困户的劳动供给和收入的增长,主要的渠道就是居住条件的改善,还有就业机会的增加。还有一个就是邻里条件产生的同群效应,增加了搬迁贫困户的人力资本,劳动供给时间和劳动生产率,更重要的是我们发现了什么?就是女性的劳动供给在这个过程中有大幅度的增加,那这是易地搬迁政策所带来的效果,也是我们研究的发现。

## 《暨南乡村谈》第二期：乡村旅游前景如何



在第二期节目，我们聚焦乡村旅游话题，共同探讨乡村旅游的前景到底如何？乡村旅游的发展又能给乡村振兴、农民致富带来什么实际性影响。

我们邀请到暨南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特聘研究员、暨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鹏、谢宝剑，暨南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院长助理、专职研究员李承政进行解读。

### 01 乡村旅游的趋势变化

您认为近年来我国乡村旅游模式呈现出怎样的变化趋势，目前国内乡村旅游的现状如何。

李承政：随着国庆佳节的到来，可能有越来越多的居民要选择外出旅游，现阶段来看乡村旅游也许是非常重要的选择，这些年来乡村旅游也是蓬勃发展。

早期的时候主要是以简单的农家乐的形式呈现，目前来说越来越多的包括民宿经济、红色文化以及采摘文化、农耕文化等等一系列的亲子体验式的乡村旅游，也获得了蓬勃的发展。过去一个月以来，我在广东、江西、湖南、福建、浙江等省看了很多很多的村庄，我发现有越来越多的村庄开始发展乡村旅游经济，有一些特色鲜明的村庄，他们的乡村旅游做的非常有特色，比较好。

王鹏：最近这几年国家乡村旅游呈现出一些新特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乡村旅游从近郊走向了远郊，因为城市人群可能已经去周边郊区旅游过了，他们可能会利用这个长假，比如刚刚过去的中秋小长假，以及即将到来的国庆黄金周，开车或者是搭乘飞机到比较远的乡村去度假，这是第一个特点。

第二，乡村旅游带动了农村消费日益发达，很多城市的人群平时在城市里工作压力大，所以他们会希望通过乡村旅游去体验农家乐，住民宿，买农村土特产等，而这些都带动了当地消费。

第三，间接带动了我国国家人口和交通流动，除了常见飞机、高铁、动车，现在的人们也经常采用自驾游这种出行方式，而这也有助于与乡村旅游有关的交通运输业、餐饮业、住宿业等产业的进一步发展。

### 02 赋能乡村旅游

如果有村干部想发展本村的乡村旅游，他们需要怎样的基础工作呢？以及如何进一步为乡村旅游赋能？

李承政：我们在调研的过程当中也发现，不少村干部也想发展乡村旅游，在我看来得具备三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是村庄必须有一定的旅游资源和特色，这是一个能够吸引游客的根基。

第二要有善于经营、懂得营销的村干部。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村干部的话，就需要外面的公司来帮助营销。

第三还需要有一定的辐射能力。如果说这个村的旅游资源只能辐射到一个镇的话，是远远不够的，在我看来最起码辐射整个县域，在县域以内如果能够辐射到游客的话，乡村旅游就能够办下去。

### 03 乡村旅游案例

可不可以列举一下，这一两年乡村旅游做的比较好的典型例子。

李承政：第一种类型是有红色旅游资源的。比如说我们8月份的时候看到了湖南汝城县沙洲村，这个村发生了一个著名的故事，这是建党百年习近平总书记选出来的一个他最喜欢的故事，故事叫做半条被子温暖中国。

这个故事主要是讲，当年红军长征的时候，几位女红军借住在一个村民家中，村民家里是一贫如洗，没有一床像样的被子。所以第二天走的时候，女红军把身上唯一的一床被子剪了一半，送给了这位村民。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就是自己仅有一床被子，都要剪下一半留给百姓的一群人。

在解放之后，这个温暖中国的故事，在全国范围内传开。这个村现在也是基于这样一个故事，发展了旅游经济。现在，民宿餐饮以及党政干部的培训在这个村也是如火如荼地开展。

还有一个例子，就是福建宁德的下党乡。习近平总书记曾经在宁德工作过好几年，下党乡是一个山沟沟里面非常贫困的乡村。当时涨大水，把村都淹了，习近平总书记进去抗洪救灾过程当中发现原来中国还有这样的深山老林，条件这么艰苦的村庄。因为当时的车子无法进村，得走好几个小时的山路才能够进村，习近平总书记基于下党乡的情况，提出了“弱鸟先飞，滴水穿石”的激励当地乡民的名句。

现在下党乡已经发展的非常好了，同样也是民宿、旅游经济以及党政干部的培训，村民现在种植茶叶，通过“只卖茶园，不卖茶叶”的方式，你可以去他们的茶园里面选购一块茶园地，这里的茶叶每年都提供给你。

你可以通过认购的方式，利用现在电子商务技术，可以在家中打开手机，随时监控你所认购的茶园，茶叶的生长情况以及采摘情况。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当地村民的收入水平也获得了很大的提高。

另外一个例子是没有这样的红色资源的村庄，同样也能够通过借助于刚刚提到的技术手段能够发展的很好。这个例子来自于福建宁德柘荣县的靴岭尾村，这个村庄有梯田和山坡上的林下经济。

村集体通过与三家公司开展合作的方式来发展乡村旅游。通过与文创公司、文旅公司以及农业合作社，村集体通过入股的方式占股70%~80%，只要这些公司能够赚到收入，村集体也能获得收入，村民作为股东也能够获得分红。进入这样一个村庄，有这样一个农耕体验以及采摘区，这是由农业合作社在负责运营的，小孩可以去采摘水果。

关于文创文旅的话，他们有剪纸教学的课堂，当地村民就是有一种很特殊的手艺——剪纸艺术。你可以去购买他们的艺术作品，小孩也可以去学习简单的剪纸技术。还有画画的区域，小孩可以去学习，画油画以及山水画。有这样一整套的亲子娱乐项目的话，这个村庄也就吸引到了当地的许多的游客，甚至有不少游客是从邻县到村庄去旅游。同样通过这样一个方式，山沟沟里面小村庄的经济获得了很大的提升。

### 04 乡村旅游的发展前景

作为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一环，您认为我国乡村旅游还有怎样的发展前景？

谢宝剑：我们可以看到，近年来随着国家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乡村旅游市场一片欣欣向荣，我觉得未来乡村旅游还是值得被看好的，这是由几个方面所决定的。

第一，国家法律和政策保障。我们国家专门出台了《乡村振兴法》，中共中央国务院也出台了乡村振兴的发展战略以及一系列的政策文件，各级政府也不断加大这方面的资源投入和配套的公共服务以及公共基础设施的投入，所以从政策前景来说，乡村振兴是有非常好的政策和制度保障的。

第二，随着市场细分的不断的拓展，乡村旅游这个市场是前景可期的。从市场模式来看，乡村旅游改变了过去单纯的农家乐模式，出现了一系列乡村生态体验、乡村康养、乡村教育、科普，文创等等，不仅满足了多样化的市场需求，还带动了乡村产业的振兴。

第三，乡村旅游市场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需要。通过美丽乡村建设，人居环境的整治，乡村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乡村生态保护，乡村文化的激活，乡村旅游的发展从多方面、全方位地满足了人们对美好的乡村生活的向往，具有庞大的客户需求，可以说乡村旅游的发展一定是一片欣欣向荣的市场。

当然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我们不能搞大跃进，一哄而上，乡村旅游市场的发展一定要遵循市场发展规律。在政策和法律的保障下，根据乡村振兴发展战略的的推进节点，点线面结合进行全面建设，一步步形成完善的乡村旅游发展模式。

王鹏：我们国家的乡村旅游这几年日益兴旺起来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人口众多，城市化水平逐渐提高，大多数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选择留在大城市工作，有的甚至到国外工作生活。这两年可能受到疫情的影响，国民旅游偏好转向广大农村。因为现在城市中的人群可能原来成长的地方就是农村，对农村仍有较深的感情，而在城市长大的年轻一代，由于没有见过农村，也产生了好奇和向往。这些因素促使乡村旅游成为城市人群的重要休闲方式，未来我们中国的乡村旅游应该说还是有很大的发展前景，主要有以下几点依据。

第一，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不断的提高，人们对娱乐消费的需求随之增多。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以后，人们开始追求精神层面的满足和身心的愉悦。到乡村去

放松心灵、体验大自然成为城市人群常见的一种休闲方式。

第二，交通设施的完善，降低了人们出行的时间成本。以前人们出去旅游可能只能选择乘坐火车等长途交通工具，花在路上的时间成本太高，打消了很多人去远方旅游的想法。而现在高铁、动车、飞机等高效便捷的交通工具大大降低了出行的时间成本，所以人们也更愿意出门旅游了。

第三，城市里生活的这些人群，平时的工作学习压力很大，以致于他们很想利用假期外出到乡村这个不一样的环境放松身心。不只是大人，我们的下一代——孩子们平时的学习压力也很大，所以一到寒假、暑假有机会跟随大人去乡村旅游放松休闲，他们也很乐意。

从以上几个方面来看，中国乡村旅游在未来至少有相当一段时间会越来越兴旺。

## 05 乡村旅游如何助力乡村振兴

乡村旅游业的深度发展会对乡村振兴起到怎样的推动作用？

谢宝剑：我们知道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关键，而乡村旅游业的深度发展是乡村产业振兴的一个很重要的抓手。

首先，通过乡村旅游的深度发展，可以充分激活乡村的资源要素，比如通过改造传统的古村落的文化，把它孵化成比较好的乡村旅游资源，进而有效地推动文旅融合发展。

第二，乡村旅游业深度发展可以有效地推动乡村一二三产业的融合，通过产业的融合以有效延伸农业的产业链。我们知道乡村的产业链链条很有限，所以“十四五”很重要的一个目标是要提升产业链的现代化水平，在产业链上进行赋能增值。那么在乡村旅游深度发展的背景下，有效地激活农村的生产生活这些要素，把它融入到产业链发展中去，将有助于提升产业链的发展，而提升产业链的现代化水平将有助于促进乡村的经济发展和

产业振兴。比如通过把一些观光农业变成体验农业，可以进一步促进农民的增收、就业和农产品的销售，进而开拓农村广大市场，带动城市大量人流到乡村旅游，从而有效推动城乡产业的融合发展以及乡村旅游业的发展，进而推动乡村产业振兴。

第三，乡村旅游业的深度发展可以有效地开拓农村市场，增加农民的收入，实现城乡共同富裕。乡村旅游的发展一方面可以吸收农村的劳动力，实现当地就业，为村民提供比较稳定的收入；另一方面，也可有效地带动城市居民到乡村消费，从而大大拓宽一些农产品，特别是优质的农产品、有机农产品的销售。因为城市居民可能希望找到一些很好的原生态的或者优质农产品，但是缺乏购买渠道，而乡村旅游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促进农产品销售的途径。

王鹏：乡村振兴作为我们国家当前的一个重大发展战略，实际上是跟我们前几年一直推动的脱贫攻坚战略是一脉相承的，脱贫攻坚工作现在是有有效衔接到乡村振兴上面。而乡村旅游是乡村振兴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助力乡村振兴一个重要推动力，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很多农村可能并没有很好的农产品，但是它有很好的自然资源，如果我们能够发挥这种自然资源优势，通过农家乐、购物、民宿等带动消费，发展当地的乡村旅游经济，实际上也是一种不错的发展模式。

## 06 乡村旅游创业创收建议

谢宝剑：首先要做到知己知彼。就知己来说，首先要明白自己的优势，分析总控的优势到底在哪，是技术、资金，还是运营或者品牌，我们要结合乡村振兴产业来看自己究竟具备哪方面的优势，或者哪几个方面的优势。就知彼而言，要充分熟悉乡村振兴的政策，比如乡村旅游相关的政策，要找到这个政策支持的方向在哪里，进而把政策跟自己的优势相匹配。

其次，必须做好充分的市场调查，定位好自己的目标消费群体。

再次，要考虑乡村旅游的场景如何发生。比如，我们究竟是要在一些古村落中去挖掘文化或者美食，还是要在一些原生态景点设计旅游体验。只有先选取好消费场景，充分激活当地的产业资源和要素，才能事半功倍。

此外，我们还要考虑乡村旅游的商业模式的可推广性、可复制性以及可持续性。乡村旅游的模式是很丰富的，一定要结合当地的突出特色。一方面要考量该模式的可推广性和乡村旅游的承载力，切忌“过热”或“过冷”，因为“过热”会导致游客体验不行，那么短期来说我们可能是赚了一大笔，但长期来看，会对品牌有伤害。相反，“过冷”比如项目定位过于冷门或者定位过高、不接地气，就很难维持运营。同时也要考虑商业模式的可持续性，透支政策的红利这些短期行为是不可取的。

总之，要投身到乡村旅游业，首先要对自己自身的优势，尤其资金运营模式、管理模式、资源导入等方面做全面的、系统的评估。另外，还要全面评估政策支持和政策红线。同时，还要熟知了解这个市场，要有清晰定位，通过不断的完善，形成一个可持续的、可推广的、可复制的商业模式。

李承政：我个人觉得，首先要选择一个比较好的点，就是选择一个比较好的村庄。这个村庄必须要拥有旅游资源以及独特的文化。我也可以举一个例子，我们在温州调研时看到了一个村叫做曹村，这个村有“天下耕读第一镇”的称号。

这个村的土地基本上是整合连片的，很平坦，村庄在地的边缘，也就是说并不是一个村庄一片地间隔开，而是所有的土地都连片了。这一片土地中种了很多的稻米，在八、九月份稻米成熟季节，就可以看到连片的金黄色稻田，这是一个很美的景色。

所以它不仅是一个农业生产的综合体，同时还是一个旅游打卡的重要地点。这个地方是有一家公司运营的，这是一个来自广东的公司，他们在当地打造了“瓯越香米”这样一个品牌，用现代的科学技术，人工智能、5g技术来生产生态型的稻米，这个稻米的价格也相对来说比

较贵，所以在这样一个小的区域，即使是种粮也能够获得比较高的经济收入。

对于创业的人来说，这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因为我们在他们的公司墙上发现创业团队中有企业经营人才，也有高校人才，还有来自已经退休了的党政方面的人才。通过构建一个综合型的创业团队，项目取得了比较大的成功。

他们推广的经验叫做三位一体，就是种植一体化，种植是统一的，供销也是统一的，信用是统一的。如果说村民想要向银行贷款的话，通过打包的方式统一借贷，就能够获得比较优惠的利率，采购、供销也是一样的。如果说通过这样一个村民集中的方式，类似于我们常见的团购的方式，就能够节省成本。借助于人工智能、智慧农业的一系列技术，生产的香米是低碳的，无公害的，也能够卖得一个比较好的价格，取得了比较大的成功。

作为高校教师，我们可能作为一个智库团队，或者说一个指导型的团队成员，加入到这样一个创业团队当中，可能是作为教师参与乡村旅游的一种合适的方式。

王鹏：国家现在也出台了相关政策鼓励许多有志青年，特别是大学生，投入到广阔的农村去施展自己的才华。对此，我想提几点建议供这些年轻的朋友参考：

第一，要增强创业信心。有些人可能担心到农村会埋没了才能，以往学习的知识可能用不上，或者又担心到农村去就是吃苦。实际上现在很多地方的农村生活条件还不错，我们应该改变农村生活条件差的固有思维。

第二，要学会运用自己所学的知识，发挥自己的专业优势。比如有些人是学市场营销的，就可以运用其专业知识去帮助推广农村的农产品，宣传当地有特色的乡

村旅游服务。再比如，现在农村在大力建设基础设施，包括一些农田改造、水库建设以及新能源建设，相关专业的人才就可以去帮助这些村干部或者村民去发展这些新能源经济以及引进建设生物科技产业。



暨南-乡村振兴



扫描二维码，关注我的视频号

## 宗祠走向何处？

### 发挥宗族与祠堂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



作者：顾然（暨南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研究助理）

“岭南之著姓右族，其土沃而人繁，或一乡一姓，或一乡二三姓。其大小宗祖祧皆有祠，代为堂构，以壮丽高。”

——清·屈大均《广东新语》

明末清初著名学者屈大均在其《广东新语》中描述广东地区宗祠为盛，祠堂作为宗族的精神象征和物质载体，保存了丰厚的乡土宗族文化。时至今日，岭南的宗族之风依旧是中国大地上保存最为完整的。理解广东农村，不可忽略宗族和祠堂在农村的功能。趁着2021年“广东千村调查”的机会，我在前往粤东和粤西四个村落调研之后，更进一步地体会到了岭南农村宗族在乡村治理和文化振兴中可能发挥的作用。

#### 宗族和祠堂何以形成？

村落，本是一种地缘上的聚落，但在中华大地上，普遍存在的村落都是单姓村或二三姓村，血缘和地缘在某些程度上牢牢地扭结到了一起。这次我去的四个村子也

不例外，每个村的每个姓氏都有着自己的祠堂和宗族理事会。

为何华南地区的宗族观念如此之强呢？弗里德曼在《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和《中国宗族与社会：福建与广东》中的研究选择从功能主义的视角来认识宗族组织在华人社会的作用。从华南的宗族组织看，其存在的基础条件为边陲社会、水利灌溉系统、稻米种植、宗族内部社会地位分化等几个条件。弗里德曼认为，边疆社会移民为了防御外来威胁，很容易促成宗族的团结；水利灌溉系统的建立需要更多的劳力合作，促成宗族的团结；种植稻米而有农业盈余，能够为共同体提供固定的公共财产；而社会地位的分化有利于调控宗族内部的排列（弗里德曼，1958，1966）。

在宗族形成的过程中，每个村落中的每个宗族都修建了自己的宗祠，在封建时代传统的农业社会中，村民在宗族的组织下，过着一种自治的生活。宗族具有自己的公共财产，为内部成员提供经济、法律、贷款等方面的互助服务，并且使用武力来保卫本宗族的公共权益（韦伯，1999/1919）。在“皇权不下县”的时代，村中的事务普遍由宗族长老主持，形成了一套县以下的“自治体制”（费孝通，2006/1948）。

#### 宗祠的现状

在我前去调研的几个村子，他们祠堂主要有以下几个特征。

1. 集资新修是常态。广东的宗族依旧非常重视祠堂，祠堂作为宗族的“门面”，普遍都被翻修过。从建筑风格来看，这些祠堂一定程度上保留了传统古建筑的特色，但在墙面、瓷砖等部分多使用现代材料，整体显得新旧杂糅。

2. 祠堂功能异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进程快速发展,大量乡村人口向城镇转移导致传统村落空心化,传统乡土社会的瓦解使得祠堂作为宗族社会的空间载体功能逐渐丧失。村子里的祠堂普遍大门紧锁、常年闲置封闭,村民或游客在节假日也无法开展相应的公共活动。

而各地的宗族组织的发展却呈现不同的状况。尽管大多数村子都设立了宗族理事会,但由于宗族内的资源缺乏,很多宗族组织并没有能力参与到村庄的建设和治理中。发展较好的宗族理事会则有着较为明确的组织架构和工作分工。在宗族理事会下还分设了管理各个事务的部门,如负责与在外族人联系的沟通部门,管理族人捐款的财务部门和帮助族内贫困村民的帮扶部门。

总的来说,广东各地区村庄的宗族和祠堂普遍保有架构,但在乡村治理和文化振兴中很难找到自己准确的定位。

### 如何实现宗族的村治和文化功能?

宗族作为乡村社会的传统自组织资源,仍旧具有为其成员提供各种精神的、物质的公共品的能力,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村民的某些文化和物质需求。同时,宗族作为非正式组织,其内部的非正式规范也能对村民进行约束,提高乡村治理的水平。

宗族领袖作为社区内的“大熟人”,其社会关系和社会网络是宗族理事会权威性的来源,同时也给予了宗族理事会组织和利用这些资源的机会和能力,这使得农村社区的社会资源得到更好的整合。

宗族组织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给村庄提供资金的来源。设立奖学金和救济金是这些村子的族人反哺家乡的主要途径。通过给成绩优异的孩子提供奖学金,能够促进村民更加重视教育,而救济金也在政府贫困补助的基础上,进一步体现了农村的兜底功能。

此外通过族人的捐款宗族理事会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很多农村地区为修建道路、整顿沟渠而建立的“修桥委员会”“修路委员会”等临时性功能组织,就是由宗族理事会负责牵头组织成立的,在

族人捐款下完成这些基础公共设施的修建。由于宗族领袖(理事长)在乡村社会具有较高的威望和信任度,在筹集资金、组织劳力等方面往往能够得到村民的快速响应,从而能够实现村庄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



宗族内部普遍存在非正式的行为约束和规范,如族规、家风等。我所前往的客家地区的大姓,普遍在门口贴着“延陵世德,渤海家风”的对联,无时不在提醒自己要秉持世族家风。通过习俗规范、村落舆论及象征符号等一系列软力量,宗族组织能够充分发挥非正式制度对村落社区的规范作用。乡土社会作为一个熟人社会,在以差序格局为核心的社会关系中,其治理机制可概括为“礼治秩序、无讼、无为政治、长老政治”,即利用传统的人际关系和伦理维持社会秩序。村庄声誉、人情面子等价值理念依旧不同程度地影响着人们的行为方式,使得村民规训于乡规民约之下,从而有效地提高乡村治理的水平。

对于村庄的文化振兴,宗族的着力点主要还在祠堂这一物质载体和精神象征。祠堂是传统社会中重要的公共建筑,为各种公共活动提供了宽敞的场地。在祠堂内外举行节日庆典及民俗活动,能够构建村民共同的文化记忆,并逐渐形成牢固的宗族文化认同。利用祠堂原有的建筑构件改造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空间如文化礼堂、老年活动中心等来给村民提供更多的公共文化生活,能够突破传统宗族祠堂“非本族人不得进入”的狭隘性,在其宗族属性的基础上,强化其公共属性,延续并发扬传统祠堂承担的社会公共活动职能。

### 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作为传统社会结构一部分的宗族,在现代社会自然也存在水土不服的情况。在笔者前去调研的村子中,同样存在大姓欺压小姓的情况。以往的研究认为,宗族在农村呈现的负面效果主要集中在村委会选举、不同姓氏

之间的派系斗争以及传统糟粕思想对女性的压迫等方面。如何避免宗族对农村现代化的负面影响,也需要更多的关注。孙秀林的研究发现,如果同时存在发展良好的村委组织和宗族组织,村庄的治理绩效会得到显著提升(孙秀林,2011)。也就是说,在农村治理中,存在多

元权威能够提高不同权威机构之间的良性竞争,从而提高村民的福利。因此,要充分发挥宗族组织的正面作用,需要村委会提高其作为正式组织的权威性和独立性。根据笔者在广东农村的调研发现,村委能够有效约束宗族组织的村子,更能保留宗族组织其精华的部分。

## 沉寂的乡村:人都去哪儿了?



作者:周浩然(暨南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研究助理)

此次跟访,我随督导去了粤西地区茂名市的三个自然村,这段路程中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南粤大地的广袤与沉寂。重山叠嶂阻隔了各地的沟通与联系,但同样也孕育了多样的百越文化。就茂名而言,其北部多山地,地势高耸,而南部则较为平缓,所以在跟访信宜、高州的两地自然村途中,山路迂回曲折,村落间相距较远,房屋参差错落,且多依地形而建;茂南区的自然村,房屋聚集,交往通达要更为便利。即使地理条件有所不同,但我们在到访的乡村中所见却无甚差别。乡间水泥村道路面平整,沿途会看到三四层高的小楼排列整齐,田垄里绿苗生机盎然。雨后的傍晚,阿公阿婆在家门口摘菜做饭,三两孩童呼啦啦地跑过。“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的乡村景象是我这般快节奏城市生活人群的心之所向。新农村建设和村道硬化等项目着实改善了农村的人居环境,完善的基础设施也便利了人们的交通往来,但我却深深感到,在广袤的南粤大地,“沉寂无声”已经成为了乡村生活的新常态。



村里的健身设施

### 劳动力流向何方?

乡间路上行人少,良久才会有村民扛着农具与我们擦肩而过,敲开访户的门时往往只有年迈的老人和孩子应答。青壮劳动力外出打工、老人儿童留守村庄已经成为广东农村普遍的生活模式。我们的访员正巧赶上了邱阿姨回家,50多岁的邱阿姨在镇上的饭店做着清洁工作,丈夫是位建筑工人,在广州打零工,20多岁的儿子没有正式的工作,也在外打工,一家人聚少离多。邱阿姨家的状况在茂名似乎再普遍不过,在广东农村家庭中,大多数成员都在外打工,人们纷纷涌入大城市,期待找到更高待遇的工作。

快速的城镇化和工业化使得各种生产要素向城市聚集,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渐向东部和南部沿海大城市转移,劳动力的流出模式从“离土不离乡”逐渐发展成了“离土又离乡”。2021年5月,《广东省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发布,广东城镇化率达到74.15%,高城镇化率同时伴随着大规模的人口流动,而广东省内的外出务工人员则主要流向了珠三角地区中心城市。农村地区流失了大量的青壮年劳动力和优质人才,随之而来的“人口空心化”和“老龄化”问题日益严重,广袤的乡村因此愈发沉寂。

城镇化率保持着上升趋势,人口向大城市的流动已不可逆。同时,实现中国梦也不能落下乡村,乡村振兴亟需包括新型职业农民、技术型以及创新创业人才在内的多元化人才支撑。两者共同推动的人口流动呈现出城乡双向流动态势,“乡村振兴,关键在人”与当前的高城镇化率并不存在本质冲突。在城镇化进程中,人口流动的主流还是从农村向城镇流动,但乡村振兴也是一个长期推进的过程,要坚持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协调联动、相互促进、融合发展(彭建强,2018)。李恒(2021)认为乡村人口向城市的有序转移是推动乡村振兴的前提,谢地和李梓旗(2020)也指出,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并行背景下城乡人口流动面临的矛盾是表面化的,可以通过调整农村土地产权制度让有意愿进入城市的农民顺利进入城市工作生活,同时合理引导有意愿返乡创业的人进入农村。



茂南地区的民宿

### 让沉寂的乡村热闹起来!

乡村振兴,关键在人!那么乡村如何“引人”、“留人”,重焕活力与生机?当前我国城市人口流向农村主要有两大群体,一是回到或者进入农村开展农村经济社会活动的外出务工农民、农村大学生以及各类城市人才等,二是有乡村生态旅游需求的城市居民(谢地和李梓旗,2020)。追根溯源,让人才回流乡村一则需要农村能提供良好的创业平台和充足、适配的就业岗位,二则要依托农村地域特色创造消费需求,所以“发展农村特色产业,以产业聚人才”尤为重要。

发展农村特色产业要因地制宜,充分依托农村当地特色的农产品资源以及旅游资源等发展特色农业和特色旅游业,诸如广东省“一村一品,一镇一业”项目,不仅能够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助推当地农民就业,改善生活,也能够吸引广大青壮年回乡创业,进一步助推乡村产业发展,形成良性循环。“兰花之乡”韶关市翁源县就依托当地花卉、蔬菜、水果、蚕桑、甘蔗五个万亩特色

产业,联农带农,通过为农户提供相关的技术培训等措施,助力农户脱贫增收。

2021年6月,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指出,2019年我国各类涉农电商超过3万家,农产品网络销售额达3975亿元。互联网、大数据在推动农村特色产业发展中发挥着愈发重要的作用,网络直播带货之类的产品销售方式,接受面广,趣味性高,不仅拓展了农产品的销售渠道,同时也助力了旅游业的发展。2020“清远农家”古龙峡云端直播扶贫助农活动,就直接将景区打造成“清远农家”农产品和旅游产品的展示平台、直播平台,拉动网络消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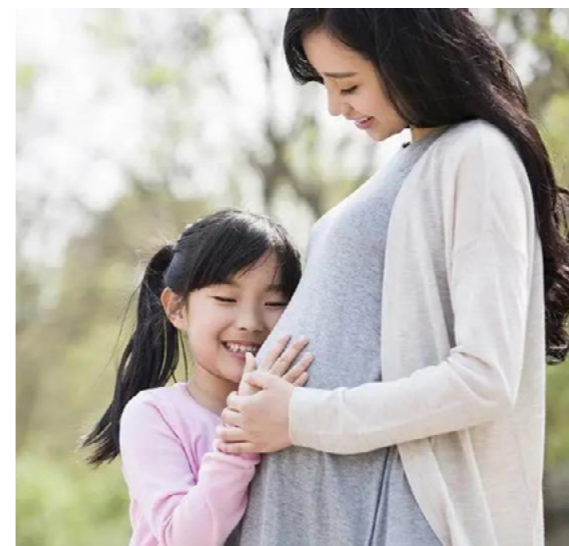
### 吾辈当自强!

一位刚刚上大二的访员在千村调查之行结束时谈到,通过这一次在粤地乡村的实地走访以及问卷调查,他与村民深入交谈,农村日常生活图景更加清晰地呈现在他面前。安静枯燥的乡村不比大都市繁华喧闹,但也更能让他静下心来去思考:记忆中淳朴且热闹的乡村何时变成了被时代发展远远落在了身后的老人,寂静、迟缓、一潭死水般的平静无波?在提及如何改变所看到的农村现状时,他谈到最近发展势头正猛的乡村农产品直播带货。他说想成为一名在幕后布景、为农户搭建舞台的人,想为农村注入新鲜的血液!年青的访员们坐在石阶上沉思,我看到了他们微微发红的鼻头和眼眶,也看到了他们愈发明亮和坚定的眼神。“为生民立命”,这就是中国新生代的思想与担当啊!

通过观测千村项目收集来的数据,我们了解人口流动、土地、劳动力收入与就业,我们关注教育公平、子女随迁与医疗养老,我们思考社会公平、共同富裕以及乡村振兴的成果和方向。通过千村项目,我们有幸与这群心怀乡土的当代青年相识和同路,一起深入农村,用双脚丈量乡村的每一寸田垄与土地,收集着关于乡村的第一手资料,从所见、所闻到有所感。他们会因受访老人的一句“努力读书,往外面走!”而深深触动,会在感受过乡村现状之后思考着如何用自身所学让脚下这片土地变得更加富饶安定!他们立足当下,坚定步履和理想,有了吾辈当自强的信念和责任感!我衷心期盼着,有着无限希望的他们终会再次走进这片土地,成为乡村振兴、祖国富强的新生力量!

## 家庭经济专题

### 【澎湃】余家庆 葛梦君：产假应该休多久？ “三孩”时代的产假政策再思考



作者：余家庆 葛梦君（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乡村振兴研究院研究助理）

早在今年“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宋治平提议延长女性产假至3-6年就引起了广泛热议。虽然女性应当休产假已经成为共识,但产假的长短却存在争议。争论认为,过短的产假不利于女性的身心恢复与子女照顾,而过长的产假所造成的劳动力损失又会使女性在就业市场上面临更大的歧视。随着“三孩政策”的出台,产假、生育津贴与公共托育等生育配套支持政策即将成为今后改革的焦点。那么,在制定政策时,多长时间的产假才是最合适的?

#### 产假：身心恢复到子女照顾

休产假对女性来说是一项非常重要的生育支持。产假一般贯穿分娩前中后的三个阶段,其中产后休假对产妇和新生儿健康至关重要。国际劳工组织(ILO)一项关于产假的研究报告指出,产妇和新生儿在产后二至六周

面临着较大的健康风险。在英国,47%的女性报告产后至少出现一种病症,最为常见的产后问题包括感染、贫血、抑郁、背痛和极端劳累。女性生育意味着向母亲这一新的角色转变,这期间产生剧烈的生理变化和心理变化,对女性的恢复和适应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休产假有利于母亲恢复分娩对身体的消耗,调整睡眠,以及从心理上调整适应新的人生角色。同时产假也保证了母亲有充足的时间关注自身和婴儿的健康状态,及时发现健康风险。

对此,早在1919年的《保护妇女生育公约》(Convention on Maternity Protection for Women)中,国际劳工组织便呼吁保障女性产后六个月的休息权(ILO, C003: Article3)。最新一版(2000年)《保护妇女生育公约》中,提倡产假至少持续14个星期(约98天),并建议有条件的会员国可增加至18周(约128天),同时确保女性不会因为休产假失去相应的劳动权益与福利(ILO, C183: Article3)。

而伴随近代工业化、现代化进程,女性作为潜在的劳动力后备军被整合进城市的生产体制(production regime)。职业女性兼具母亲和劳动者角色,这使得女性面临照顾与就业上的双重冲突。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计划经济制度鼓励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在“企业办社会”的指导下,城市的单位与街道普遍建立了哺乳室、托儿所和幼儿园等照顾机构。公办幼儿园体系作为劳动力市场的配套制度优先接纳城市职工家庭子女,并调整幼儿园开放时间、取消寒暑假以适应父母的工作需要。但随着1980年代市场化改革以来的“单位”制度瓦解,国家快速退出家庭私人生活,儿童照料等责任重新回归家庭。市场化改革后中国缺少儿童照料方面的公共服务,尤其是我国0-3岁的儿童照料机构几乎为空

白,只有少数中产以上家庭可以转向市场购买服务来弥补托育需求。同时,人口流动使城市新组建的家庭与原有亲属网络分开,随着家庭的核心化,传统大家庭的代际支持被削弱。

当前,大多数的女性在生育时获得的公共支持和家庭支持不足。受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以及“女性更适合照顾小孩”等性别刻板印象的影响,大多数女性在生育时难以获得的配偶的帮助,甚至出现“丧偶式育儿”的困境。根据第三期中国社会妇女地位调查显示,3岁以下的孩子基本由家庭承担照顾责任,其中母亲承担日间照顾责任的比例为63.2%。虽然我国女性就业率一直处于较高水平,如2010年中国18-64岁女性的就业率为71.1%,但这些现实的障碍使得职业女性面临着如何平衡工作和家庭的难题。

### 中国女性产假政策解读：1949-2021

中国的产假制度最早形成于1926年的民国时期,时长达到6-8周不等,但在当时的社会经济背景下并未普遍推行(李扬,2016)。1935年一项针对广州市60位已婚职业女性的调查显示,回答有产假的女性只有36人,产假天数主要(46%)集中在30-45日(陈慧贞,1935)。新中国成立后,1951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明确了当时城市女性职工的56天的产假权:“女工人与女职员生育,产前产后共给假五十六日,产假期间,工资照发。”56天的产假制度一直延续到1980年代末期。1988年颁布的《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将女职工产假由原来56天增加至90天。直到2012年新颁布的《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再次将中国女性的基础产假上调至98天。

目前,我国关于产假有关规定主要来自于国务院颁发的《女职工劳动特别规定》和各省的《女职工劳动特别法律规定》及《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首先,全国女性享有基础产假98天。2012年的国务院颁发《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第七条规定:“女职工生育享受98天产假,其中产前可以休假15天;难产的,增加产假15天;生育多胞胎的,每多生育1个婴儿,增加产假15天。”其次,根据不同省份的规定,各省的法定产假还可以在基础产假之上增加若干天数。例如,广东省的女性职

工还可获得计划生育奖励假。《广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规定:“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子女的夫妻,女方享受80日的奖励假……在规定假期内照发工资,不影响福利待遇和全勤评奖。”这意味着符合条件的广东省女性职工,法定最低产假为98+80=178天。

然而有趣的是,我国各个省份关于女性法定产假天数的规定差异很大,有的省份产假长达1年,有的省份产假短则不足两个月。其中,台湾、澳门、香港、北京、江苏、上海、天津、浙江等城市化率较高、经济发达的地区,产假天数较短,多为3个月或4个月。相比之下,同属于经济发达地区的广东省产假政策更长。

除了法定最低产假,部分省份还制定了产假延长政策。北京、吉林、重庆、福建省允许有条件的雇主额外增加产假1至12个月不等;海南、陕西、广西增设了哺乳假,允许有条件的雇主给予女职工3至12个月不等的哺乳假;陕西则针对参加孕前检查的女职工奖励额外10天的产假;广东则针对剖腹产的女职工额外提供30天的休假。

产假类别	最低产假保障	省份
3个月及以下	56天	台湾
	70天	澳门
	98天	香港
4个月	128天	北京、重庆、湖北、江苏、上海、天津、浙江
5个月	148天	广西
	158天	安徽、河北、湖南、内蒙古、江西、吉林、辽宁、宁夏、青海、山东、山西、四川、新疆、云南、福建
	168天	陕西
6个月	178天	广东
	180天	甘肃、黑龙江
	188天	海南、河南
6个月及以上	365天	西藏

各省女性职工产假表

### 他山之玉：产假应该休多久？

女性应该休产假已经成为共识,但该休多久的产假还未达成共识。生育对家庭和国家有益,却由企业来承担女性职工的养育成本,因此企业在招聘时不仅会考虑到已生育的女性面临的照料重担歧视已生育的女性,而且会考虑未生育的女性职工在未来生育时的成本。

太长和太短的产假都会对女性的工资、再就业和职业发展产生负面影响。

已有研究表明,如果女性休产假时间太长,会导致就业市场上的性别歧视加剧。同时母亲脱离职场太久对女性人力资本积累造成负面影响,也将降低母亲的职位或工资,使女性更容易面临“职场天花板”。中国学者於嘉和谢宇(2014)的一项研究表明,女性每生育一个子女会造成其工资下降约7%,而且这一负面影响将随着生育子女数量的增加而变大。反之,如果女性没有产假或产假时间太短,只能驱使女性退出劳动力市场,或转向时间更为弹性能满足她们照料孩子需求但收入不稳定、权益缺乏保障的灵活就业。在德国和英国,个体户(英国将连续就业不足26周的职工也列入其中)无法享有带薪生育假期,这也是两国生育女性兼职率较高的原因之一。在意大利,15至34岁的女性中有25%处于临时就业状态,其中只有极少数女性能够享有带薪生育假期,同时这也是意大利女性生育率较低的原因。

一些学者的研究表明,产假的时间应当适中,6个月的产假最为合适。一项针对欧洲地区生育假期对女性劳动参与的影响表明,短期休假(少于6个月)对生育女性的职业生涯影响很小,而享受较长的产假(不少于6个月)对女性,特别是育龄女性的工资产生负面影响,9个月的有薪产假将会使女性收入降低3%。除了产假外,一些国家还规定了父母假,这是由父母共同可以享有的假期。学者们的研究表明,较长的父母假会降低母亲返回就业单位的工资或者更可能使母亲退出劳动力市场,这是因为在一些国家,特别是在一些父权制国家,父母假通常由母亲申请使用。芬兰和丹麦的父母假较短,这些地区的母亲的劳动力市场参与率很高,而且生育率也较高;意大利的生育女性产假和育儿假的时间都较长,但女性就业率和生育率都不高,说明生育假期长无助于提高女性就业率。

育儿津贴也会对生育女性的就业产生不同的影响。父母假期间提供津贴,更可能促使母亲在小孩1岁内选择在家陪伴孩子;没有提供育儿津贴,母亲为了有足够经济能力照顾幼儿的生活需要,更可能提早返回劳动力市场从事兼职工作。在瑞典,生育女性的产假期工资相当于产前工资的90%,由于有优厚的假期津贴,生育女性在

父母假期间参加兼职工作的比例不到20%;英国和荷兰的生育女性育儿假是不带薪的,其在父母假期间参加兼职工作的比例分别为40.4%和60.2%,远高于瑞典,这意味着生育女性出于家庭收入的考量不得不在假期从事兼职工作,既不利于照顾孩子,还会造成母亲职位和收入降低。

### 谁能享受到产假权益？

除了关注产假政策的长短,产假多大程度能落地实施也是一个问题。事实上,大部分女性的产假权益在劳动力市场中很难得到充分保障。一般而言,从事高收入、工作稳定的女性更容易享受到产假。早在1995年,全国总工会女工部一项针对全国9753名女性职工的问卷调查显示(杨玉臣,1996),即使产假制度已经于1988年从56天提高到90天后,依然有相当比例的单位不给女性职工产假,或只按照旧的产假制度(56天)执行。不同工制、不同所有制企业在产假制度落实上也有明显的差异。而到了21世纪,类似的新闻报道依然屡见不鲜。

此外,模棱两可的政策文本,导致了往往是企业组织具有对产假政策的最终解释权。例如,北京市的产假一般是128天,但如果女职工“经所在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其他组织同意,可以再增加假期一至三个月。”这意味着女性职工的最长产假可休至218天,这就带来了企业、组织间的隐性福利差异。

早在传统中国社会,福利被运用于调节社会行为,成为良性干预的政策工具。《中国哈佛史》中就记载了汉朝使用税率来影响百姓的生活,包含了针对生育的妇女免税3年,对丈夫免税1年的福利。而在今天,面对“三孩政策”的生育调整,女性产假制度也需要对应的改革,亟需相关部门科学论证是否需要适度提高部分省份的女性职工产假,以适应新的人口政策变化;另一方面,在女性产假制度之外,还需要关注男性陪产假、夫妻哺乳假等制度的衔接。否则,再完善的女性产假制度,也容易最后滑落成女性独自承担育儿责任的窠臼。

本文首发在澎湃新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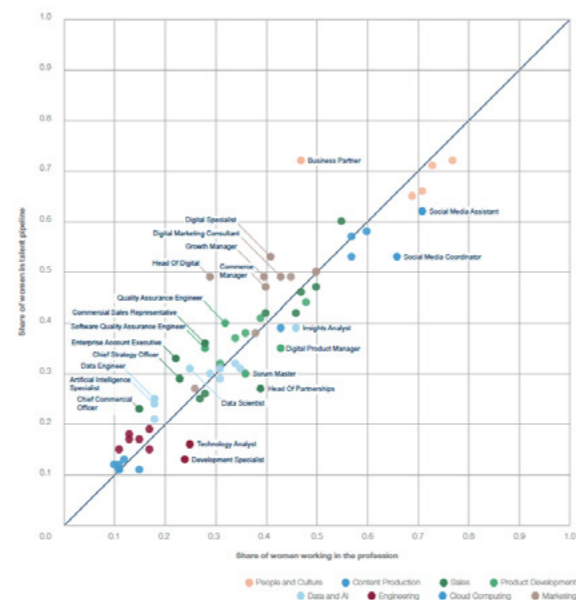
## 谢佳欣：被“女孩学不好数学”支配的那些年——性别观念与数学成绩



作者：谢佳欣（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助理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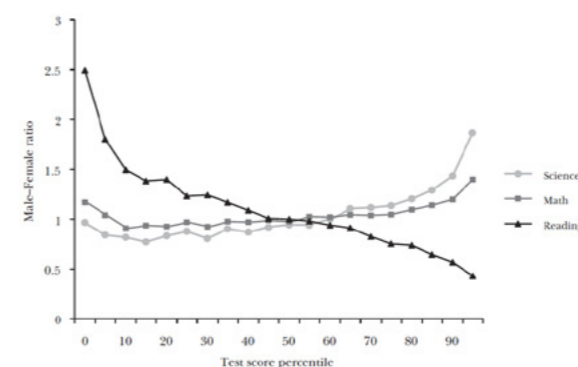
世界经济论坛在 2020 年发布的《全球性别差距报告》中指出，女性在数字经济时代将面临巨大的就业挑战。当前女性就业主要集中在可流程化的岗位中，在技术和创新型岗位中则占比较低。然而，在新经济背景下技术和创新型岗位才是劳动力需求的增长点，可流程化的岗位则将面临萎缩。根据 LinkedIn 数据科学家的估计，在最前沿的三类岗位中，女性从业者在数据与人工智能相关岗位中约占四分之一，在工程类岗位中约占七分之一，在云计算领域只占八分之一。而在掌握相关技术的人才储备中，女性的占比也同样很低（图一）。可见，除了劳动力市场上存在的性别歧视之外，女性在这些新兴领域的供给本就不足。事实上，这种女性缺席可以追溯到受教育阶段数学学习的两性差异上。尽管男女学生的数学成绩平均来看差别不大，但在高水平上却相距甚远（Pope and Sydnor, 2010）。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IMO）的各国历届参赛选手中，女生占比约十分之一。中国奥数国家队近十年入选的共六十名队员中也只有一名女生。这些事实似乎都印证了那些“女生学不好数学”，“女生后劲不足”的论调，让“女生学文科”看起来像是一种扬长避短的策略。但是，在社会现状塑造

我们观念的同时，我们传递给下一代的观念也将影响她们的未来。近年来的经济学研究就发现，父母的性别观念会影响女孩的数学成绩，来自更平等性别文化的女孩数学成绩更好。



图一 劳动力需求面临增长的专业领域中女性在从业者和人才储备中的占比 (Global Gender Gap Report 20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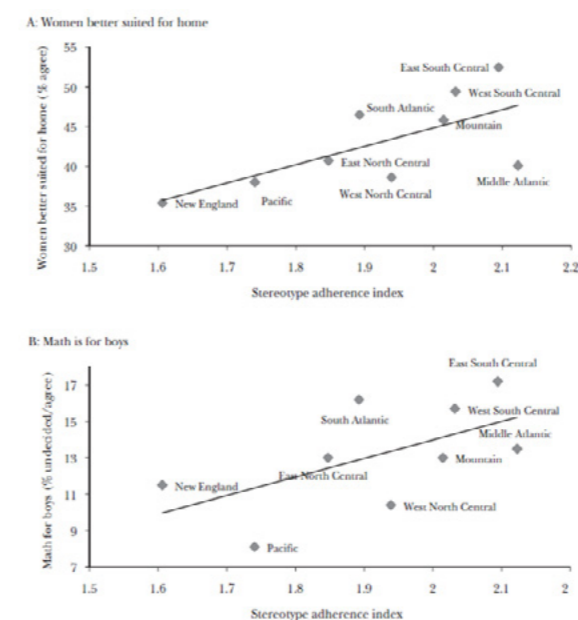
Pope 和 Sydnor (2010) 在分析了全美中学生的标准化考试 (NAEP) 中八年级学生的成绩后发现，在数学和科学成绩分布中，分数段越高，男生的占比越大（图二）。与之对应的是，在阅读成绩的分布中，分数段越高，女生的占比越大。如果男女在文理科方面的差异确实是先天形成的，那么这种“男生擅长理科女生擅长文科”的科别差异应该在全美国各个地区都同样存在。



图二 NAEP成绩分布的男-女生人数比 (Pope and Sydnor, 2010)

但事实却非如此。这种男女科别差异不仅展现出明显的地域性，并且与各地区的性别观念显著相关（图三）。在男女科别差异最小的新英格兰地区，不仅有相对较少（35%）的成年人认同“女性更适合待在家里”，参加考试的学生里认为“数学是男孩儿的玩意”的比例也较低（11%）。在成绩的性别差异更大的区域，持有这些保守的性别观念的人也更多。这种相关性提出了一种可能，会不会是环境中的集体想象力禁锢了女性的数学能力呢？

诚然，当很多老师和家长在对数学成绩不佳的女孩表示理解，或向女孩做出避开理工科的建议时，他们是善意的给出了基于社会现实的指导。但他们忽略了社会环境中原本就存在的对女孩学数学的不鼓励。家长和老师在对这种“不鼓励”的无意识顺应中却在事实上教会了女孩对数学的恐惧，扼杀了她们原本可能对数学存在的兴趣。如果在女孩与数学尽情交往之前就被环境中的有意或无意的声音“劝退”，使之无法探索琢磨，是多么可惜的事情。而心理学家也指出，关于“男孩更聪明”的刻板印象可能早在儿童六岁时就能影响到她们的信念、兴趣和选择（Bian, et. al, 2017）。也许，只有当成年人从现实中解放观念，鼓励女孩做出“反常识”的探索，才能帮助她们发挥自己全部的潜能。



图三 性别观念与男女科别差异 (Pope and Sydnor, 2010)

为了清晰地识别出文化环境中的性别观念对男女数学成绩差距的因果作用，Nollenberger 等人(2016,2018)对参加跨国评估学生能力计划 (PISA) 考试中的第二代移民学生的成绩进行了分析。研究者们发现，在同一个国家出生成长的学生中，男女生的数学成绩差异可以被他们母国的性别平等指数有效预测。由于这些移民二代本身并没有在母国生活的经历，母国的性别平等状况对她们产生影响的渠道更可能来自父母，也就是说父母受到母国性别差距状况的影响后，将性别观念传递给子女。来自性别更平等国家的二代移民女生不仅数学成绩更好，也对数学学习表现出更强的内在兴趣，更多的人认为自己“喜欢看数学读物，期待上数学课，能够享受解题的过程”。Dossi 等人 (2021) 则利用父母的生育行为直接度量其性别观念，假设生到男孩才停止的家庭更可能有“重男轻女”的倾向。这一基于佛罗里达州公立学校学生的研究显示，成长于疑似重男轻女家庭中的女孩数学成绩比成长于其他家庭中的女孩要差。另一方面，在这些佛州家庭中，当母亲更加认同“男主外女主内”的说法时，女孩的数学成绩更差，男孩则不受影响。由此可见，即使在相同的社会文化中，不同父母所持有的性别观念会直接影响女孩的数学学习。

[1] 跨国评估学生能力计划是一个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筹划的对全世界 15 岁学生学习水平的测试计划，最早开始于 2000 年，每三年进行一次。该计划旨在发展教育方法与成果。是目前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国际学生学习评价项目之一。

## 蔡澍 谢慧如：往事并不如烟，流金亦非岁月 ——如何测量主观幸福感？

作者：蔡澍（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副教授）

谢慧如（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研究助理）

### 写在前面



2012年中央电视台《走基层百姓心声》关于幸福的特别调查节目，在当年具有极高的讨论热度。记者简单的一问“你幸福吗？”，却引出了形色各异的答案。实质上，幸福是一个相对抽象的概念，每个人对幸福的定义及评价存在非常主观的判断，因此每个人对是否幸福的答案自然会千差万别。

一个值得提出的问题是，人们对于幸福的感受取决于过往生命历程的跌宕起伏，还是日常生活中所体验的细碎流金？经济学和社会学有不少关于主观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诚然，没有人可以声称其对幸福的定义及度量绝对正确，但依然有一些定义和理论在国际上被普遍接受和采用。

下面我们将为大家介绍两种较为常见的度量主观幸福感的方法，然后提出心理学关于主观幸福感变化的两个理论，最后介绍笔者关于检验两种理论的一项实证研究。

### 重要生命历程和日常生活感受

首先如何定义和衡量主观幸福感。最常见的方法是，让受访者对其整体生活状况进行自我评估，例如询问受

访者生活满意度 (Life satisfaction) ——“考虑所有因素，您对自己的生活满意吗？”然而早有研究指出，生活满意度的评估方法对时间不敏感，评估结果往往取决于过去生活中所发生的重大事件。即使岁月流逝，这些人生的重要往事也并非如烟逝去。

对比之下，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Daniel Kahneman 提出了日常生活重构方法 (Day Reconstruction Method, DRM) 来衡量主观幸福感，旨在从日常生活中捕捉人们对幸福的感受。具体来说，DRM 调查方法引导受访者回忆前一天的具体活动，描述活动的时长和当时的感受（例如愉悦、放松或郁闷），然后构建体验效用 (Experienced utility, EU)。通过累积不同场景的即时效用，来衡量主观幸福感。

总结对比，生活满意度是对过去生活经历的一个总体性评价，而基于 DRM 调查得到的体验效用则更多是捕捉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情绪。因此两种度量方法呈现了主观幸福感的不同侧面。

### 享乐适应还是愿望适应？

随着时间变化，人们对生活中发生的刺激因素 (stimulus) 会产生一定的适应性。心理学中有两个代表性理论——享乐适应 (Hedonic adaptation) 和愿望适应 (Aspiration adaptation)，可以用以解释主观幸福感随时间变化的路径。

享乐适应理论认为，人们对刺激的反应强度会随着时间而减弱。也就是说，对同一个强度的刺激因素，生活满意度和体验效用都会随着时间逐渐减弱。愿望适应理论则认为，主观幸福感由当前的刺激强度和愿望水平之间的差异所决定，人们的愿望会逐渐向当前的刺激强度调整，从而影响人们对幸福的感知。由于生活满意度更多地刻画主观幸福感的认知维度，所以人们在评估生活满意度时，更容易受愿望水平的影响，从而在长期

内维持相对稳定的水平。而体验效用更多地刻画主观幸福感的情绪维度，其更多地反映刺激因素的强度，不太会受到愿望适应的影响。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以下推断：在享乐适应理论下，随着时间发展，生活满意度和体验效用对生活刺激因素都不会太敏感，因此两者的变化路径应该趋于一致。在愿望适应理论下，生活满意度相比体验效用，更容易对生活刺激因素产生适应，因而两者的变化路径应该存在差异。究竟哪个理论更接近现实情况，这需要两种假说进行验证。

### 幸福感的变化——一项实证研究

为了检验上述两种理论，笔者对2006年和2009年在中国3个省份4个县开展的农村家户 DRM 调查数据进行了分析。该项调查在山东省（2个县）、安徽省（1个县）和四川省（1个县）展开。每个县随机抽取4个镇，每个镇随机抽取4个村，每个村再随机抽取20-30户农村家户。调查内容包括基本人口信息、家庭的社会和经济状况等。问卷中询问了受访者对生活的满意度，也参考世界卫生组织全球老龄化和成人健康研究 (SAGE) 开发的 DRM 调查，采访了18-70岁家庭成员具体的日常生活和评价。

具体的，在 DRM 调查模块，受访者被随机分为三个组，分别被询问早上、中午和晚上一系列连续的生活场景。受访者被要求回答每一个场景的具体活动，活动持续时间以及感受。其中感受参考 SAGE 的做法，设置为两个正向感受（享受、放松）和五个负向感受（担心、忙活、烦躁或生气、情绪低落、紧张或有压力），每一种感受分为“完全没有、有点儿、非常”三个等级强度。将每一位受访者对日常生活场景的情绪评价得分按照活动时长进行加权平均，可以得到该受访者的体验效用 (EU)。得到的体验效用取值范围在 -1 到 1 之间，越高则说明其状态越愉悦。

首先，描述性统计分析显示，2006年和2009年的生活满意度在统计上不存在显著差异，但有趣的是，体验效用却在两年间存在显著提升。如图1所示，2009年的体验效用明显更高。然后，我们进一步在控制了个体特征、家庭特征、以及时间固定效应与个体固定效应后，

分析结果同样佐证上述发现，即人们的生活满意度在两个调查时间点没有显著变化，而体验效用净值却显著增加。最后，我们将体验效用的变化按情绪效应与时间效应进行分解，分析活动感受和活动时间对受访者体验效用变化的解释程度。结果显示，情绪效应能够解释90%的变化，时间分配的差异解释力度仅为10%。

概括而言，笔者的研究发现在2006年到2009年间，人们日常生活的体验效用得到了显著提升，而他们的主观幸福感水平相对较为平稳。以上实证分析拒绝了享乐适应理论，验证了愿望适应理论。根据后一理论，人们会随着生活环境的改变而调整自己的愿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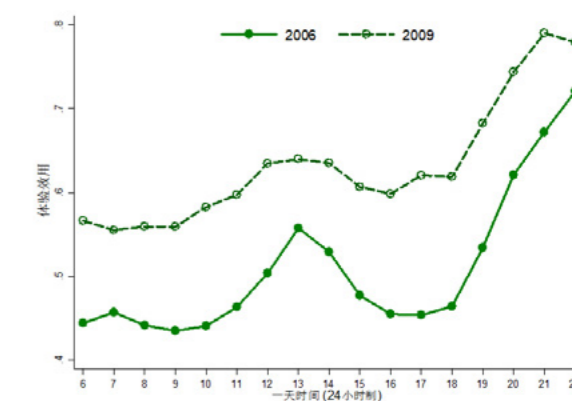


图1. 2006年和2009年体验效用分布图

来源：Cai et al. (2020)

### 启示

综上，笔者的研究发现，人们的生活满意度会维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水平，而体验效用更容易受生活水平等冲击的影响。我们对于过往岁月的认识和我们所体验的日常生活并不一致。背后的原因是，人们会根据生活的变化而调整自己的愿望和预期，因而生活满意度相对平稳。纵使时间流逝，重大往事依然会影响我们对生活满意度的感知。同时，日常生活的细碎场景依旧真实，影响我们的体验效用。正所谓“往事并不如烟，流金亦非岁月”。

最后需要补充的是，笔者的研究所使用的数据时间跨度仅为三年，地域覆盖仅为四个县，要验证该理论的普遍适用性，还需要更长时间跨度、更广地域范围的数据。

## 李润梁：家庭债务是如何强化经济波动的？



作者：李润梁（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助理教授）

张羽新（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本科生）

研究亚洲金融风暴、美国次贷危机等历史事件，不难发现严重的衰退之前往往出现了家庭与企业负债上升和资产价格暴跌的情况。这一现象对于经济与金融领域的学者、学生及政策制定者都是非常熟悉的。债务为什么会与经济波动有如此紧密的联系？债务上升的原因是什么？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有助于我们从根本上理解危机的发展并掌握危机的化解方法。在之前的一文中，我们宏观地讨论了一国信贷水平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见《杠杆率与经济周期新特征》）。在这里，我们基于两位知名学者 Atif Mian 和 Amir Sufi 所著的 House of Debt（《房贷》）一书及他们的相关研究，从家庭负债这一微观基础开始，简单地讨论债务与经济波动的关系。

### 负债对危机中家庭净值的影响

当存在债务时，危机会加剧财富不平等。这符合后金融危机时代美国贫富更加分化（以及后来的茶党运动和中部地区民众支持特朗普）的现实。

净值是衡量家庭财富的一个重要标准，如果两个家庭的总资产都为 10000 元，一个家庭有 8000 元的负债，而另一个家庭没有负债，我们显然不会认为这两个家庭是相同的，因为后者实际能够支配的财富要比前者大得多。因此，相比于总资产，净值更能准确地反映家庭的实际财富。

现假设一个相对贫穷的家庭的全部资产就是其拥有的价值为 100000 美元的房屋，而它的贷款为 80000 美元，则这个家庭的净值为 20000 美元。如果一段时间后房价下跌了 20000 美元且负债没有变，则家庭的净值将为 0，变化率为： $(0-20000)/20000 \times 100\% = -100\%$ 。于是，20% 的房价的下降带来的是 100% 的家庭财富的损失。这  $100\%/20\% = 5$  倍的数量就叫作杠杆乘数。假设一个比较富有的家庭拥有同样价值的房屋，而没有贷款，则同样数量的房价的下降使得净值变为 80000，变化率为： $(80000-100000)/100000 \times 100\% = -20\%$ ，等于房价的下降率。对比可见，杠杆乘数确实是由负债带来的。

表 1. 负债对危机中家庭净值的影响

家庭 A			家庭 A		
资产	负债	净值	资产	负债	净值
住房 100	贷款 80	20	住房 80	贷款 80	0
家庭 B			家庭 B		
资产	负债	净值	资产	负债	净值
住房 100	贷款 0	100	住房 80	贷款 0	80

单位：\$1000

此时财富的分布又有何变化呢？如果用富裕家庭与贫穷家庭净资产的比例衡量，前一时刻的比例为  $100000/20000 = 5$ ，而后一时刻的比例为  $80000/0 = \infty$ ，说明从净资产的角度，财富的分布发生了巨大转移。

现实中，富人比穷人还拥有更多的金融资产，有些金融资产，如债券，能够起到对冲房价下跌的作用。而即使富人的住房在金额上下降得更多，但下降的百分比依

然微不足道。因此，“高负债再加上房价大幅下跌，进一步拉大了美国富人和穷人之间本已悬殊的差距”。这正是我们观察到的事实。

### 负债对危机的加深作用

负债与危机共同导致了财富分布的不平等，不平等可以用基尼系数 (Gini index) 测度，它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宏观经济指标。我们进一步讨论，负债与危机对其他宏观经济变量（消费和就业）的影响。

### 消费降低

支出对净值(或可支配收入)变化的敏感度被称为边际消费倾向 (marginal propensity to consume, MPC)。假设边际消费倾向为 0.05，则 10000 美元的房屋价值的下降所带来的支出的缩减为 500 美元。

但是，由于债务的存在，人们的边际消费倾向并不是相同的。通过上一部分的论述，我们已知同样数额的房屋价值变动对高杠杆家庭净值变化率的影响要远大于低杠杆家庭。现实中，高杠杆家庭的边际消费倾向也是大于低杠杆家庭的。如果危机仅影响富裕家庭（如 2001 年的互联网泡沫），则这样的危机对消费的影响是有限的；但是，如果危机影响所有家庭，则由于高杠杆家庭的高边际消费倾向以及其人口本身就占社会总人口的大多数，这样的危机（如 2008 年金融危机）对消费的影响是巨大的。如作者所总结，“高债务水平一旦与资产价格大幅下跌相结合，将会导致支出大规模下降”。

### 摩擦与危机的区域间传导

除了负债水平与边际消费倾向的内在联系能影响衰退的程度以外，还要考虑与负债水平有关联的外在的摩擦 (friction) 以及溢出效应（即外部性）等因素。

摩擦。经济体系中的摩擦，可以理解为任何阻碍价格与数量自由调整的因素，包括垄断、交易成本、信息不对称、价格和数量的人为管制或自然限制。无摩擦是理想中的情况，而摩擦才是经济体系的现实。以西方国家普

遍面临的零利率下限为例，首先，高负债导致支出的大幅下降，常规货币政策的应对就是降低短期政府债券的名义利率（进而影响实际利率），如果这样的政策屡次被执行以致名义利率降至 0，则下一次危机时，继续以降低利率的方式刺激消费就变得困难或不可行，经济的恢复需要依靠其他措施来刺激消费或投资需求。（按：零利率并不是一个强加的约束，而是由一价定律导致的一个均衡结果。考虑两种资产，现金和短期政府债券（或存款），如果债券的利率小于现金的利率，即 0，则没有人会需要债券，为了吸引投资者持有债券，债券的利率只能大于等于 0，于是 0 便成为了债券利率的一个下限，称为零下限。当然，现实中保存现金的成本以及投资渠道的缺失确实会使得负利率存在，但也有下限，此处为不使问题复杂化，从略）。

外部性。外部性可以理解为双方的私人交易对其他人的影响。外部性之一：止赎所带来的资产价格下跌。止赎 (foreclosure) 指银行卖出无法偿还贷款的住户的房屋。止赎是否在法律上允许以及具体如何执行在不同国家和时期都是有区别的。简单说，银行通过止赎从拖欠贷款的购房者手中收回房屋后，会以更低的价格出售房屋。这样就会导致一个地区的房屋价格水平普遍下降。即使没有债务的居民也会因止赎导致的房屋价格的下降而出现家庭财务的损失。

外部性之二：危机在区域间的传导。由于不同市场的关联，高负债地区出现的消费水平下降会传导至未受影响的低负债地区。以汽车行业为例，如果低负债地区的汽车在高负债地区销售，则后者需求的降低会影响到前者汽车企业的收入。如果企业能通过降低人工工资应对需求的冲击，则当地的消费减少；如果企业不能通过调整工资来应对需求的下降，则企业会解雇工人，从而使失业率上升。

### 阻止恶性循环

为了应对负债对经济波动的不利影响，可以考虑从外部监管与债务合约本身两方面施策。监管方面，应当约束资本的权力，避免资本对房地产市场的炒作。作者之所

以不提及加强信用评级、完善银行风险评价机制等措施,是因为负债过高的根本原因不在贷款人,而在资金的供给方。过去的事实说明,是银行获得资金后主动扩大贷款业务、放松授信门槛,导致了经济过热及债务的扩张。

合约本身方面,作者提出了责任分担式的住房抵押贷款。具体来说,贷款人每月的还款数额是变动的(类似于通货膨胀保护债券, Treasury Inflation-Protected Securities, TIPS),且与房价指数而不是房屋本身挂钩。当房价指数相较于购房时的指数上升时,还款数额不发生变化,但当指数下降时,还款数额减少,这便减轻了居民的债务负担。这样的安排实际上牺牲了银行的利益,但银行可以通过收取更高的预付费用以弥补下行风险。作者的模拟显示,在这种情形下大衰退将只是一场温和的衰退。

### 负债的度量及比较

上述分析给出了负债与经济波动的理论关系。但如何度量负债,包括采用什么指标,选择何种变量,是重要的实际问题。好的度量指标结合理论分析,可以帮助我们最终解决一系列重大问题,如量化金融部门风险、评估是否存在提高杠杆的空间等。

上述理论分析中我们理所当然地采用了家庭资产负债率(=居民负债总额/家庭总资产)这个指标。它的优点在于数据微观、频率高、易理解,而且与理论分析一脉相承。但是,现实中,从微观层面获得家庭负债的额度并非易事,入户调查时,居民往往不会准确填报财产状况。而且,评估资产的价值也是不容易的。因此这一指标存在数据的获取成本高,且难以确定是否准确的缺点。

另一个衡量指标是家庭债务占GDP的比重,它被称之为居民杠杆率。用它度量债务水平的优点是数据容易获得。GDP数据是最常见的宏观经济指标,家庭债务可用央行提供的金融机构贷款余额(涵盖住房抵押贷款子项)来衡量。

家庭负债收入比也是衡量家庭债务负担的重要指标。它是对上一指标的改进,分母采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ystem of National Accounts)资金流量表中住户部门的可支配总收入。这一指标好处是能够据此推算出还清负债所需的时间,从而评估家庭债务负担。

由于篇幅所限,我们只列出参考文献,对度量指标以及后续如何开展经验研究就不详细论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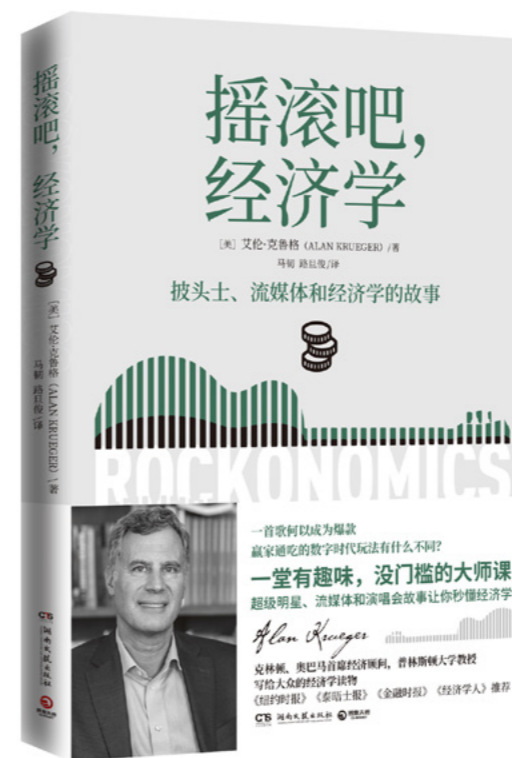
### 小结

我们在这里简要回顾了家庭债务与经济波动关系的基本理论,包括:1) 债务与危机能够导致财富分布的变化,加大贫富差距;2) 债务的存在能通过摩擦及外部性放大经济波动;3) 债务扩张的背后有着资本权力的影响;4) 可以考虑设计责任分担式的住房抵押贷款;5) 存在三类度量负债水平的重要指标。

未来,我们希望能够就量化金融部门风险、评估杠杆合理区间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作进一步讨论。

## 好文回顾

### 【澎湃】卢晶亮：《摇滚吧，经济学》：透过音乐窥探经济生活



作者: 卢晶亮(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副教授)

“到音乐产业的后台转一转,我们便能窥见经济学以及生活的门道”

——艾伦·克鲁格

写作缘起

2021年9月17日,是已故美国经济学家艾伦·克鲁格(Alan Krueger, 1960-2019)诞辰61周年纪念日。

克鲁格生前是普林斯顿大学讲席教授,在劳动经济

学领域曾做出多项开创性研究,还曾担任美国总统顾问经济委员会主席、财政部助理部长和劳工部首席经济学家等要职。克鲁格教授于2019年3月不幸离世,他生前最后一本著作《摇滚吧,经济学》(rockonomics)的简体中文版于2020年4月与读者见面。

本文对该书的主要内容作简要介绍,谨以此文纪念克鲁格教授。

### 流行音乐与经济学 一样都是在“讲故事”

《摇滚吧,经济学》是艾伦·克鲁格的遗作,也是他职业生涯中唯一一本面向大众读者的经济学通俗读物。在书中,克鲁格通过详实的数据分析,引用多学科前沿研究,采访众多一线从业人员,将流行音乐产业如何运行的经济学机制抽丝剥茧,用通俗的语言展现在读者眼前,并借由音乐产业阐释现实经济运行的诸多规律。

事实上,流行音乐产业是一个非常小的产业,2017年美国的音乐消费额为183亿美元,占GDP的比重还不到0.1%,而音乐从业人员占全国劳动力总数的比重还不到0.2%。相比较而言,美国人花在健身俱乐部上的开销比花在音乐上的要多50%,花在抽烟上的钱是花在音乐上的五倍多。那么克鲁格为什么要写一本书来详细剖析流行音乐产业的运行规律呢?

克鲁格认为,音乐是少数广大民众都会参与其中的活动之一。流行音乐就是讲述人们的心情故事,本质上是一门在听众中引发情感共鸣的艺术。而经济学同样是在“讲故事”,只是复杂的经济模型与枯燥的数据分析让民众对于经济学敬而远之,大多数经济学家并没有把

故事讲好,让经济学变成“沉闷的科学”。

长期执教于普林斯顿大学,曾任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克鲁格,经常需要在各种场合向大众解释美国的经济政策,从而让他萌发了这样一个想法:由音乐产业入手,进而论述美国经济与音乐产业的相似之处。通过解析音乐产业的方方面面,克鲁格在本书中向读者生动地解释了一系列经济学概念:超级明星效应、价格歧视、鲍莫尔成本病、破坏性创造、契约理论等。

### 超级明星经济学

流行音乐产业是由超级明星主宰整个市场的典型范例,少数参与者吸引了绝大部分的眼球并赚走了绝大部分的钱。

据统计,2016年音乐人的中位数年收入为20000美元,比其他所有行业工作者的中位数收入低15000美元。音乐人是“零工经济”(Gig Economy)的典型职业,“Gig”一词就是由20世纪20年代的爵士乐手们所发明,意思是参加短期演出。2016年高达44%的音乐人自称是自我雇佣人员,他们的工作与收入很不稳定。

音乐人的主要收入来源是什么?你可能以为是来自唱片的版权收入。其实音乐人签署唱片合同后会拿到一笔预付金,之后一般只能从唱片版权收入中拿到10%-12%的份额。这是因为绝大部分唱片是不赚钱的,唱片公司为了分担风险会如此设计合同。

21世纪之初盗版音乐的猖獗更是让唱片销售一蹶不振,音乐人只能纷纷转向现场演出。如今,音乐人的收入绝大部分来自现场演出。2017年收入最高的U2乐队当年一共挣了5400万美元,其中96%来自巡演。

克鲁格对演唱会收入数据的分析表明,顶端1%音乐人的收入在总收入中的占比由1982年的26%上升到2017年60%;同一时期,顶端5%音乐人的收入在总收入中的占比由62%上升到85%。顶端5%音乐人的收入是其他95%音乐人收入总和的6倍,这就是典型的超级明星市场。

已故著名经济学家舍温·罗森(Sherwin Rosen)指

出:超级明星市场的形成,需要具备两个条件:首先要有规模经济的存在,音乐人的作品能够大规模的传播,每增加一位受众所需的成本极小;其次,顶尖音乐人的作品必须是非完全替代品(imperfect substitutes),超级巨星必须拥有独特的风格与技能。

才华上的细微差异会造成经济回报上的巨大差异。由于规模经济的存在,排名第一的超级巨星即便才华只是略胜一筹,也会占据最大的市场份额,其回报也会比第二名多得多,这就是所谓的赢者通吃(The Winner Takes It All)。如同只有迈克尔·杰克逊(Michael Jackson)才会被称为流行音乐之王(King of Pop)。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整个美国经济都在朝超级明星市场的方向发展。顶端1%家庭的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由1980年的10%上升到2017年的22%。虽然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的影响因素较为复杂,但对收入差距扩大起到推波助澜作用的现象之一,超级明星公司的崛起与音乐产业超级明星赢者通吃的原理非常类似。

诸多行业的集中度在不断提升,少数超级明星公司主导整个市场。谷歌、脸书、苹果、亚马逊等超级明星公司利用巨大的规模经济优势,占据市场主导地位,有可能扼杀市场竞争。就在最近,美国司法部和联邦贸易委员会陆续对上述四家科技巨头展开了反垄断调查。如何遏制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也是克鲁格一直重点关注的议题。

### 演出必须继续:演唱会经济学

已故摇滚巨星大卫·鲍伊(David Bowie)在21世纪初曾预言:“音乐这东西将变得像自来水或电一样方便可用……你们得做好要办很多巡演的准备,因为那真的可能会是剩下的唯一还带有个人特色的东西。”

鲍伊的预言后来成了真,21世纪初盗版音乐的泛滥以及后来流媒体的出现,音乐消费果真变得廉价而唾手可得。音乐人纷纷转向现场演出,演唱会收入变成音乐人最主要的收入来源。

与此同时,演唱会的票价也经历了快速上涨。1996-2018年,演唱会的平均票价上涨了190%,超过同时期医疗保健价格的增速(113%),直追大学学费的增长速

度(204%)。演唱会票价的快速上涨也是前文提到的音乐人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因素。

门票价格应该如何决定?传统经济理论认为,应该由门票的需求与供给决定,并且应该对“好”位置与“差”位置区别定价,也就是利用价格歧视从观众那里攫取最大化的收入。然而现实情况是,门票往往定价偏低,或者观众不知道门票何时开售,即使知道也可能竞争不过票贩子,只能在二级市场上购票。

票贩子利用网络机器人的抢票速度优势在一级市场上购进大量门票,然后在二级市场上加价转售。经济学家的研究表明:二级市场的存在确实提高了门票的分配效率,但二级市场的溢价明显,增加了交易成本。总体来看票贩子成了最大赢家,而观众的福利受损。

美国知名票务公司特玛捷(Ticketmaster)采用“粉丝认证”售票机制来应对这一问题。潜在门票购买者必须事先在网站上注册并通过认证才能有资格购票,网站通过算法防止票贩子通过认证。粉丝购票后可以转让门票,但只能转给同样通过认证的粉丝。

著名歌手泰勒·斯威夫特(Taylor Swift)是推行“粉丝认证”购票机制的先驱,她的另一项创新是慢速票务模式。巡演门票采用分时段发售模式,并采用动态定价,结果表明只有3%的门票流入了二级市场。克鲁格对斯威夫特推崇备至,称其为“经济学天才”,因为她巧妙的利用价格歧视最大化收入而没有引起歌迷的反感。

以上是对书中精华内容的简要介绍,此外克鲁格还对唱片合同的签订与欺诈行为、流媒体(Streaming Media,如苹果音乐和QQ音乐)的出现如何重塑商业模式、音乐的知识产权保护、全球音乐市场分析、音乐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了探讨,感兴趣的读者可以深入研读。

### 写在最后

如果把艾伦·克鲁格称为经济学界的“摇滚明星”,我想很少有同行会提出异议。克鲁格的研究往往别出心裁而又极具启发性,他是最早将自然实验方法引入经济学研究的学者之一,他对于最低工资、教育、不平等、恐

怖主义、主观幸福感等问题的研究都已经成为经典之作。艾伦·克鲁格是任何一位从事劳动经济学研究的学者都难以绕过的名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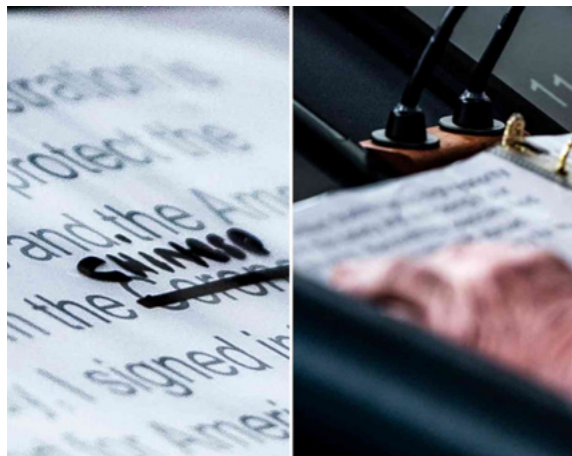
2019年6月《摇滚吧,经济学》正式出版,遗憾的是克鲁格教授在2019年3月结束了自己的生命。2018年11月,暨南大学百年商科纪念活动有幸邀请到克鲁格教授作主题演讲,他演讲的题目正是Rockonomics。笔者有幸曾陪同克鲁格教授一同夜游珠江,其间他跟我谈起许多有关音乐产业研究的趣事。

克鲁格教授告诉我他是一名业余鼓手,曾经与老乡、著名歌手布鲁斯·斯普林斯汀(Bruce Springsteen)同台演出让他倍感骄傲。他提及为了研究中国的音乐产业曾经采访过一些业内人士,但苦于资料有限无法深入研究,他计划未来与QQ音乐进一步合作,利用流媒体丰富的数据进一步研究中国音乐产业的商业模式。

后来当我读完《摇滚吧,经济学》之后,确实意识到中国音乐产业未来的发展潜力巨大,相关研究还处于空白状态。遗憾的是,克鲁格教授再也无法继续他未完成的研究,但他敏锐的问题意识让他又一次站在了研究前沿,令人心生敬佩。谨以推荐此书纪念艾伦·克鲁格教授,愿更多读者能够感受到经济学的无穷魅力。

本文首发在澎湃新闻

## 从“**The Chinese Must Go**”到“**Chinese Virus**”——美国社会对华态度的历史根源



作者: 谢斌(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助理教授)

刘丛(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助理教授)

薄诗雨(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副教授)

新冠病毒引发的肺炎疫情(COVID-19)自2020年3月开始在美国爆发。由于美国联邦政府对策的迟缓和混乱,疫情迅速蔓延,短时间内确诊病例成倍增加,引发了民众的强烈不满。处于舆论风口浪尖的时任总统特朗普为了自身的竞选需要,一方面试图淡化疫情的影响,另一方面将疫情爆发的责任公开“甩锅”中国。2020年3月16日,特朗普在推特发言中无视中国在抗击新冠疫情中付出的极大努力和牺牲,将新冠病毒称为“中国病毒”(英文原文为“Chinese virus”)。由于这一表述并不符合世界卫生组织制订的“病毒命名不应与特定地区相连”的命名原则,也并非美国卫生部门当时的惯用表述“冠状病毒”(英文原文为“coronavirus”),这条推特在发布之后迅速引起巨大的关注和争议,《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美国主流媒体就此也进行了深入报道,特朗普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也在社交媒体上对这一事件展开了激烈辩论。尽管美国疾控中心的负责人和世卫组织发言人均出面表明这一称谓并不恰当,仍有诸多

美国民众在社交媒体上援引“Chinese virus”这一提法表达对中国的负面态度,“Chinese virus”一词也在互联网上成为热门话题。谷歌搜索的趋势数据显示,在推文发布的后一天,即3月17日,美国国内对“Chinese virus”的搜索量激增至3月16日的13倍,并在此后的两天内持续增加(如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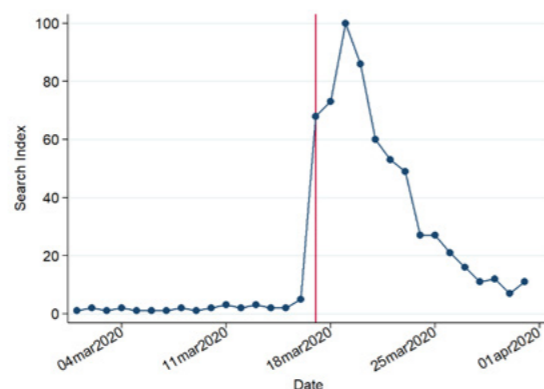


图1: 2020年3月1日至2020年3月31日

“Chinese virus”一词在全美搜索量的指数变化  
数据来源: 作者根据谷歌搜索趋势  
(Google trends) 绘制。

除了在推特中将新冠病毒称为“Chinese virus”,特朗普此后还在多个公开场合的发言中反复使用这一称谓。他这种蓄意将新冠病毒与中国相联系的做法成功激起了美国民众对中国和華人的排斥情绪,也对在美華人的处境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新冠疫情在美国爆发后,美国街头已经开始零星出现辱骂骚扰華裔的歧视事件。而在特朗普使用“Chinese virus”这一词汇刻意将新冠病毒指向中国和华人之后,美国民众对華裔的歧视行为愈演愈烈,在美華人因种族歧视遭受攻击的事件急剧增加。根据网站“停止仇恨亞裔美国人和太平洋岛民”(Stop AAPI Hate)统计,从3月19日起至3月25日,自发上报的针对亞裔和太平洋岛民的刻意回避、口头和

肢体骚扰乃至殴打和虐待事件达到673起,平均每天接近100起。至4月3日,类似的歧视事件达到1135起,其中有6.3%针对儿童或者青少年。而在特朗普推特发布后的1个月内,类似事件总计达到了1497起,遍布美国本土的45个州,其中有58%发生在加利福尼亚州或者纽约州。2021年3月16日,亚特兰大更是发生了一次震惊全国的枪击案,造成八人死亡,其中有六名亞裔女性罹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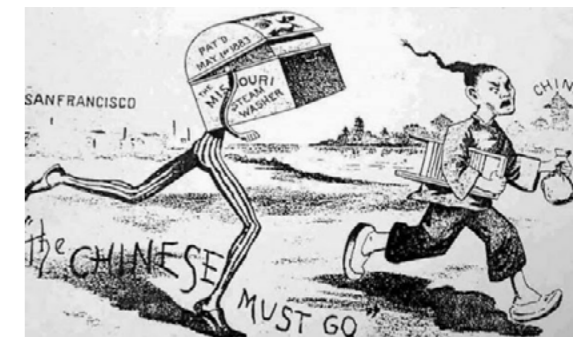


美国亞裔居民走上街头呼吁  
停止亞裔仇恨(Stop Asian Hate)

图片来源: 路透社

在相关媒体报道中,一些華裔受访者提到当下美国民众对待華人的态度令他们回忆了美国历史上華人长期被严重歧视的黑暗经历。与此呼应的是,我们的最新研究发现美国当下的排华情绪确实有其历史和文化根源,而非仅仅是当前国际政治格局和社会经济形势下的新鲜产物。美国社会中的排华观念肇始于19世纪后半叶。自19世纪中叶起,随着加利福尼亚州淘金热的兴起和美国西进运动的逐步推进,上万華人劳工从广东、福建等地移民至美国西部从事采矿和铁路修筑等工作,在数十年中为美国西部的社会经济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但是,工作岗位的竞争和种族文化的差异却让華人劳工逐步招致当地白人的歧视和排斥,针对華工的抗议和骚扰事件时有发生。“加州工人党”(Workingmen's Party of California)工会领袖在全美的政治宣传活动中甚至喊出了“无论发生什么,中国人必须走”(And whatever happens, the Chinese must go)的口号。在工会领导

和政客的推波助澜下,对華人劳工的歧视和排斥情绪席卷全国,最终导致美国国会于1882年立法通过《排华法案》(the Chinese Exclusion Act of 1882),全面禁止中国劳工移民美国,并剥夺華人入籍美国的权利。各州也相继出台各项法律规定,在多方面限制在美華人的权利。此后,美国各地的排华事件更为频发,手段也更加恶劣和极端,对華人的大规模驱逐、攻击乃至屠杀都频频出现。据统计,1880年至1890年间美国国内发生了至少507起针对華人的暴力袭击事件。在《排华法案》生效的60余年中,華人在美国成为极其边缘化的族裔群体,在移民、就业机会、公民权利等各个方面被全面限制,美国主流社会也一直保持着对華人强烈的歧视和排斥态度,这一现象直至20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之后和美国移民制度放宽配额才得到改善。可以说,在将近一百年的时间里,華人在美国始终生活在被排斥的阴影中。



我们的研究结合当下谷歌搜索中对“Chinese virus”的搜索频率指数数据(图2)与19世纪末期发生在美国境内的排华事件的历史记录(图3),使用双重差分的回归模型进行量化分析后发现:在特朗普发布推特后,历史上发生过更多排华事件地区的居民更倾向于在谷歌搜索引擎中搜索“Chinese virus”。我们还发现历史排华地区的居民也更倾向于在谷歌中搜索对華裔的侮辱性称谓“窄眼”(英文原文为“chink”)。此外,我们通过一系列检验排除了几个竞争性假说,包括这些地区居民仅仅是更关心疫情本身、更关注特朗普的任何言论,抑或是对所有少数族裔都怀有更排斥的情绪。这一系列结果显示,有历史排华经历地区的居民在当今也有着更强烈的排华情绪,并且更倾向于将新

新冠病毒引发的疫情归咎于中国和华人群体。由此我们总结认为，这段针对华人移民的歧视与暴力的历史虽然距今已有一个世纪有余，却仍然深深存留在美国社会的集体记忆中，并在当下中美关系再度紧张加之新冠疫情爆发的综合背景下重新浮现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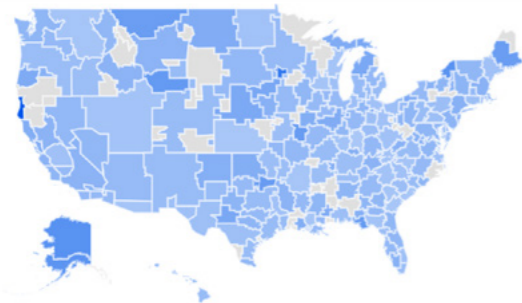


图2: 美国各都会区“Chinese virus”  
2020年3月16日至3月23日的谷歌搜索指数  
数据来源: 谷歌搜索趋势 (Google Trends)。

在此发现的基础之上，我们进一步探索了美排华态度在美国社会长期持续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地区的经济发达程度和排华持续性的关联并不明确，但是在本地制造业受到中国商品进口冲击更强烈的地区，其居民排华态度的延续性更强。这说明，当地区经济衰落的原因更容易被归咎于中国时，有排华历史的地区居民会更倾向于继承对华的负面态度。另一个更重要的发现是，排华态度的持续性在现代亚裔人口比例较高的地区更弱。这表明华裔和其他居民的密切接触与交流可以有效减弱排华态度的长期延续。通过对一系列美国主流和地方媒体报道的定性分析，我们也为这一结果提供了佐证：在当下华人聚集较多的地区，本地居民往往与华人社区的沟通交流更密切，媒体报道和社论也多对华人持同情和支持的态度；而在当下华人较少的地区，媒体态度则更中性，甚至也将新冠疫情归咎于中国和华人。综合上述发现，我们认为，虽然不同族裔居民之间可能产生资源竞争，但这些潜在矛盾和随之而来的排斥情绪是可以通过族裔群体之间充分的沟通、接触和合作来消弭

的。由于部分美国政客刻意营造出中美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利益冲突的图景，这些精心炮制的说辞激化了美国民众对中国和华人的排斥态度，但无论是在国家层面还是在族裔群体之间，加强互通、增进交流、合作共赢才是真正解决问题的良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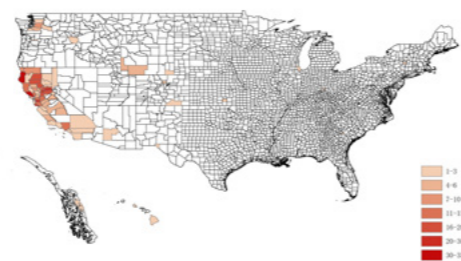


图3: 美国各县1880年至1890年间历史排华事件数量  
数据来源: Pfaelzer (2007)

## 刘珂：算法推荐的潜在风险



作者: 刘珂 (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助理教授)

人们很少能静下心来就某一个话题去搜索相关信息。大多数时候，我们只是拿起手机或者打开新的窗口，找到一个我们经常访问的网站或者APP，然后点击那些我们认为有趣的标题和朋友分享的链接，可能还会留下一句评论。我们可能并不准备得到任何有用的信息或知识，而只是想排队、等车、健身或者失眠时寻求一些娱乐。然而，我们往往对于在网上看到的内容如何决定以及怎样影响我们的认知并不了解或不感兴趣。

近年来，人工智能的发展让算法推荐强势崛起，成为当下最流行的内容分发方式。所谓的算法推荐，指的是互联网产品基于每个人的浏览历史、年龄、性别、地理位置等数据对将要浏览的内容做出个性化的选择。从新闻报道的角度，算法选择的结果往往都是支持我们已有观点的文章或推送，因为人们一般更喜欢浏览也更容易理解这类内容。在社交媒体上，算法也会给我们推荐和我们兴趣或立场相似的群组。这听起来可能并非什么坏事，但由于反复接受相同的观点，我们容易变得偏执并走向极化，就如同置身于信息的“回音室”之中。久而久

之，我们会假设所有人都和我们的想法一致，忽略了与我们的自我认知相冲突的观点，从而偏离了事实真相。

随着“算法为王”的价值观念被媒体广泛接受，对算法推荐的监管也迫在眉睫。8月3日，国家五部门发文要求开展对算法推荐的综合治理，算法推荐一时间成了众矢之的。为了有效制定相关的监管政策，我们首先需要理解算法推荐对媒体行业竞争和消费者认知的影响以及背后的经济学逻辑。

### 算法推荐与媒体行业

媒体行业的竞争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产品市场的竞争，媒体的数量也不简单等同于市场上的厂商数量。媒体不仅可以通过降低价格来吸引消费者，还可以通过其报道的信息来影响消费者的认知，从而影响消费者对于其他媒体的消费意愿。例如，假设某家媒体报道了吸引消费者眼球的虚假新闻，当消费者从其他媒体了解到更接近事实真相的报道以及相关证据时，理性的消费者未来会选择避开报道假新闻的媒体从而提高信息的准确性。因此，即使是规模较小的媒体也有能力通过信息的

传播对那些媒体巨头的市场需求产生深远影响,这也意味着传统意义上以市场份额为基础的市场集中度指标不完全适用于研究媒体行业。

算法推荐主要影响媒体行业的需求而非供给。换言之,算法推荐主要影响如何将媒体提供的内容和消费者进行匹配,而不是媒体如何提供这些内容。媒体市场上可供人们选择的内容数量众多,且质量参差不齐。这是由于媒体生产内容的边际成本较低,且不同消费者在不同时期的偏好不尽相同。更重要的是,新闻报道、社交媒体的发布、歌曲和电影等商品对于消费者而言属于“经验品”(experience goods),即这些内容的质量以及是否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只有在消费者消费以后才能确定。因此,不论是通过人工编辑还是算法推荐,如何从海量信息中筛选出最优质的内容提供给消费者至关重要。

那么,筛选的标准是什么?出于利润最大化的角度,媒体会给消费者推荐他们喜欢的内容。问题在于,从社会福利角度出发需要媒体提供的内容和消费者表面上想要看到的内容并不一致。一方面,消费者想要看到的信息往往并不能反映事实真相,这导致了所谓的“媒体偏见”。例如,人们可能更偏好与自我认知相符的极端的媒体倾向,而不是那些与自我认知相冲突的更准确和中立的新闻观点。另一方面,消费者往往只看重信息的娱乐价值,这导致许多优质信息被忽略。例如,人们可能更想要看到明星的八卦新闻,而不是那些对于人们日常生活中做出决策更有帮助的信息。算法推荐的潜在风险之一就是算法更擅长迎合消费者的这些偏好,从而在无形中损害了社会福利。

### 媒体偏见来自何处

消费者通过媒体获取信息,对于理性的消费者而言信息的质量由其准确性来衡量。在这种情况下,来自消费者和竞争者的压力使得媒体不得不寻求和传播更准确的信息,就如同产品市场竞争中生产者为了吸引消费者需要生产更好的商品一样。但实际上,媒体不仅向消费者提供信息,还要解读信息、说服消费者甚至提供娱乐价值。为了满足这些需求,媒体会对纯粹的信息进行加工并提出自己的观点。

人们对于事实的认知往往有所偏差,这种偏差可能源于教育经历、过去的新闻报道或对事物的成见,也可能被崇拜或信任的人的观念所影响。心理学研究表明,消费者更喜欢、相信且容易记住那些更符合其自我认知的信息。换言之,消费者更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例如,认为企业高管都是骗子的人可能更希望看到企业破产的新闻而不希望看到企业成功的新闻。媒体可以通过挑选有利于或不利于新闻报道对象的信息来迎合消费者的这种偏好。例如,媒体可以引用某个信息来源,却不承认另一个信息来源对同一组事实有截然相反的解读;媒体可以只选择部分数据来支持自己的结论;媒体可以通过挑选标题和图片来吸引那些不在意具体信息的受众。总而言之,即使不存在假新闻,媒体也可以通过不展示事实的全貌来形成媒体偏见。

那么我们自然要问,人们为什么更偏好媒体报道符合其自我认知的信息?一种可能的原因是,人们想要知道真相,但不确定媒体报道的是否是真相,而他们倾向于认为符合其自我认知的信息接近真相的可能性更大。例如,如果人们十分确信某位名人已经去世,当看到有关该名人还在出席活动的媒体报道时,人们可能怀疑该媒体的信息来源不够权威、对信息的解读有误或是在别有用心地扭曲信息。Gentzkow and Shapiro (2006) 在经济学顶级期刊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发表的论文表明,为了建立良好的声誉,媒体的最优策略就是不报道那些不符合消费者自我认知的信息,即使媒体自身认为那些信息更接近真相。在这种情况下,使消费者有更多途径在报道发布之后观察到事实真相(例如加强媒体行业的竞争,从而使消费者可以对照其他媒体的报道)会有助于缓解媒体偏见。当媒体想要通过扭曲信息来建立声誉时,一旦其他媒体选择曝出事实真相,存在媒体偏见的信息将会受到质疑。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天气预报、体育竞技比分、股票价格等可以在新闻报道之后马上得到验证的信息存在媒体偏见的可能性较低,而货币政策的影响、全球变暖的证据等即使在新闻报道很久之后也难以验证的信息存在媒体偏见的可能性较高。

另一种可能的原因是,人们只想被告知他们是对的,并不在乎真相到底是什么。例如,希拉里的支持者更愿意关注那些支持希拉里的媒体,因为这样他们就不会看到有利于特朗普的新闻报道。因此,即使支持特朗普的媒体报道的新闻更接近事实真相且人们了解这一点,也不会影响希拉里的支持者对于支持希拉里的媒体的需求。在这种情况下,加强媒体行业的竞争反而可能使媒体偏见更加严重 (Mullainathan and Shleifer, 2005),这和第一种原因导致的媒体偏见截然不同。原因在于媒体此时的最优策略是将目标客户锁定为与其自身立场相近的人群,并通过选择更极端的媒体偏见与其他媒体区分开来,从而加剧了消费者在认知上的“自我隔离”(不同立场的人选择的媒体在媒体偏见上也相去甚远)。这就如同在法庭审判过程中,陪审团中有一半的人只听取被告的陈述,而另一半只听取原告的陈述。有人可能会说,只关注和自己立场相近的媒体报道只是为了得到价值观被认同带来的愉悦,这并不影响对事实真相的了解和相信。然而,媒体偏见会潜移默化地影响你的自我认知,当你频繁的看到有媒体偏见的新闻报道时你心目中的“真相”可能也在悄悄改变。

### 信息太少娱乐太多

个人想要媒体提供的信息不同于社会需要媒体提供的信息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人们往往只看重媒体的娱乐价值。人们基于信息做出决策,而许多决策不仅影响决策者本身,还可能影响他人,即存在外部性。某些信息的娱乐价值并不高,甚至还需要消费者投入时间精力去理解,但却有助于消费者做出更明智的决策,包括一些涉及公共利益的决策。因此消费者有激励去“搭便车”,即让他人付出时间精力去获取这些信息以做出更好的决策,自己则有可能从别人的决策中受益。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媒体使用算法推荐以及在媒体行业引入竞争都可能损害社会福利:媒体更有能力或激励给不同消费者提供他们想要看到的信息(如明星丑闻)以迎合其偏好,而不是提供那些从社会福利角度来说更需要提供的信息(如对经济政策的解读)。当然,鼓励媒体去提供所谓的优质信息也并不保证能解决这一问题。首先,当消费者发现媒体提供的信息不满足其偏好时可以

干脆选择不接收任何信息(例如,不看任何新闻而是选择其他的娱乐方式作为替代品)。第二,即使消费者愿意接收这些信息,也并非所有消费者都可以有效的“消化”和记住这些信息。第三,算法难以去定义哪些信息是所谓的优质信息,例如在同一时期有关自然灾害的信息和有关疫情扩散的信息算法需要抉择报道的优先顺序。

总而言之,媒体行业运用算法推荐的潜在风险不可忽视,相信未来人工智能的发展会使得媒体提供的内容更接近真相并具有社会价值,而不仅仅停留在满足消费者的短期需求。

## 媒体聚焦

羊城晚报采访卢晶亮：  
人才“用脚投票” 缘何选择大湾区？

编者按：

日前，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经济社会发展统计图表：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超大、特大城市人口基本情况》显示，以人口数量为标准，我国（内地，下同）超大城市共7个，包括上海、北京、深圳、重庆、广州、成都、天津（按城区人口数排序，下同）；特大城市共14个，分别是武汉、东莞、西安、杭州、佛山、南京、沈阳、青岛、济南、长沙、哈尔滨、郑州、昆明、大连。

在我国内地的超大城市、特大城市中，粤港澳大湾区分别占据两席。大湾区为什么能够孕育这么多的超级城市？如何变“人口红利”为“人才红利”？《羊城晚报》采访了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副教授卢晶亮。

“超级城市”主要分布在哪？  
经济活跃的城市群人最多

我国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划分标准是人口数量。其中城区常住人口1000万以上的城市为超大城市，500万以上、1000万以下的是特大城市。

在2014年《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首次发布超大城市标准时，全国有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广州、深圳6个超大城市。今年发布的“七人普”数据中，成都成为新晋的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则新增4个，分别是佛山、长沙、昆明、大连。

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副教授卢晶亮指出，超大城市、特大城市主要分布于经济活跃的城市群、城市带，或是区域发展的中心城市。以特大城市中的东莞和佛山为例，其地处珠三角核心区域，又毗邻广深，因此享受着整个城市群带来的人口流入优势。

大湾区有何引才磁力？  
产业旺、交通畅、政策佳

卢晶亮认为，粤港澳大湾区的人口吸引力十分明显，最主要是因大湾区经济体量巨大，而且具有完善的供应链，既有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也有高端的高科技、新兴产业，且大湾区内各城市在产业上各有分工、良性竞争，可以形成非常有效力的产业集群，为人口就业提供了基本保障。

高铁、高速公路等交通网络的快速发展则为大湾区的人才引进消除了障碍。随着广深港高铁、穗莞深城际铁路等建成运营，广湛、汕汕、深江、深汕高铁等开工建设，大湾区铁路通车总里程已超过2200公里，高铁里程超过1200公里，城市轨道交通运营里程超过1000公里。交通带来了便利的生活，也方便了人才的进入，“把路打通，才能促进人口流动。”卢晶亮说。

开拓创新、开放包容、多元一体的大湾区文化也促进了外来人才的社会融入。大湾区内地城市都相继出台了人才引进计划，为优秀人才提供就业补贴、住房补贴等各种福利。深圳前海、珠海横琴、广州南沙等施行的创新引才政策，也为大湾区的人才引进提供了经验。

此外，大湾区的教育资源发达，广东省有151所高等院校，长期位于全国前列，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等一流高校不断为大湾区输入研究型人才。“大湾区内地城市还在不断提高高等教育水平，东莞市和香港城市大学合建香港城市大学（东莞校区）、香港大学将在深圳新建香港大学（深圳校区）等，合作办学将成为大湾区吸引人才的一大助力。”卢晶亮表示。

如何变“人口红利”为“人才红利”？  
打造高质量多层次人才发展环境

“将人口数量作为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标准，说明入选的城市对人口的吸引力是毋庸置疑的。人们会‘用脚投票’，劳动力的聚集说明城市有较强的吸引力和影响力。”卢晶亮表示，成为超大城市意味着更大的市场规模，有利于带动地区经济发展。

同时，他指出，城市发展涉及方方面面，人口数量只是其中一个重要指标，还要综合考虑经济、社会和环境等其他方面。从经济方面来说，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城市发展的重要考量；此外，房价或租房成本是主要的生活成本，会影响到人们的生活满意度，进而影响城市发展。从社会方面，大量外来务工人员依然是超大城市、特大城市的主力军，城市应更多提供社区支持和社会保障，建设更具有包容性的社会。环境方面，城市目前是主要的能源消费和碳排放地区，减少城市能源消耗和碳排放，实现可持续发展是城市需要追求的目标。

专家表示，将人口红利进一步转变为人才红利，是大湾区城市群发展的关键。“目前大湾区内地城市都出台了人才优惠政策，如果都是各自规划，容易出现政策趋同和内耗式竞争现象。因此，大湾区的人才政策需要各

城市协同共商，打造高质量多层次的人才发展环境。城市有各自明确的定位和分工，同时加强人才流动和培养，资源和服务同步，才能推动整个大湾区的人才建设和进步。”卢晶亮建议。

同时，卢晶亮认为：“对城市的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主要推动作用的是本土人才，各地政府应提高对本土人才的关注和待遇水平。”

## 广东下个特大城市会是谁？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横琴、前海两个合作区方案的落地，大湾区的劳动力集聚效应将愈发增强。那么，广东下一个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可能会是“谁”？

根据“七人普”数据，2020年，深圳、广州两个超大城市的城区常住人口分别为1744万、1488万，佛山、东莞两个特大城市的城区常住人口均超过了850万。除了以上四个城市外，惠州的城区常住人口超过了350万，珠海、江门的城区常住人口均在200万左右。城区现有的常住人口越多，说明城市规模越大，与特大城市、超大城市的差距越小。

在卢晶亮看来，应综合各方面因素来考虑。首先，城区常住人口数量是城市发展成为特大、超大城市的基础；其次，高学历人口的规模反映了城市现有的劳动力吸引力度；最后，各城市的经济发展状况是其吸引劳动力集聚的决定性因素。

本文首发在羊城晚报

## 二手房参考价陆续出台，刘诗濛接受南方经济 智库采访谈房地产调控逻辑



无论你是否接受最新发布的广州96个小区参考价，市场各方已经有了动作：

广发银行等银行向南方+独家表态，将把二手房参考价作为房贷评估价的重要参考。此外，多个中介平台的热门楼盘已经下架……

变化来得快，但也有迹可循：从去年末国家加强房市管控力度开始，到今年2月深圳率先推出二手房参考价，再到10多个城市陆续出台二手房参考价，二手房市场的调控已是必然。

在国家反复强调房地产市场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的背景下，为何调控集体转向二手房？参考价制度能起到什么作用？跳脱二手房参考价看整个政策环境，当下的房地产调控逻辑发生了哪些变化？

今天，粤评君和大家聊聊。

### 为什么调控瞄准二手房？

关注楼市会发现，近年来，一手房市场和二手房市场无论是市场价格还是调控，总有时间差。

在“新房强制降价3%”、新房摇号等政策影响下，广州的一手房价趋于平稳。然而，在一段时间里，二手房市场却处于政策相对空窗期。

“尤其是人口流入型城市的二手房市场交易活跃，包括挂牌价、成交价都出现了比较高的涨幅，甚至有一二手房房价倒挂的现象。”广州大学房地产研究所所长陈琳认为，二手房参考价弥补了稳房价中对二手房调控的相对空缺。

弥补这一空缺的必要性首先与一手房调控相关。说白了，房价由一手房房价和二手房房价组成，并且二者的价格有联动效应，相互影响。在一手房价格基本控制的基础上，如果二手房房价稳不住，新房价格就会有上涨预期，形成焦虑，此前就有调侃说，特别是一二手房房价倒挂的情况下，摇中新房就像股市打新成功，这显然会影响整个房地产市场的调控。

还有一方面，相比一手房，二手房周边配套完善、附带公共资源更多，具备更多议价的可能，也容易成为炒房目标，形成市场泡沫。另外在现实中，部分热门小区也可能出现抱团哄抬小区房价的情况。

因此，保持二手房价格合理、稳定，对稳定新房价格，整体实现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有重要意义。今年来，包括深圳、成都、上海等全国多个城市都出台二手房参考价，以此给二手房市场降温。

### 二手房接下来会怎样？

二手房参考价制度下，楼市会迎来哪些变化？

粤评君认为，最重要的还是稳预期。目前，虽然广州的二手房参考价的提法还是“引导”“考量依据之一”“重要参考”，但相对温和的政策释放着对二手房价格调控的确定性。

也有专家提出，如果参考价未达到调控预期，不排除可能像深圳那样实行强制措施。

同时，二手房参考价对购房者资金规划的影响也是确定的。

以银行房贷为例，如果参考价低于挂牌价，那么银行根据评估确定的贷款就会减少。“在一定程度上降了杠杆，由此减缓二手房交易，特别是依赖杠杆形成的需求，对二手房市场也会起到调控作用。”陈琳认为。中原地产代理有限公司战略研究中心总经理胡广东则指出，在参考价制度下，银行房贷量减小，也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风险。

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助理教授刘诗濛进一步指出，“出台二手房参考价侧重限制交易价格，特别是在目前国内经济面临下行压力货币政策有宽松预期的情况下，提前防止货币资金大量流入楼市。”

伴随而来，可以预见的是二手房市场交易量降低——因为买卖双方将处于一段关于价格博弈的僵持期。“购房人会观望房价是否下降，售房人也不一定会折价售卖，由此可能出现二手房交易量下降。”胡广东表示。

### 房地产调控方式变了？

由此看来，各大热门城市纷纷建立的二手住房成交参考价格发布机制，等于给二手房市场交易安装了“照明灯”、配备了“检测仪”、拧紧了“水龙头”，是贯彻落实房地产调控要求、构建房地产长效机制的重要措施，也有利于进一步提升二手住房市场信息透明度，为二手住房交易提供市场参考，规范交易秩序、稳定市场预期。

但，各位投资者，特别是炒房客除了看到有关部门通过“限价”抑制或延后需求以外，还应该关注到，当下房地产调控的逻辑已经从“限价”“限贷”等方式，转而采取更多的供需调控方式来实现“房住不炒”。

就在广州发布二手房参考价当天，国新办也举办了重磅的“努力实现全体人民住有所居”新闻发布会。

粤评君关注到，这个发布会全程未提关于房地产市场调控的各种具体措施，而是多次强调“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加快完善住房制度”“进一步完

善住房保障体系，增加保障性住房的供给，努力实现全体人民住有所居”。

这些论述或许也折射出房地产调控逻辑的改变——从重点针对价格调控房价，转向针对需求调控房价。

再进一步说，就是构建一个健康、合理的住房体系，调节住房与购房需求。在当前阶段，更准确地说，应该是让收入能力不足的人群住上房，通过满足需求缓解购房焦虑。

而应对之策是国家正在加快建立以公租房、保障性租赁住房和共有产权房为主体的住房保障体系。

上海克而瑞信息广佛区域首席分析师肖文晓认为，这个住房体系应该是“橄榄型”的。在这个体系中，自上而下，高收入人群选择顶部的完全商品房市场，中收入人群可以选择共有产权房、市场化租赁住房，年轻人、新市民等刚起步的群体可以选择保障性租赁住房，而困难群体可以选择公租房、廉租房等进行兜底。“‘橄榄型’最为稳定，当人人有房住，炒房自然就不存在。”肖文晓表示。

### 以租代购可以实现吗？

目前，国家将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作为完善住房保障体系的重要抓手，这也是“十四五”住房建设的重点任务。

从目前的意图看，保障性租赁住房主要作为新市民和年轻人的过渡性住房，并强调保障性租赁住房引入了市场模式以此实现可持续发展。

不过，也有人提出：长租放在整个房地产市场中看，是否就有了消纳购房需求并因此降低房价的可能？

粤评君和多位专家聊过后认为，通过“无产权”长租消纳购房需求可能实现，但关键在于如何解决群众对于房屋“产权”背后资源的渴求。

“租赁与中国的传统住房观念还是有一些冲突中国人最终都会想着能有自己产权的房子。”陈琳表示。

的确，产权是一种安定感、安全感的重要基础，因为产权背后连带的是医疗、教育、落户、出行等一系列公共资源和公共服务。

因此，粤评君认为只有同权或是能享受到的核心公共资源差距不大，才能实现较大范围的“以租代购”，实现对购房需求的消纳。

刘诗濛也指出，这是一个中长期政策，难点在于如何协调各方关系，并长期稳定运行，涉及诸多资源的分配。未来一方面，应通过制度创新来实现稳房价、稳预期，让大家能够买得起或租得起房，另外一方面，通过

城市功能特别是公共服务能力的提升，可以在相对有限的城市空间实现同等质量的生活水准。

而当前，在共同富裕的背景下，资源重新分配、调整正在进行中。对于教育培训、学区房等的政策调整，正释放着这样的信号。

另外，审视当下的住房保障体系，有专家认为共有产权房是一种比较好消纳纯市场购房需求的模式。“这种有产权，价格相对低的住房方式，能弥补很大一块住房需求。”陈琳认为，应该继续发展共有产权房将其作为住房市场的有效补充。

本文首发在南方日报

## 单身女性成买房主力军？ 刘诗濛接受《联合早报》采访



中国大城市房价居高不下，一套房子足以掏光几代人的腰包，而近几年，单身年轻女性买房呈崛起之势，‘男人有房才结婚，女人买房就单身’，为什么还会有越来越多的单身年轻女性去买房？房子会是她们婚姻的羁绊，还是婚姻天平上的砝码？《联合早报》特稿《单身女性成

买房主力军》采访了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助理教授刘诗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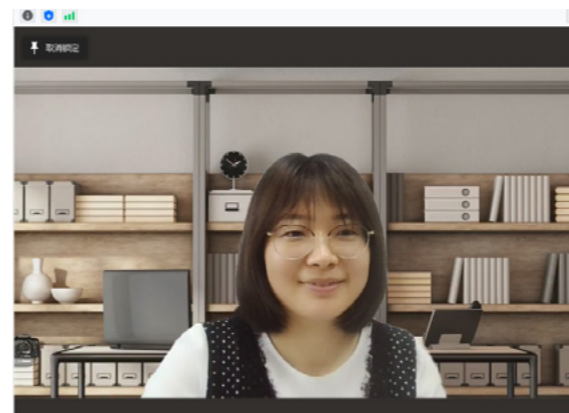
刘诗濛认为，从房产方面看，单身女性买房不会对婚恋行为有太大影响，买房相当于将现金资产转为房产资产，而房产回报率较前些年低多了，不会因大幅增值影响婚恋选择；如果从房子对于中国人具有特殊情感的角度来看，女性买房后，有可能对由婚姻带来家庭稳定的需求降低了，从而影响结婚的意愿和需求。

他说，如果女性自己有房，而不要求男方有房，这对结束单身状况是件好事；如果女性有一套，而要求男方有更大的房子，或两套房，则有可能加剧单身状况。

本文首发在《联合早报》

## 暨济一堂

### 杨丹：农业产业组织市场势力测度与竞争机制设计——基于马歇尔冲突视角的分析



经济学家马歇尔认为自由竞争形成的规模经济达到一定程度时会造成市场垄断从而抑制竞争，市场如何达到竞争和规模经济的均衡，政府如何进行有效干预是全社会面临的难题。2021年7月2日，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杨丹教授受邀作客我院“乡村振兴大讲堂”活动，从产业组织的视角出发关注农业领域的市场竞争机制，为我们带来题为“农业产业组织市场势力测度与竞争机制设计——基于马歇尔冲突视角的分析”的讲座。

讲座伊始，杨丹介绍了他们的研究的主要内容。农业领域最典型的产业组织分别为农业合作社和农业企业，通常也被称为新型农业主体。杨丹的研究基于2015年中国小微企业调查（CMES）数据，使用了改进后的随机前沿方法测度了农业产业组织的市场势力水平，随后使用门槛回归模型分析市场势力对经济福利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最后分区域进行有效竞争机制设计。

杨丹解释了“马歇尔冲突”的概念并介绍了研究的理论背景和现实背景。经济学家马歇尔认为自由竞争会导致生产规模扩大，形成的规模经济提高了市场占有率，但同时不可避免地造成市场的垄断。垄断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又会阻止竞争，扼杀企业的活力，造成资源的

不合理配置。如何求得市场竞争和规模经济之间的有效、合理的均衡，获得最大的生产效率，成为社会面临的难题。农业领域也可能存在马歇尔冲突。近年来，中国的农业产业组织在政策的支持和鼓励下不断蓬勃发展，比如十四五规划中提出要加快培育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业领域存在反垄断豁免，而中国的农业政策长期鼓励农民合作组织和农业企业发展，使得农业产业组织规模逐渐扩大；而农产品的易腐性等特征导致农产品交易市场可能存在局部垄断。因此，农业领域是否存在马歇尔冲突，以及如何解决，是值得深入探究的问题。

随后杨丹详细介绍了研究数据和实证方法。对于学界而言，当前存在的难题主要是如何测算市场势力，以及如何降低垄断带来的福利损失。目前农业领域产业组织研究匮乏，杨丹的研究为回答农业领域是否存在“马歇尔冲突”这一重要理论问题提供了实证支持，并为政府对农产品交易市场中不同农业组织实行差异化竞争机制设计提供参考依据。

最后，杨丹提出总结和建议。第一，农民合作社及农业企业在农产品交易市场上具有较高的市场势力，分别为44.8%和45.9%。2015年全国农民合作社因市场势力导致的福利净损失高达2604.21亿元，约占全国农民合作社农产品销售总额的33.10%，占农业GDP的4.14%。因此，政府应当加强对农业生产土地合理使用的监管，积极推进农村土地改革，增加农业补贴，降低经营风险及交易成本，撤销不合理的经济壁垒或行政壁垒。第二，农业产业组织市场势力和经济福利损失之间呈现“V”型关系，但目前还未到达底部拐点。因此，政府应该谨慎干预市场结构，维持适度垄断竞争，实行差异化的监管政策，在对市场结构进行控制时，要坚持谨慎干

的原则，避免出现“一刀切”现象。第三，农产品交易市场中存在“马歇尔冲突”。因此，政府应当对处于规模不经济的农业经营主体进行重点监管，针对占有高市场

份额的经济主体是否涉嫌具有滥用市场势力的行为，政府必须根据多种角度综合考虑，合理界定与科学动态的审查。

## 易福金：粮食安全赋能乡村振兴：粮食生产支持政策的演进轨迹与内在逻辑



### 粮食安全赋能乡村振兴： 粮食生产支持政策的演进轨迹与内在逻辑

易福金 教授  
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2021.07.08

粮食安全问题是我国农业工作和国家发展的重中之重，也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首要任务。如何对以往的粮食生产支持政策的变迁进行梳理总结，从中积累经验，并在新时期下通过粮食安全助力乡村振兴，是目前学界亟待研究的问题。2021年7月8日，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易福金教授受邀作客我院“乡村振兴大讲堂”活动，对于上述问题进行了前沿性的探索与分析，为我们带来了题为“粮食安全赋能乡村振兴：粮食生产支持政策的演进轨迹与内在逻辑”的精彩学术报告。

报告开始，易福金简要介绍了我国政府在实践和政策层面对于粮食安全重要性的重视，以及学界从多维度

多视角对粮食安全所进行的丰富的研究。同时易福金也指出从粮食生产支持政策角度来研究如何实现粮食安全具有宏观上的导向作用，并且从政策的历史演进脉络梳理过程中能够为我国现在和未来的粮食安全提供更加有效的镜鉴与参考作用。

易福金的报告共分为粮食安全观、粮食生产支持政策演进轨迹、内在逻辑和当前面临的挑战四个主要部分。在粮食安全观这一部分，他首先从粮食的社会属性和商品属性出发，点明了粮食所特有的区别于普通物品的性质。继而指出粮食安全的内涵，区别于FAO等国际组织侧重于质的粮食安全的理念，中国具有特殊的国情禀赋

与人口规模，我国的粮食安全对应的是供给的保障，是对于数量上的要求。当前我国的粮食产量已实现“十七连丰”，产量连续六年保持在6.5亿吨以上，在总体上从“吃不饱”到“吃得饱”，再到“吃得好，吃得安全”。不过我国粮食安全问题依然面对着相当多的挑战：粮食产业的弱质性，农业资源环境约束收紧，多重风险叠加等，都使得我国必须将粮食生产支持政策摆在愈加重要的位置之上。

在第二部分，易福金便系统梳理了我国的粮食生产支持政策演进轨迹，从统购统销时期（1979-1984年），到“双轨制”时期（1985-1997年），到保护价收购时期（1998-2003年），再到价格支持和补贴时期（2004-2013年），以及目前的优化调整时期（2014年-至今）。易福金详细分析了每个时期不同政策所取得的成效以及表现出的问题，构建了完整的政策变迁链条。

在内在逻辑这一部分，易福金分析了政府与市场，平均产量与波动之间的逻辑关系。我国的政府与市场之间在粮食购销方面经历了政府主导、政府直接干预市场和主导政府引导的关系变革。而我国的粮食产量则取决于平均产量和波动两个方面，即表现为基本面和风险之间的互动关系。

最后，易福金总揽全局，指出了我国粮食安全当前面临的挑战，即确保存量无虞，兼顾总量与波动以及推动可持续发展。同时，他还对于目前存在的一些粮食安全中的问题进行了指出与反思，即对于粮食生产补贴应当具有生产区域，粮食品种的差异性，而目前的研究中还鲜有利用系统精密的定量方法对于这一问题进行解决。同时目前的粮食库存标准存在口径上计算不一致的问题，政府或官方部门应当确定统一的标准，以保证实践上的可操作性和学界的可研究性。

## 郭红东：数字赋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



院副院长、浙江大学CARD中国农村电商研究中心主任郭红东教授作客我院“乡村振兴大讲堂”活动，从乡村振兴战略背景出发，详细分析了上述问题在当前时代背景下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并列举相关的典型案例予以佐证，为我们带来了题为“数字赋能，巩固脱贫成果与乡村振兴”的精彩学术讲座。

近年数字经济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引擎。2017年3月国务院首次将数字经济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推动“互联网+”深入发展、促进数字经济加快成长，让企业广泛受益、群众普遍受惠。由此，数字经济逐渐开始上升至国家战略层面的高度。而如何抓住数字技术发展之浪潮，借助互联网相关技术与手段，赋能乡村振兴，从而实现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是当前学界亟待解决的问题。2021年7月16日，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



郭红东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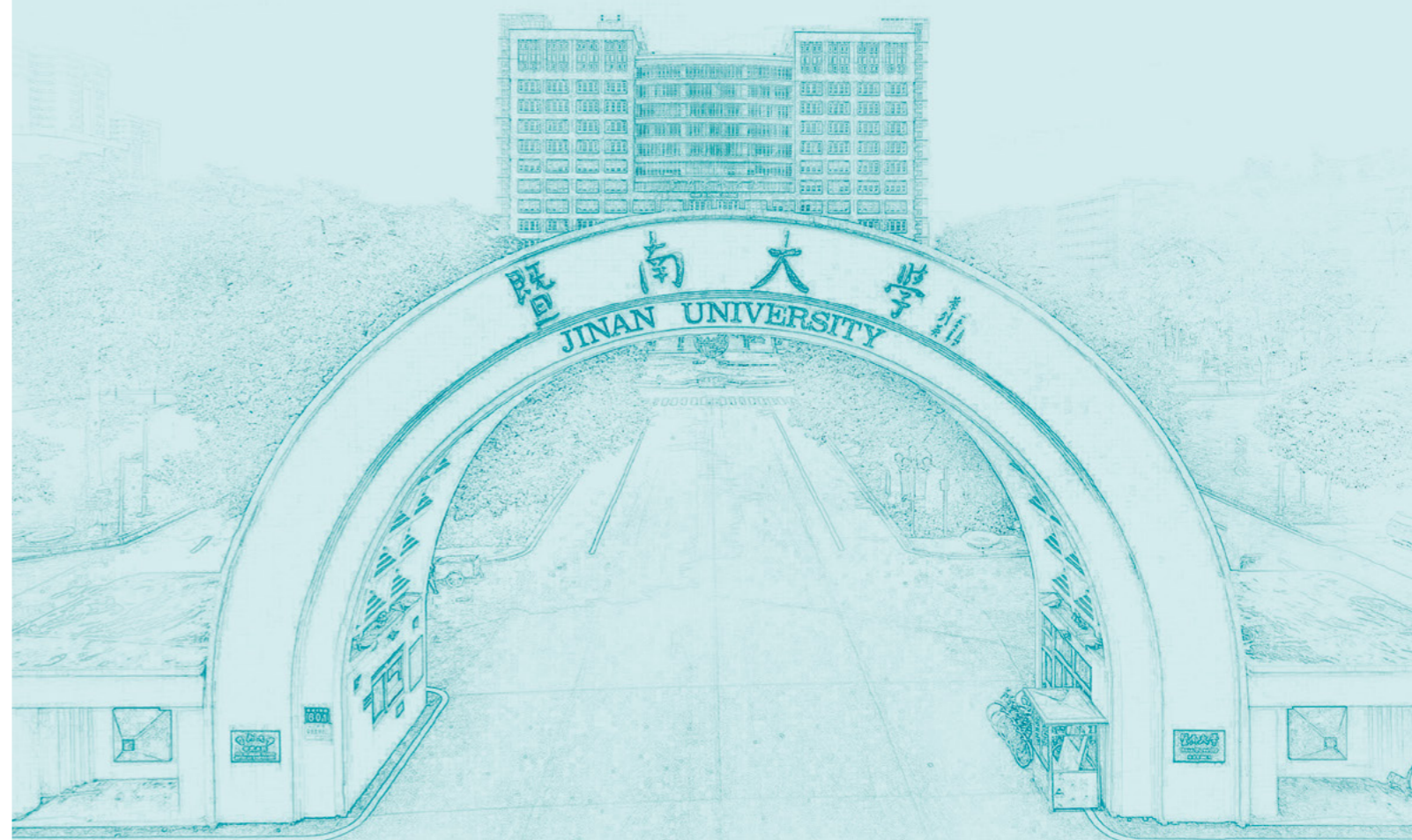
郭红东教授本次讲座共分为三个部分：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我国“三农问题”现状；数字化赋能乡村振兴之核心与方式；以及当前电商赋能乡村振兴的典型案例。

在第一部分，郭红东教授首先提出在数字技术快速发展、反贫困与乡村振兴战略以及相关农经学科的迫切需求下，研究数字经济已经成为重中之重。具体而言，郭红东教授以贫困为例，指出贫穷的本质，并提出实现脱贫的关键，即激发农民创新创业活力、提高农民参与市场能力、以及拓展农民参与市场机会，从而点明研究数字经济对于巩固我国脱贫成果的重要意义。其次，郭红东教授进一步阐述了当前我国“三农问题”的现状。通过对比中国与发达国家在农业现代化水平、农业国际竞争力等方面的差距，指出当前我国“三农”所面临的农村空心化、农业碎片化以及农民边缘化问题。最后，郭红东教授以乡村发展滞后原因为引导，详细阐述乡村振兴战略之核心与标志，并以浙江和苏州为例，探讨当前乡村振兴的相关实践与成果。

随后，郭红东教授详细介绍了数字技术以及数字乡村的相关问题。当前，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得社会对于互联网等技术的认知逐渐从工具层面上升至经济体层面。具体而言，随着2017年国务院首次将数字经济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数字经济逐渐上升至国家战略层面。郭红东教授首先提出数字技术赋能的核心与内在运行机理，即利用PC等终端工具，借助互联网、物联网等新兴技术，实现相关内容的数字化、在线化、透明化等。其次，结合当前相关政策文件与战略目标，郭红东教授具体阐述了数字技术在乡村振兴总方针——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以及生活富裕方面的具体建设内容与发展前景。最后郭红东教授重点介绍了当前数字经济的热点，即电商赋能脱贫与乡村振兴。并从农村电商的发展状况、农村电商的发展核心以及相应的政府政策角度分析了农村电商在乡村振兴中的重要作用。

最后，郭红东教授以江苏沭阳与山东曹县为案例，介绍了当前电子商务实现脱贫与乡村振兴的实践成果。其中，沭阳模式是一种以特色农业产业为依托，以保持农村原有肌理和风貌为前提，由广大农民通过电子商务创业创新实现农业产业升级的“互联网+三农”县域电商发展模式。而通过电子商务的发展体系，沭阳也成功实现了生产专业化、服务社会化、农民年轻化、职业化、知识化以及相关的产业的转型升级。同样，曹县依托乡村传统产业，通过电商平台与服务型政府的双向赋能，推动农民大规模电商创业就业，实现当地传统企业的转型发展、提质增效以及产业转型升级，并最终成为乡村振兴的新样本。

# 数据调查



## 广东千村调查

### 千村动态 | 2021 广东千村调查培训会顺利举行

区别于以往,2021广东千村调查培训会今年将分为两部分进行。第一场为队长专场培训,于7月15日-16日进行;第二场为全员调查规范与实务培训,于7月17日-19日进行,届时将会有近300人同时参与到培训中。

#### 前序:物资准备

为了让访问员和核查员更好地学习和掌握调查知识和规范,项目组提前准备好相应的培训材料和调查物资,并进行邮寄。在将近一周的物资筹备工作中,项目组共调配了近20名工作人员投入到分拣、核验、配货、打包、搬运等工作中。



物资筹备工作大多是默默无闻、繁琐、劳累,但必不可少。“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近300个快递包裹并不是多么的沉重,但寄予了2021广东千村调查项目组

对这届千村“新生”的期盼、欣喜、鼓励和未能见面的遗憾,期盼着在即将到来的培训会和实地调查中,我们可以携手前行,为高水平调查和高质量数据、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而一同努力!

#### 第一场:线下队长培训会

7月15日-16日,2021广东千村调查队长培训会在暨南大学曾宪梓科学馆406顺利举办。

为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建设过硬访问队伍、推动乡村振兴调查工作高效有序开展,广东千村调查项目组调整培训模式,增设队长专场培训,通过小规模、小批量的精细化培训,确保培训质量及取得应有效果。

本场次培训由项目执行负责人花芯以及2021广东千村调查项目组各成员担任讲师,参训对象为本轮调查招募的30位访问员队长。培训内容涵盖家户问卷讲解、访问系统及App操作说明、质量控制和接触换样等重点模块。



培训现场

培训会中,项目执行负责人花芯首先简要为各位队长介绍了广东千村调查项目的发展历程和2021年执行计划,分析样本片区的特征,并根据“队长”这一角色进

履行职责明确和工作内容说明。而后,在家户问卷模块中,花芯带领同学们辨析家户的定义,读懂问卷题意。其间,同学们积极提问、设想调查情景,以快速、透彻地熟悉问卷。



项目执行花芯讲解家户问卷

执行督导骆毓菁为同学们讲解了千村辅助访问App的操作流程和规范,并一一展示了App操作界面和电子问卷填答注意事项。同学们怀着好奇和兴奋,在督导指导下摸索和使用。

质控督导张玉美向队长们介绍了质控方式、要求,分享了过往质控工作中的各类案例。质控主管肖和则详细解说样本构成和触达流程,并在情景模拟中,让队长们“试错”和认识到正确的接触记录填写等事项。肖和强调,追踪访问中样本维护是非常重要的,因此访问员在采集数据这一个环节要认真对待。同学们认真听取调查规范、核查要点等内容,并做好记录。

在讲授培训内容之后,项目组组织了片区督导与队长进行圆桌讨论、调查攻略分享和模拟访问。讨论中,督导积极鼓励队长提问,并耐心细致地给予解答,还通过实例分享让队长们知责于心,认识到合理规划调查流程的重要性。由2020年访问员升级为队长的同学也不吝分享其千村调查经验,帮助新人队长学到位、补短板。



片区督导与队长分享调查经验

16日为模拟培训,参训队长在各种方言声中学习调查规范和团队管理要领。项目组希望各位队长在实地调查中能发挥好带头作用,诠释好“访问员队长”的责任、担当和风范,团结队员,齐心协力投身于社会调查和乡村振兴之中。

#### 第二场:线上全员培训会

7月17日-19日,2021广东千村调查开展了为期三天的线上培训会,介绍了广东千村调查发展历程和团队构成等情况,全面讲解了广东千村调查项目的调查规范、执行方式、调查问卷、质控要求等重点内容,并为参训学生组织安排了安全、财务、联络等方面的知识讲授和学习。本次培训共有235名访问员和43名核查员参加。



线上培训会开班仪式现场

7月17日早上,项目组举行了线上培训会开班仪式。项目执行负责人花芯担任本次活动主持,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乡村振兴研究院、经济学院院长冯仲章,共青团暨南大学委员会孟祥磊副书记,暨南大学社会调查中心执行主任李芮出席参加了本次活动。



冯帅章院长作开班致辞

仪式之始,经济与社会研究院、乡村振兴研究院院长冯帅章教授作致辞。冯院长首先对各位积极参与广东千村调查的学子表达了诚挚的问候。

他介绍,在省委省政府、广东省农业农村厅和暨南大学的大力支持下,广东千村调查顺利开展3轮调查,并取得丰硕成果。而今乡村振兴研究院为其注入新活力,广东千村调查将会肩负国家和社会各方殷切期望,在2021年这个建党百年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交汇的重要节点,以高质量数据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而提供坚实的支撑。

讲话最后,冯院长亲切地嘱咐参训学子,在接下来的实践中,要不怕吃苦、敢于接受挑战,要专心致志、勤思善问,要团结合作、共同成长,要谨守规范、认真对待调查,要严守纪律、注意安全,并预祝本轮广东千村调查项目圆满成功。



孟祥磊副书记发表讲话

而后,校团委孟祥磊副书记发表讲话。孟书记在讲话中充分肯定了千村调查项目在广东省大学生社会实践领域的育人成效和在乡村振兴领域的政策参考作用。她希望参训学子在入户调查和观察乡村的过程中,能把安全放在首位、把责任扛在肩上、把形象树在乡村,有所收获,有所成长。

致辞过后,2021广东千村调查线上培训会正式开始。三天培训中,项目执行负责人花芯、片区督导袁静怡和调查中心执行主任李芮先后负责家户问卷和村问卷讲解,带领同学们吃透问卷,了解调查。片区督导骆毓菁详细说明了调查App的操作流程和农村绘图要求,并指导访问员进行App和绘图实际操作,尽快掌握调查工具。片区督导李凤槐、农麟、慕容英奇等则在分组讨论中围绕实地调查传授联络样本、入户访问的技巧。



骆毓菁说明调查App操作步骤

质控主管肖和,质控督导张玉美、庄贤盈为同学们作质控要求说明,并根据核查员工作特点,安排通过计算机辅助电访系统(CATI)进行电话核查和录音核查模拟,让核查员在实操中掌握质量控制工作要点。

财务专员邱家荣针对同学们提出的财务疑问进行阐释和解答,并为调查队伍提供颇具参考意义的差旅规划。此外,项目组考虑到乡村调查的环境特殊性,还邀请了广州市蓝天救援协会培训讲师封铸达给同学们传授关于极端天气、蛇虫叮咬、动物追赶、运动损伤等问题应对经验和专业知识。

今年,项目组还特意增设了千村题库和自测考试环节,帮助同学们迅速在题海中强化培训效果,增强对调查问卷和调查规范的业务熟练度。随着同学们陆续在微信群里面汇报自测情况,2021广东千村调查访问员线上培训会落下帷幕。

征程万里风正劲,重任千钧再启程。这个盛夏,让我们一起相约南粤大地,探访民情动态,聆听百家故事,以饱满自信的青春姿态,为建设美丽乡村的宏伟蓝图而尽心倾力采数据、建言献策惠民生!



2021广东千村调查项目组与访问员队长合影

## 千村动态 | 善始令终, 实地执行 与一轮核查工作顺利完成



2021广东千村调查质控组与线下工作核查员合影

“最后一个队伍做完了!”8月4日,2021广东千村调查项目组的办公室传来一阵欢呼和掌声。

此时,距离访问员出发集合开展入户调查过去了15天。

距离访问员第一次与项目组线上见面过去了18天。

距离队长第一次与项目组线下见面过去了20天。

距离第一位准访问员参与线上面试过去了58天。

距离2021广东千村调查正式发出招募令过去了89天。

四季的轮盘从暮春走到了早秋,广东千村调查与各位从相遇相识到并肩作战,我们的足迹到过高山田野,到过蓝海浅溪,到过广东的30个区县,到过南粤大地上的三千六百户农村家庭。



访员正在访问村里的留守老人

同时，广东千村调查项目核查员在校园中、在家里、在祖国各地，与访问员一同朝夕不倦地工作，他们听到过乡村的鸡鸣狗吠、雷鸣暴雨；听到过受访者的拒绝或暖心慰问；听到过访问员的极力争取和千般软语；也听到过乡村的百样人生和百家故事。



核查员开展录音核查工作

在千村里，我们结识了队友、村民、督导，我们触摸到了乡村发展的脉搏，我们遇见了更好的自己，探索着乡村振兴的前路。

至此，2021广东千村调查实地执行与一轮核查工作顺利完成，借此良机，让我们一起再看看这群共同奋斗过的好“战友”吧！

## 千村表彰回顾 | 回首调查岁月， 奔赴乡村振兴锦程

9月16日，2021广东千村调查表彰大会在暨南大学曾宪梓科学馆406顺利召开。出于疫情防控要求，活动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邀请访问员和核查员学生代表到场参加，并同步开通现场直播，供其他同学观看和参与互动。

会上，广东千村调查项目组对本年度调查中表现优异和做出突出贡献的团队和个人进行表彰和奖励。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乡村振兴研究院、经济学院院长冯帅章教授，共青团暨南大学委员会副书记、番禺校区团工委书记孟祥磊，社会调查中心执行主任李芮应邀出席本次活动，广东千村调查项目执行负责人花芯担任活动主持。

大会当晚，参会师生首先一同观看了2021广东千村调查项目回顾主题片《乡土南粤》，在盛夏调查岁月的光影和余韵中，回顾数据采集过程的艰苦奋斗和成长收获，并拉开了本次活动序幕。

随后，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乡村振兴研究院、经济学院院长冯帅章教授作致辞。讲话中，冯院长总结了2021广东千村调查的开展情况，高度肯定了项目组老师、访问员和核查员同学在项目期间的辛勤付出和优秀表现，向各位师生表达了诚挚的感谢。

冯院长表示，在脱贫攻坚胜利之年里，各位师生克服相对艰苦的环境条件，坚持了高质量的访问和严

谨的核查，所得数据成果对乡村振兴工作的全面推进和相关学术政策研究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他希望，同学们日后可继续听真话、察真情，在社会调查和乡村建设领域继续拓展见闻和丰富自我。



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院长冯帅章教授

学生代表发言环节，湛江廉江队队长龙灿同学作为访问员代表上台发言。龙灿分享了作为老访员和初次担任访问员队长的调查收获和乡村见闻，他表示团结合作的工作体验和村民身上积极生活态度对其他启发很大，同时感谢千村调查让各位千村参与者拥有了一个精彩的夏天。

紧接着，表彰大会进入大家期待已久的颁奖环节。大会首先颁发的是团队奖项，在激昂的音乐声中，“锲而不舍奖”“情系乡村奖”“阳光积极奖”“精准追踪奖”“C位出道奖”“雷厉风行奖”“质量超群奖”等团队奖项的获奖名单逐一揭晓。



“最佳团队奖”获奖队伍与颁奖嘉宾合影

在颁发个人奖项前，暨南大学经济学院郑惠婷同学作为核查员代表上台发言。郑惠婷“揭秘”了核查员对于质控工作的认识和看法，通过实际案例分享了

核查员工作的艰辛与认真，点明了顺利推进调查与严谨高效的核查工作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语言风趣，让在场师生真切感受到核查工作的规范性和趣味性。

发言后，主持人花芯公布了“优秀核查员”“最佳核查员”“优秀绘图员”“优秀访问员”“优秀队长”等个人奖项的获奖者名单。



“优秀队长”奖项获得者与颁奖嘉宾合影

大会当晚，项目组还精心设计了两轮线上抽奖活动，为各位幸运学生发放精心准备的小礼物，线上线下会场气氛融洽，师生互动不断。最后，在欢声笑语和掌声中，2021广东千村调查表彰大会圆满落下帷幕。

这个夏天，二百多位来自五湖四海、性格各异、怀揣着不同梦想的有志青年相聚在广东千村调查，成为千村调查的接棒人和生力军，在南粤大地上走访农户村舍，听四方乡音，访民情动态，助力乡村振兴。

“没有人永远穿小黄衣，但永远有人穿小黄衣。”老访员陈巨鹏观看回顾视频后写下了感言。广东千村调查将会一直南粤山河中坚持探访，记录乡村发展足迹。来年盛夏，广东千村调查依旧在暨南园等你。



到场师生合影留念

## SEMINAR 回顾

湘潭大学陈华帅：中国老龄健康影响因素  
跟踪调查数据介绍及老龄化研究

6月23日，调查中心邀请了湘潭大学副教授陈华帅担任“社会调查与应用”系列讲座第二十四期的主讲人，为线上会议室的师生们介绍了中国老龄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CLHLS）的调研方案、问卷设计、历年数据模块及相关成果，探讨 CLHLS 可供研究的老龄化热点问题，并分享正在进行的 2021 年 CLHLS 调研新增内容。

主讲人陈华帅，经济学博士，湘潭大学商学院副教授，目前兼任美国杜克大学老龄化与人类发展中心高级研究员。近年主要从事人口老龄化、健康经济学等领域的研究工作，在 SSCI 及 SCI 期刊发表论文 40 多篇。

讲座伊始，陈华帅介绍，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旨在通过发挥多学科交叉优势，探寻利于健康长寿的因素，为提高老年人晚年生活质量、延长生存期限而作贡献。目前，CLHLS 项目是国内最早开展的、坚持时间最长的、针对老年人群的社会科学调查，具有丰富的数据积累、数据相关研究成果和巨大研究潜力。

## 概况

- 项目中文名：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
- 项目英文名：Chinese Longitudinal Healthy Longevity Survey (CLHLS)
- CLHLS 项目（1998-2018）是全国范围最早、坚持时间最长的针对老年人群的社会科学调查。
- 已成为国际国内学界公认、世界上类似研究中 80 岁以上高龄老人（最需照料和研究）样本最大并有相应较年轻老人对照组、数据信息十分丰富和研究潜力巨大的交叉学科研究项目。
- 调查目的：
  - 通过多学科交叉联合攻关，寻找哪些个人、家庭、社会、经济、环境与生物学因素有利于或不利于健康长寿，以及影响健康长寿的内在机制。
  - 探寻如何利用与发扬有利于健康长寿的个人、家庭、社会、经济、环境与生物学因素，减少与消除不利因素，最大限度地缩短老年带病生存期，提高晚年生活质量，减少老人痛苦及家庭、社会的负担，为人类逐步达到既长寿又健康的目标做出贡献。

## 项目概况

CLHLS 项目主要覆盖我国 23 个省市自治区，调查对象为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和 35-64 岁的成年子女，截至 2018 年共开展 8 轮调查，累计访问人数逾 11 万人。

陈华帅指出，CLHLS 项目是根据年龄进行分层

抽样的。由于受访对象的特殊性，项目组对失访样本会采用寻找条件相似的样本进行补充，以保持样本年龄结构的稳定性。而问卷设计则包含存活被访者问卷和死亡老人家属问卷两类，最大限度地记录受访老人的晚年情况。此外，考虑到我国老年人口男女比例失调，CLHLS 通过对男性、高龄老人进行过抽样（oversample），并结合当时的人口普查数据进行样本权重调整。



CLHLS 样本覆盖范围

CLHLS 的存活被访者问卷主要关注受访者基本情况、营养饮食、生活习惯、精神健康等模块信息。从学科交叉的角度来看，CLHLS 更多地与生物学、医学等学科进行结合。

其中项目于 2008-2014 年期间开展的“中国长寿乡”专题模块调查，通过采集高龄人口的生物医学指标数据进行基因测序研究，探讨环境与遗传因素交互作用对老龄健康的影响。其研究成果为老龄人开展精准健康管理提供科学参考。

讲座最后，陈华帅还分享了 CLHLS 项目 2021 年调研方案的调整和未来人口老龄化领域的学术研究计划。会后，参会师生积极提问，与主讲人就 CLHLS 项目的调查指标、样本构成、执行细节等方面的内容进行了踊跃交流。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郅艺：  
基于家访干预的实证研究

主讲人郅艺

9月13日，暨南大学社会调查中心举办了新学期的首场调查主题讲座。第一讲主题为反贫困与儿童早期发展，这也是中心品牌活动——“社会调查与应用”系列讲座的第二十五期。本次讲座中，调查中心邀请了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郅艺担任主讲人，向师生们介绍了“慧育中国：山村入户早教计划”项目的实施过程及儿童早期发展领域的研究发现。

郅艺，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CDRF）儿童发展中心项目主任，主要负责“慧育中国：山村入户早教计划”项目管理，曾参与起草数份国际比较研究类调研报告，组织儿童早期发展领域的交流对话等活动。当前主要研究兴趣包括不平等、贫困、家庭教育、性别及社会治理。

## 本土化的家访活动教材及玩具



讲座中，郅艺首先对“慧育中国：山村入户早教计划”项目（以下简称“家访项目”）的发起背景作简要介绍。郅艺指出，儿童早期能力的发展水平对个体终身发展具有深远影响，关系到整个经济社会发展。

我国欠发达地区农村家庭当前因贫困、不具备科学养育模式、社会照护服务不足等因素，农村儿童早期发展水平较之城市地区普遍偏低。为了有效阻断贫穷的代际传递，必须重视以儿童早期发展为重点的人力资本开发扶贫，并将其提升至相应战略地位。

基于上述原因，家访项目自 2014 年起在中国欠发达地区农村试点实施。项目以 6-36 个月的儿童作为主要对象，对样本家庭进行仅营养干预和营养干预与养育指导结合的对照试验。试验期中，项目通过丹佛发育筛查测试和家庭环境观察评定量表等工具定期、系统地收集儿童和家庭的数据。

郅艺介绍，家访项目的课程体系借鉴了国际家访项目（Reach Up and Learn），并结合我国欠发达地区农村的语言习惯、风俗人情、儿童群体发展特点等进行本地化改编，如使用少数民族语言编制教材、使用可回收材料制作玩具等。通过数据评估，家访员定期上门给予养育指导的家庭，儿童早期发展水平得到显著提升。家访对于家庭养育环境改善、养育行为积极性提高等方面均有效用，这种积极影响在干预终止后仍会持续相当一段时间。

此外，在异质性分析中，研究团队还发现以下现象：越早干预，儿童发展水平的改善越为显著。家访干预对中低收入农村家庭的干预效果更为明显。母亲作为主要照料人的家庭中，家访得到的响应质量和干预效果更好。

讲座最后，郅艺对家访项目进行了总结和展望。虽然家访项目目前实施时间尚短，但与国际长期追踪研究结果趋势一致。未来开展过程中，项目将会在研究创新、过程性数据指标拓展和长期追踪方面继续努力，攻坚克难，进一步探索精准、有效、可复制的家庭育儿干预模式，提升我国欠发达地区农村儿童早期发展水平，推动“幼有所育”和社会公平目标早日实现。

## 中心要闻

广东省千村调查、乡村振兴固定观察点  
调查项目正式启动

编者按

2021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开启之年。为更好服务乡村振兴，推进广东乡村建设，在广东省农业农村厅的指导下，暨南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和华南农业大学国家农业制度与发展研究院整合优势力量，开展广东省千村调查、乡村振兴固定观察点调查项目。

暨南大学社会调查中心深耕乡村调查领域，目前组建了一支二十多人的全职调查队伍，有着丰富的乡村调研执行经验。在广东省千村调查项目中，社会调查中心肩负重任，深度参与问卷设计、培训讲解、巡视质控、报告撰写等核心工作，在此后的实际调查开展中，调查中心将会持续发力，聚智汇能，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而添砖加瓦。

7月22日，“2021年广东省千村调查、乡村振兴固定观察点调查项目培训班”开班仪式在暨南大学中惠楼举行。培训会由暨南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社会调查中心主办，华南农业大学国家农业制度与发展研究院协办。省委农办专职副主任、省农业农村厅党组成员、省乡村振兴局专职副局长梁健，省委农办秘书处处长陈敏深，暨南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经济社会研究院、经济学院院长冯帅章教授，华南农业大学国家农业制度与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胡新艳教授出席本次开班仪式，暨南大学、华南农业大学的老师和学生代表，以及各市县、镇村级调查员参加了培训会。

开班仪式上，冯帅章表示，暨南大学已连续三年开展乡村调查项目，所得数据成果和研究报告得到了省委农办和社会的高度认可。今年3月，暨南大学正式成立了乡村振兴研究院，目前已组成专业研究团队和调查

团队，以建设高质量的乡村振兴调查数据库，为各级政府部门提供高水平政策咨询和智力支持，系统总结提炼广东乡村振兴宝贵经验，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担负助力乡村振兴的时代重任。

暨南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  
经济社会研究院、经济学院院长冯帅章教授

胡新艳表示，她相信暨南大学与华南农业大学这次乡村振兴固定观察点调查项目的合作，是实现顶天立地的理论研究和脚踏实地的管理工作的完美结合。为保证调查质量，华南农业大学派出了30位老师和学生组成调查团队，全力以赴参与项目的调查，为广东实现乡村振兴宏伟目标贡献一份力量，讲好广东乡村振兴故事。

华南农业大学国家农业制度与发展研究院  
执行院长胡新艳教授

梁健在讲话中强调，要秉承“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论断，特别是从事乡镇基层工作的同志要了解民情，扎根基层，通过此类调查工作，获得精确、详实

的调查数据，推进更完善、更全面的政策研究和制定。他对此次调查给予期望和信心，并提出四点要求，一是调查员要认真、虚心学习，深入基层，切实了解民众需求；二是结合广东乡村的实际，深刻领悟党中央、省委省政府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决策部署，让调查更加精准、务实和有效；三是调查过程中，切记注意安全。

省委农办专职副主任、省农业农村厅党组成员、  
省乡村振兴局专职副局长梁健

据了解，“广东省千村调查、乡村振兴固定观察点调查”项目是由广东省农业农村厅指导，目的是通过聚焦乡村振兴的关键数据，选取具有代表性的村、户作为调查观察对象，获取调查对象相对稳定的全样本数据链，对相关数据进行深入分析研判，更好地为我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科学决策参考。

该项目的调查员主要由被调查行政村的村干部构成，通过专业培训，掌握专业的调查方法和问卷访问技能，以面对面访问的方式收集农村微观数据，同时组建核查队伍，通过实地核查、电话核查、录音核查、GPS定位、照片核查等多种严密的质量控制手段对回传数据进行实时把关。

文章来源：  
南方农村报  
南方+2021年广东省千村调查项目组  
乡村振兴固定观察点调查项目组

# 对外交流

## 冯帅章院长受邀参加 2021 年 广东省民政智库工作会议

2021年9月7日-9日,2021年广东省民政智库工作会议在东莞市召开。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院长、经济学院院长、乡村振兴研究院院长冯帅章教授作为广东省民政智库专家受邀参会。

近年来,我院一直与民政部、广东省民政厅等政府部门保持密切往来,提供政策咨询和研究服务。自2016年起,我院连续4年开展民政部“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和困境儿童保障工作第三方评估”,评估组相继赴贵州、湖南、安徽、河南、浙江等省开展深入、扎实的调研,并形成了客观详实的调查报告。随着2019年我院成为民政部政策理论研究基地以来,更加深化了在民政领域的研究,积极为民生事业发展建言献策,先后承接了民政部托底性民生保障政策支持系统建设研究、将低收入群体纳入低保的可行性研究等横向课题。2020年,由广东省民政厅委托,冯帅章教授领衔的研究团队完成的政策报告《广东省婚俗文化及婚姻改革研究》荣获2020年民政政策理论研究一等奖。此外,我院还积极搭建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学术、政策研究的交流平台。自2017年起,我院已经连续举办5届“流动人口子女学术研讨会暨政策论坛”,国务院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民政部、国家卫健委、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机构的专家学者,以及全国一线教育工作者累积500余人参会,共商流动人口子女发展大计。未来,我院将继续关注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群体,为民政部门提供科学、有效的政策建议。



会议现场

会上,东莞市人民政府领导、民政部政策研究中心领导、广东省民政厅领导致辞并作《广东省民政智库工作报告》,与智库各专业小组负责人,民政智库专家讨论广东省民政智库建设发展方向、民政理论研究重点项目等议题。此外,参会人员还实地考察了东莞市道滘镇社工站、东莞市厚街镇“民生东莞家”项目、社区综合服务中心。



实地考察

## 冯帅章教授带队赴四川调研城乡低保情况

2021年9月29日-30日，冯帅章教授带领调研团队前往四川省成都市进行调研。随同的调研人员包括乡村振兴研究院专职研究员唐高洁、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博士后孙坚栋以及研究助理李德华。调研团队与四川省民政厅、成都市民政局工作人员就四川省和成都市低保情况进行了深入座谈，并进入成都市下辖彭州市社区，与一线民政干部以及低保群众进行了访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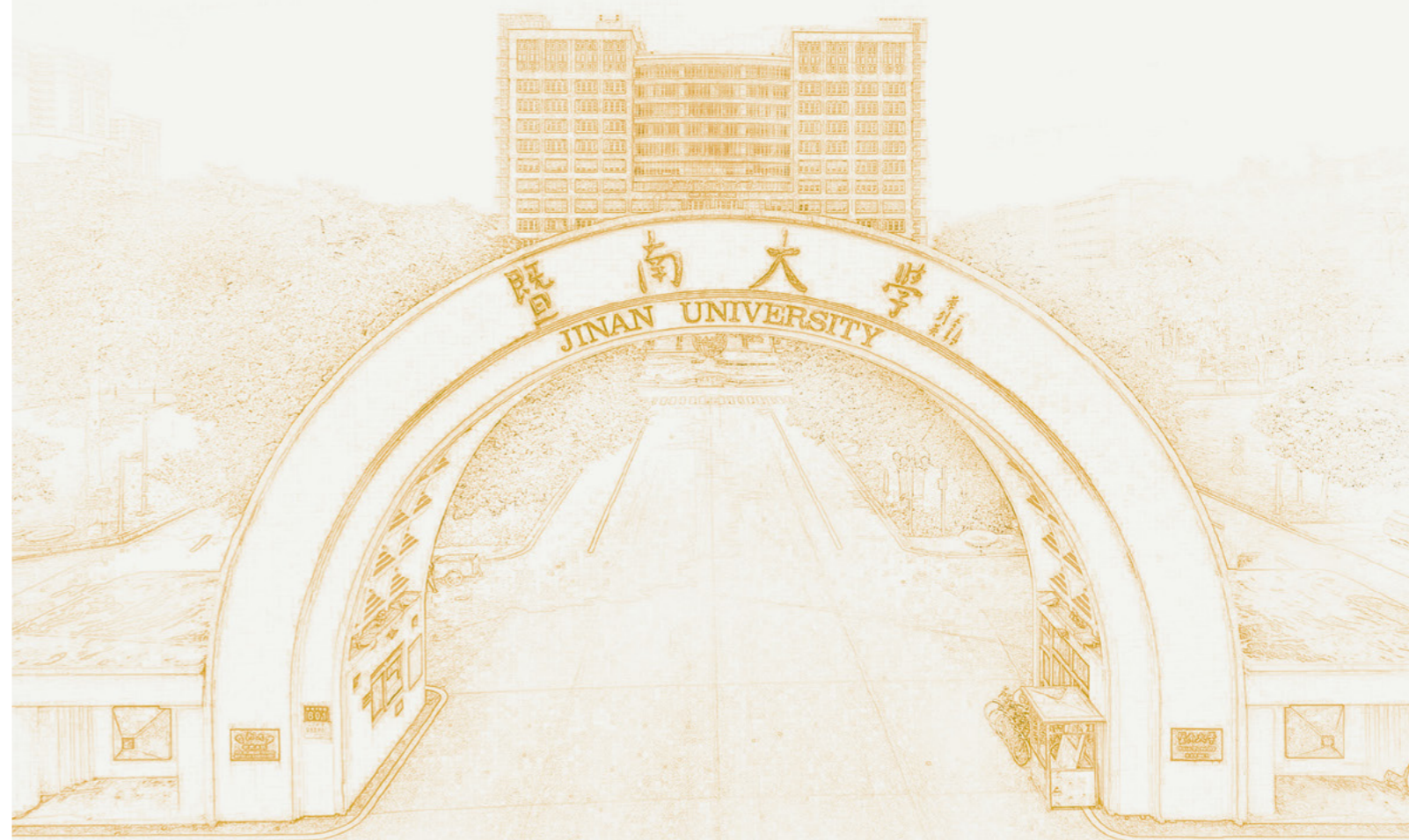
调研团队在彭州市社区座谈

调研团队就四川省和成都市低保工作的创新经验、低保标准制定、低保的申请审核以及动态管理等进行了交流，并探讨了低保以及其他社会救助工作的痛点和难点。在社区访谈中，调研团队重点了解了当地低保的基本情况以及低保户的收支情况。四川省民政厅工作人员介绍了四川省创新性地通过“一卡通”发放救助金，保障资金落实到人的工作开展情况。成都市民政局工作人员介绍了低收入人群动态监测系统和关爱援助体系的工作情况。在彭州市，调研团队与低保户及低保边缘户面对面交流，详细了解了他们的家庭基本情况及政策落实过程中面临的问题。此外，调研团队还与民政工作人员就家庭的收入核算等具体工作进行了深入探讨。



调研团队与成都市民政局工作人员深入交流

# 学生天地



## 本科生培养

### 精英荟萃，语通中外

#### ——我院举办国际精英班学期英语汇报展示



近日，经济与社会研究院（IESR）于曾宪梓科学馆406室举办首届国际精英班（以下简称“国精班”）第二学期英语汇报展示。IESR国精班起源于外国语学院申报的“国际组织人才培养创新实践基地项目”。该项目由宋献中校长担任负责人，作为项目支撑的一部分，国精班先在IESR的2020级学生中开设实验班进行培养。本届实验班的培养方案共分为知识模块、素养模块、拓展模块三大模块，以第二课堂为辅助，本学期通过英美影视文化赏析与配音、中外英语报刊阅读与比较等方式来提升学生英语能力。



汇报展示现场

经过一学期的学习，IESR 2020 级的 20 名学生都积极地参与和投入实验班的课程学习，并在本次汇报演出中带来了精彩纷呈的展示。本次汇报展示邀请了 IESR 院长冯帅章教授、副院长史炜副教授、苏应俊副教授、教科办黎莉老师以及外国语学院院长赵雯教授、梁瑞清教授、彭帆副教授、刘燕玲副教授、王璐副教授、冷璐博士、林雪微博士担任评委和嘉宾。

本次汇报由五个小组依次进行，内容涵盖 SDGs Report、News Report 以及 Dubbing Presentation 三部分。在 SDGs Report 部分，两个小组的同学结合 SDGs 的内容就水资源问题、饥饿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与探讨，并提出了相应的方案；另两个小组在 News Report 展示部分就中国面临的外交局势以及刚实施不久的“三孩政策”进行了模拟形式的新闻播报，并分别采取了腾讯会议及街头采访相结合的形式，十分有趣；进行 Dubbing Presentation 的小组对电影《信条》的精彩片段进行了现场配音，深入探讨了关于“未来科技发展方向”的问题。



各小组汇报展示

在展示的过程中，同学们展现出较强的英文交际能力和较高的人文素养。评委老师们充分肯定了同学们的努力、付出与进步，同时对同学们令人印象深刻的表现点面结合、细致入微地进行了点评：既对同学们汇报的选题与立意、内容与结构、表达与呈现等方面给予了宏观

的指导，也对大家的语音语调、眼神沟通、手势姿态、面部表情、PPT 设计以及如何吸引打动观众等细节之处给出中肯的建议。最终进行“三孩政策”新闻播报的董俞彤、韩伟琪、卫珂妍、邹新颖小组获得了小组特等奖，韩伟琪、卫珂妍同学获得了个人特等奖。



嘉宾评委精彩点评

在全球化进程不断推进的今天，培养扎实的英语能力对于每一位学生都大有裨益。同学们表示，通过 IESR 国精班教师们经验丰富的教学和多元的课堂学习，他们得以锻炼口语能力，汲取表达技巧，了解英语文化，收获国际视野，增强自身信心，正如冯帅章教授在汇报最初的致辞中对同学们培养听说读写能力提出的要求——“go a little beyond the classrooms and the learning materials and practice a lot”。在本次汇报活动的最后，外国语学院的赵雯教授对 20 位同学寄予厚望：“I wish to see all of you fly!”

# 夏令营

## 2021年全国优秀大学生 经济学夏令营 / HCEO-IESR 暑期学校顺利举办



7月12日,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IESR)第六届全国优秀大学生经济学暑期夏令营正式开营。今年的IESR夏令营与芝加哥大学HCEO-IESR Undergraduate Summer School on Socioeconomic Inequality同期进行,夏令营学员可以享受HCEO Summer School国际化的学术资源。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浙江大学、中山大学、四川大学、暨南大学、纽约大学等高校超过100位优秀同学齐聚“云端”,参与此一年一度的暑期学术盛会。在未来的五天中,他们将在这里充分感受IESR的学术魅力。

本次HCEO Summer School是200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芝加哥大学James Heckman教授领导的HCEO国际工作组(The Human Capital and Economic Opportunity Global Working Group)与IESR的第五次深度合作,康奈尔大学Lawrence Blume教授、复旦大学陈钊教授、芝加哥大学Steven Durlauf教授、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Chao Fu教授、多伦多大学Raji Jayaraman教授、北京大学周黎安教授带了精彩的课程。本次活动还同时设置了Best Paper Competition学生论文竞赛环节,将在入选的学生论文中由HCEO的教授们评选出优秀论文。

IESR院长冯帅章教授首先对各位授课教师与学员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并简要介绍了IESR在科研、师资、学生等方面的最新成果。他希望同学们能够抓住宝贵的机会与各位老师多多交流,并预祝大家在论文汇报、面试等环节,能够有精彩的表现。



IESR院长冯帅章教授在开营仪式上致辞

随后,芝加哥大学教授Steven Durlauf以“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为题拉开了课程讲座的帷幕。教授的讲述深入浅出妙趣横生,结合生活日常来阐释经济学观点。



芝加哥大学教授Steven Durlauf

下午,IESR副院长史炜副教授为夏令营的学员们主持了开营仪式。在对同学们表示欢迎的同时,史老师简要介绍了IESR的发展历程和学术实力,并真诚地希望同学们能够加入IESR,在这里开启自己对学术的探索之路。随后,IESR各个方向的老师们都开放了office hour,同学们自由选择感兴趣的方向,积极地与各位老师交流互动,气氛热烈。

7月16日上午,2021年HCEO-IESR暑期学校本科生最佳论文比赛成功举办。本次比赛前期共计收到近30位同学的论文投稿,经过评审组的初选,6位同学进入了7月16日的线上决赛。

康奈尔大学教授Lawrence Blume、复旦大学教授陈钊、芝加哥大学教授Steven Durlauf、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教授Chao Fu、多伦多大学教授Raji Jayaraman、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副教授史炜及助理教授Jun Hyung Kim担任本次大赛的评委。

在决赛中,同学们对自己的论文进行汇报并与教授们进行互动问答。同学们的精彩表现获得了评委们的积极评价。

经评委共同讨论,武汉大学刘芷含的论文被评为本次比赛的最佳论文,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的王琛睿和北京师范大学的向育萱获得二等奖,北京师范大学李溢、中国人民大学章祎然和中国农业大学及华中农业大学王煜正获得三等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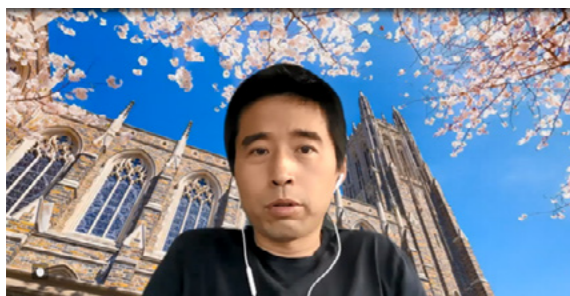
除了学术讲座与最佳论文评选,北京时间2021年7月13日晚8时,杜克大学徐熠教授受邀与学员们分享交流了海外留学的经验。我院18级硕士赵毅也分享了他从IESR硕士到申请到清华博士项目的经历。

本次讲座首先由赵毅分享他在IESR的学习生活经历。目前赵毅已拿到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博士项目全奖,今年秋季即入学深造。

赵毅认为,推荐信、working paper、学院课程设置有英语成绩等是帮他拿到清华博士offer的重要因素。他说,推荐信对申博至关重要,给老师做助研能帮助获得更具竞争力的推荐信,而IESR为学生提供了丰富的助研机会,不仅是本院很多有海外留学经历的老师的助研需求,还包括其他院校老师的助研需求信息,学生可以根据自己感兴趣的专业、老师和学校进行选择。

赵毅在硕士三年间和导师陈祎老师合作有两篇 working paper。他通过和导师交流、学习学院设置的数据分析和计量软件 Stata 课程以及参加 workshop 报告研究,收到了老师的很多有效反馈意见,这不仅锻炼了他提问题、想 idea 的能力,也提高了运用计量方法和软件工具解决问题的能力。IESR 为硕士在基础知识、学术研究等方面设置了合理的课程安排,研一一年完成大部分课程,老师基本都采用英文教学并且评分宽松,这给了学生自由安排的时间来准备申请、实习或考公。学院也为学生提供了很多福利,比如由于疫情,学院为学生考托福、GRE 以及线上会议提供了办公室,为缓解学业压力还为学生提供了免费的羽毛球、乒乓球场地,学院举办的国际学术会议也给学生提供了解学术前沿以及和老师交流的机会。

接下来,徐熠教授对赵毅的分享做了补充并着重分享了申请海外博士项目的经验。他认为,绩点和语言成绩是必要条件,通常是系秘书在初审阶段选出 TOEFL 和 GRE 达到目标分数的材料,再分给教授来审阅,一般会按照国家地区、研究方向等分类。



杜克大学徐熠教授

能让老师眼前一亮的材料是研究经历和研究成果,这能让老师看到学生的研究能力和潜力。好的发表最有说服力,好的 writing sample 能加分,起到锦上添花的作用,但若不够好则适得其反。研究经历以外,教授还会看课程和技能要求是否适合经济学研究。徐熠教授推荐大家在保证不拉低绩点的前提下,尽量多上数理方面的课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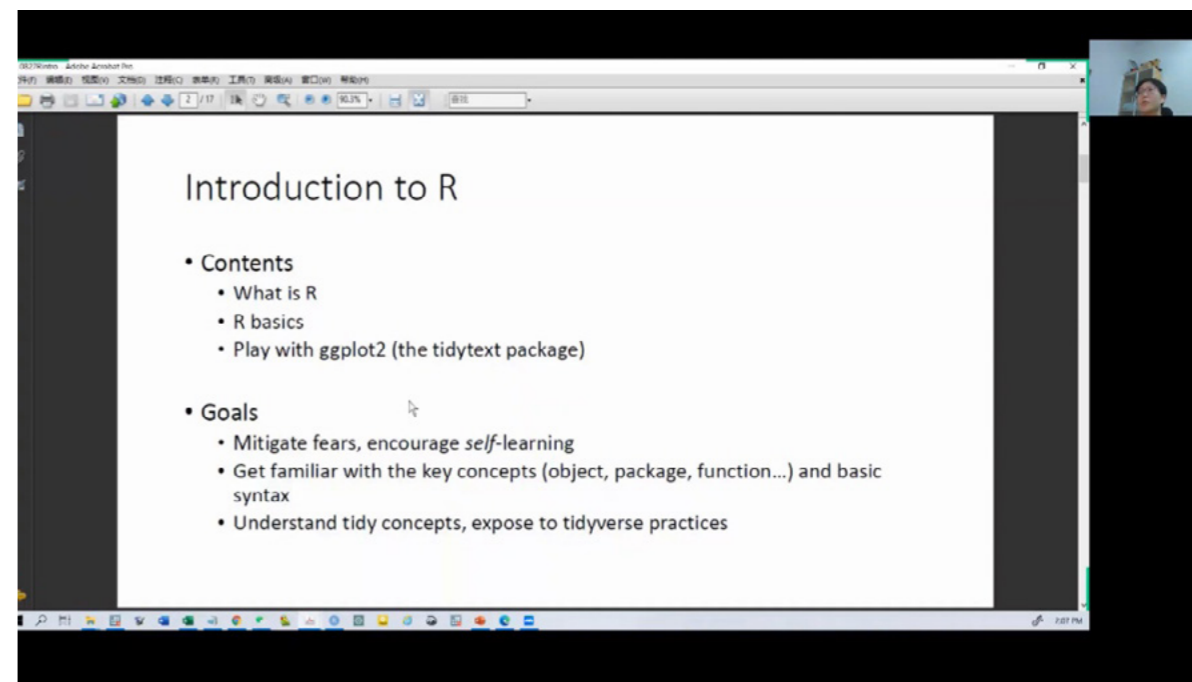
徐熠教授说,推荐信很重要,推荐人本身的资质和以前推荐学生的历史能提供更具有说服力的信息。在这点上,IESR 有大量海外留学科研背景的老师是具有比较优势的。另外,徐熠和 Nancy Qian 等教授建立的 China Econ Lab(<https://chinaeconlab.org>) 计划提供一个匹配学生和国外老师助研需求的平台,大家敬请期待。此外,个人陈述发挥了敲门砖的作用,要直截了当写出对老师最有用的信息,直接表明我对什么感兴趣、我觉得这个学校优势在哪、我为什么适合这个项目,能更好地达成双方的供需匹配。

徐熠教授指出国内硕士相对本科毕业在申请上更有优势,像 IESR 和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的 2+1 项目也能提供一定帮助。另外很多北美本科毕业生有参加一些经济系的 Pre-Doc 项目,这也提高了申请博士项目的竞争力。硕士在就业市场也有很多优势,以徐熠老师所在的杜克大学经济系硕士项目为例,目前大约是一半申博、一半去业界。

至此,为期 5 天的 2021 年 HCEO-IESR 暑期学校及最佳论文比赛圆满落幕。本次暑期学校因疫情防控要求通过线上进行,尽管由于时差原因部分课程及交流活动安排在了当地早晨或夜晚,但授课教师们非常认真准备教学内容,答疑解惑,同学们也非常积极地参与互动。我们在此也感谢 HCEO、暨南大学、以及为本次活动付出辛勤劳动的工作人员。

## 珠江经济学俱乐部

### IESR 助理教授谢佳欣带你入门 R 语言



北京时间 2021 年 8 月 27 日下午 2 点,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助理教授谢佳欣为大家带来了以“R 语言入门和自学指南”为主题的线上讲座,这也是珠江经济学俱乐部第 15 期活动。

主讲人谢佳欣老师于香港科技大学获得社会科学博士学位,武汉大学获得金融工程与应用数学双学士学位,现在的研究方向主要为发展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和劳动经济学。

本次讲座谢佳欣老师主要介绍了关于 R 的基本认识、R 中一些基础的概念,比如什么叫做 object, 什么叫做 package, 如何编写完成各种任务时需要用到的 function,最后介绍了如何用 R 来绘制图形。谢佳欣老师

把 R 形象比喻成智能手机,package 就相当于手机中的 app, 需要完成什么任务时就可以找到对应的 package, 安装后使用就能达到目的。最后谢佳欣老师通过演示的方式让大家了解进行 R 语言编程时需要掌握的法则及简单的语法逻辑,鼓励大家自己进行操作,并希望大家在讲座之后对 R 语言的核心概念有所了解。

谢佳欣老师首先介绍了对 R 的基本认识。R 最早是由统计学家发展而来的使用工具,主要用于统计学计算及制图分析,而这与现如今经济学需要用到的很多工具重叠,因此导致 R 成为经济学及其他社会科学研究中被广泛使用的一个工具,同时 R 在很多行业中也具有广泛的应用,比如一些网络公司、政府部门。

R 具有很多的优点。首先 R 是一个免费的软件,在任何操作系统中都能够使用。其次, R 具有巨大的网络资源, R 在近些年使用范围越来越大, 因此有一个活跃的使用群体, 在学习过程中遇到任何问题时, 都可以在网上进行搜索, 可以找到很多回答; 同时 R 的 package 在不停地更新, 其编写者也会把如何学习的教程公开放在网上, 学习起来资源很丰富。R 与 Python 相比入门相对容易, 我们可以使用各种 package 来实现我们的目标, 而无需自己从头到尾一步步编写。

经济学研究中为什么涉及到 R 语言? 对此谢佳欣老师介绍如今有越来越多的非传统型数据, 而之前我们在进行经济学研究时使用的大多是数值型数据, 比如一些统计数据等。但在经济社会环境中有大量的信息都是以非数据化的形式存在, 比如媒体文章、政策文件、审判文

书、企业报告等, 这些里面也包含很多经济学所关心的内容, 如何将它们数据化并通过系统的方式分析它们, 这就需要使用 R 来做这一工作。谢佳欣老师为了让大家有更直观的了解, 以经济政策不确定指数为例来帮助大家更好地理解这一过程。

接下来谢佳欣老师详细介绍了 R 语言中的一些基本规则, 比如如何定义路径、如何安装并调用 package、如何连接外部数据等。最后谢佳欣老师通过演示的方式教大家如何使用 R 来绘制各种图形, 以及当我们遇到问题时, 如何使用 help 命令和 cheatsheet。

讲座中, 谢佳欣老师和同学们积极交流, 并对大家的问题给出了详细解答, 这场讲座最后在谢佳欣老师和同学们的热烈讨论中结束。

## 学子专访

# IESR 海外硕士预科班校友李金阳: “不将就”的人生态度, 使我达成求学目标

【人物名片】李金阳, 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 (IESR) 海外硕士预科班校友 (2021 级), 就读于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

与保研擦肩而过的李金阳, 遵从内心所向, 综合考量现实因素后, 选择了 IESR 海外硕士预科班项目作为升学路径。与许多同龄人一样, 他也曾对未来规划有过迷茫, 但正是“不将就”的学习态度, 使他成功入读了心仪的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



## 几经辗转, 忠于学术

谈起选择留学的原因, 李金阳说自己的规划在大学四年里发生过多次转变。大二他不准备读博深造, 想早日进入职场, 因此打算前往香港地区或者新加坡等英联邦制国家留学。大三经历过社会的磨砺后, 他意识到了在校园求学的幸福感, 产生了攻读博士学位的想法。于是, 他考虑去欧洲和美国留学, 希望能通过严格的经济学学术训练提高学术能力。

留学目标筛选下来后, 他觉得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是一个很不错的大学, “报名 IESR 项目会比较省心。” IESR 海外硕士项目录取率高, 风险小, 出国留学能学习前沿的经济学理论知识和研究方法, 这对于未来读博深造非常有帮助。经过审慎思考后, 他选择 IESR 海外硕士项目圆自己的留学梦。

## 预科班体验

### 01 省心靠谱

在暨大读本科期间, 李金阳经常能在校内看见 IESR 海外硕士预科班项目的海报, 并从学院公众号的推送中了解了该项目合作的几所高校, 以及申请的各种条件。此外, 由于本专业一位师姐也是通过 IESR 海外硕士项目前往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留学, 这让他对项目本身更加有信心了。

留学目标清晰的李金阳, 给项目负责老师打电话咨询项目详情, 经过线下面试和交流, 对项目有了较为全面的认知。就这样, 李金阳成为了 IESR 海外硕士项目学员, 稳步推进着自己的留学计划。

### 02 基础永远不过时

由于本身就是暨大的学生, 李金阳选择了在线下上预科班课程。“我真推荐线下, 因为线下不是单纯上课, 还有很多其他的体验。对我而言, 其他体验甚至比课程本身更重要。”

在线下小班制教学的课堂上, 同学们都听得特别认真, 上课走神的现象也减少很多。作为一个本科经济学专业、成绩优异的同学, 他刚开始想过申请免修预科班的基础课程。

但上了几节课后发现“像微观经济学这种比较难的课程, 如果在学校上第一遍课没有听得很懂, 还可以在预科班再听一遍加强巩固。我们预科班有个同学, 他去年已经上过两遍了, 但今年还要再来上一遍, 不断加强基础。”



李金阳 (左一) 在认真听课

即使本科四年系统地学习过经济学知识, 李金阳还是认为预科班的基础课程“永远不过时”, 每次上课都会有新收获。即使是同一门课程, 不同的老师上课, 也会给予学生不一样的认识角度。

### 03 融洽的师生关系

预科班的老师不仅传道授业解惑, 还成为了李金阳生命中亦师亦友的存在。课程的“互动体验感很好”, 如果上课有知识点没听懂, 咨询老师或助教便能高效的解决问题。“老师一定会当时给你解答, 如果觉得不太好讨论, 一定会下课后趁休息时间给你解答”, 李金阳说道。

全英授课的教学环境是为了更好地帮助学生与海外硕士课程接轨。对于老师全英教学方式, 李金阳表示“挺容易适应, 老师会帮助学生逐渐熟悉全英授课环境”。如果讲到比较难的问题, 会问学生是否听懂, 没听懂的话会用中文解释一遍, 确保学生都听懂了。

从上课到申请全流程, IESR 海外硕士项目的老师都会为同学们提供悉心指导。李金阳说, 如果在申请过程中有任何问题, 都可以直接随时咨询老师。“我的雅思成绩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一直没有收到, 和老师说了以后, 老师发邮件亲自去研究生院帮我吧雅思成绩转回来了。”这让他的留学申请变得“省心”许多。

在预科班的学习时光虽然短暂, 却给李金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比如和老师一起聚餐。平日里站在讲台上的老师, 侃侃而谈自己读博时遇到的各种问题, 还会热心给同学们提供关于读博的建议。

## IESR 海外硕士预科班校友刘岚浩： 经济学改变了我的思维方式

【人物名片】刘岚浩, 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 (IESR) 海外硕士预科班校友, 本科就读于西南财经大学, 现为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经济系 2021 级学生。



初中时一场美国之旅使刘岚浩对海外留学产生向往。因缘际遇下, 他在实习期间参加的学术论坛上偶然接触到 IESR 海外硕士预科班项目, 从此为他的美国留学梦打开了另一扇门。网课的出现, 将成都与广州的千里之遥变得微不足道。对他而言, 学习经济学的意义不

### 学习不必将就

疫情加剧了原本就激烈的就业形势, 当谈及目前有許多人为了找到好工作而提升学历水平这个现象时, 李金阳坦言: “如果不是真心喜欢的话, 真的没必要让自己强撑下去”, 因为读研的难度并不比工作低, 也会花费几年时间成本。

今年 8 月, 李金阳正式入读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对于未来的规划, 他希望能认真学习、享受生活。

仅在于提高就业竞争力, 更重要的是从深层次改变了他的思维方式。

### 一次偶然发现留学“快车道”

对于刘岚浩来说, 留学的梦想就像一颗种子, 在很多年前就已种下, 只等合适的时机发芽长大。

上初中时, 刘岚浩跟随家人去美国旅游, 这场旅行使他对美国的风土人情产生了极大兴趣。到了大三这个“分水岭”, 刘岚浩希望能继续在本专业经济学领域深造。考虑到考研耗费的时间长, 且一年只有一次机会, 如果失败只能重来, 所以排除了考研这一路径。

后来, 他通过与朋友和教授的交流, 了解到欧美发达国家有更成熟的西方经济学体系, 去这些国家深造能更好地帮助自己提高学术能力, 便坚定了去美国留学的想法。他开始在美国经济学领域的顶尖大学中进行筛选, 并将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作为留学目标。

正当他准备申请之际, 实习期间参加的一场学术会议让他发现了留学“快车道”。在会议上, 教授们通过与刘岚浩交流, 得知他的未来规划是去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留学, 便提起暨南大学 IESR 海外硕士预科班项目正在与该校合作, 可以考虑通过这一渠道去留学。有了教授的推荐, 他便关注 IESR 微信公众号、官方网站了解项目详情。

### 十拿九稳的录取保障

刚开始了解到 IESR 海外硕士预科班项目时, 刘岚浩坦言“还是有顾虑的”, 担心是否要从成都跑到广州上预科班课程, 耽误本科的必修课。向老师咨询后, 他得知可以通过周末上网课这一方式, 这才打消了顾虑。

刘岚浩认为 IESR 海外硕士预科班项目和中介机构存在很大区别, “IESR 海外硕士项目可以十拿九稳拿到心仪学校的 offer”, 但是中介在申请时可能会为了成功率, 给学员报一些档次相对较低的学校, 不利于学生的学业发展。学员如果报了 IESR 海外硕士项目, 基本已经确定今后要去这个学校, 就不会存在期望和现实不符的情况。名校合作的项目背景为他的留学增添了一重保障, 使他感到安心多了。

### 经济学对我的改变

随着国内外环境的变化, 有人对经济学的用处产生了质疑, 而刘岚浩对学经济学的意义有着不同的见解。



刘岚浩在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上课

他认为经济学作为一门基础学科最大的意义是“可以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 比如我在本科学习了四年经济学后, 开始慢慢地将效益最大化应用到实际生活中考虑问题。这样的思考方式给我带来很多好处, 可以让我少走很多弯路。”

### 预科班体验

#### 01 距离不再阻碍授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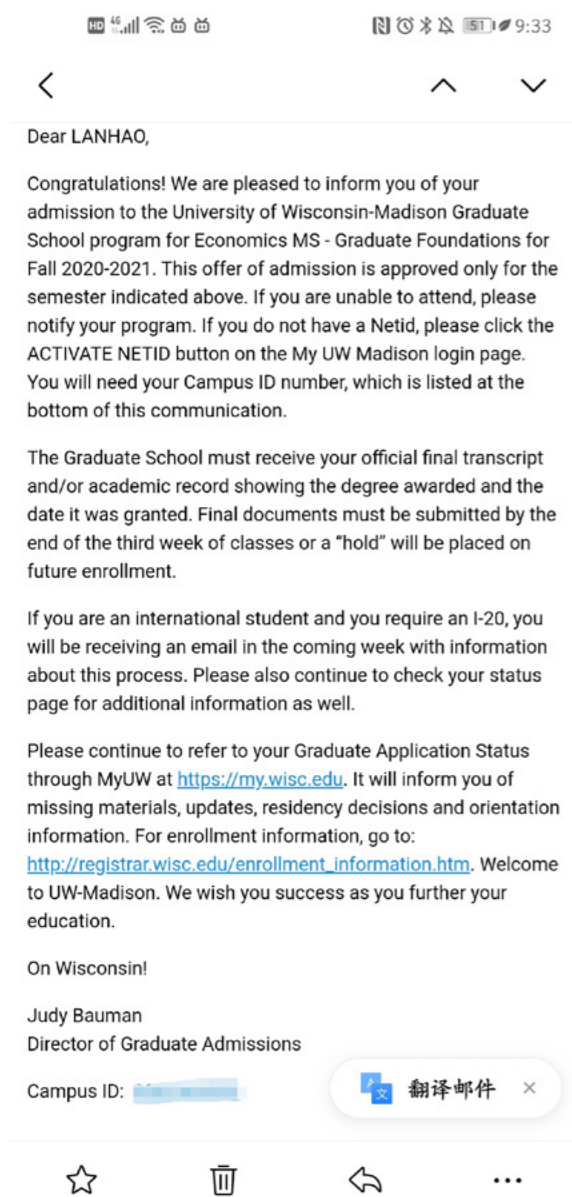
刘岚浩说, 从本科毕业过了一个暑假再上研究生课程, 有些专业知识可能会遗忘或断档, 但 IESR 海外硕士项目的预科课程可以帮助学员更好地完成过渡, 这也是中介机构所不能提供的。

通过线上平台, 身处成都的刘岚浩也能听到暨大 IESR 海外硕士预科班老师的授课, 距离不再变成阻碍。对于预科班的课程质量, 刘岚浩表示肯定。他认为预科班的“上课速度跟难度比较适中, 课程设计能够衔接起本科和硕士的课程”。

预科班使用英文教材, 全英授课的教学方式帮助同学们提前适应海外硕士生活。本科就在全英教学环境中度过的刘岚浩, 能比较轻松地适应预科班课程。班里有些同学习惯了中文教学环境, 刚开始难以适应, 但在课程后半段基本都能完全适应。“老师还会停下来等一等听不懂的同学”。据刘岚浩讲述, 预科班授课老师会根据学生听课状况调整课程设计, 并不会单纯为了完成教学任务, 即使学生没听懂也继续推进课程。

#### 02 贴心无私的全流程服务

回忆起在预科班的日子, 刘岚浩说他印象最深刻的便是申请学校时预科班老师给予的无私帮助。老师很详尽地帮他分析了要从哪些方面突出自身优势、避开劣势, 以及在选学校、专业方面需要注意的地方。这些交流令刘岚浩茅塞顿开, 他坦言, 老师给他提供了很多之前完全没有想到的一些观点和方法。“正是老师们给我提供的帮助, 才让我申请到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这种比较好的学校。”



刘岚浩收到的offer邮件

### 脚踏实地步入人生新阶段

虽然年纪尚轻,但刘岚浩对未来的职业规划已经有了明确的方向。

经过长时间的沉淀与自我评估,他产生了“非常明确的读博想法”。刘岚浩认为在目前的就业市场上,硕士的竞争力在逐年下滑,博士的就业选择面会宽广很多。从思维层面看,读博能更好地将所学的知识体系应用到日常的工作生活中。另外,家人的支持也是他读博的一大重要动力。

踏实沉稳的他计划将时间精力投入到学业上,想在硕士期间好好学习,尽可能多地学习编程、数学、英语等内容。争取与教授合作发论文,拿到教授的推荐信,为自己读博奠定基础。